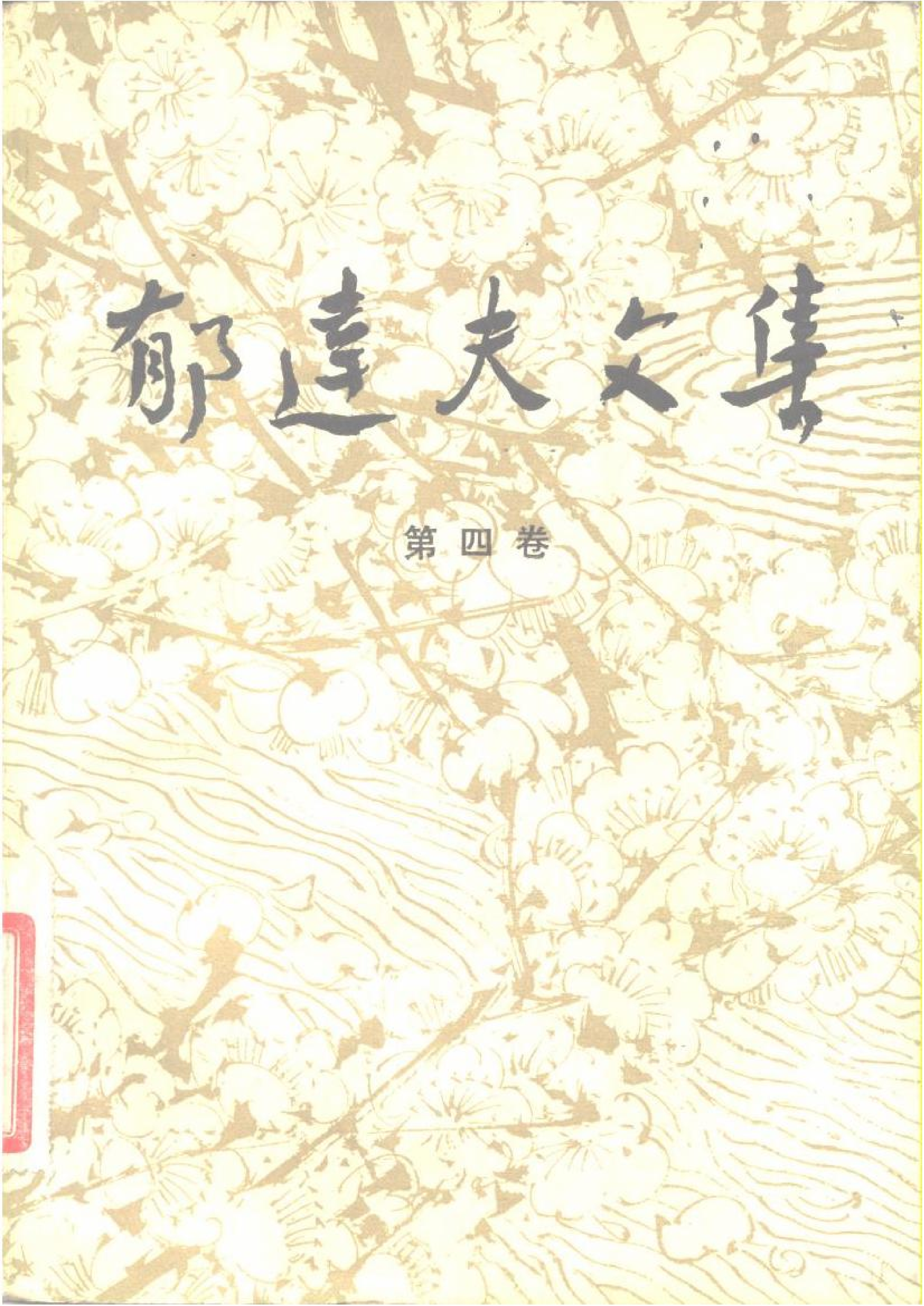

郁達夫文集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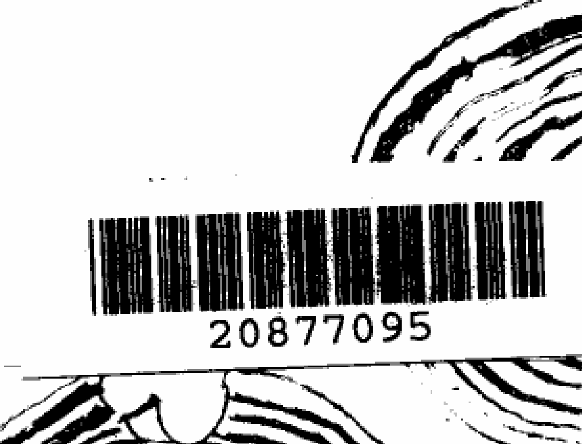
郁達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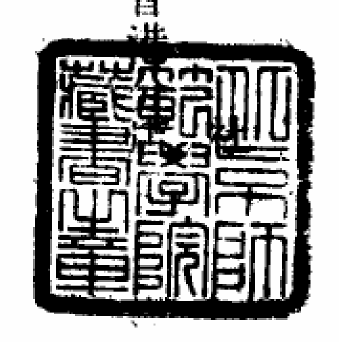
第四卷：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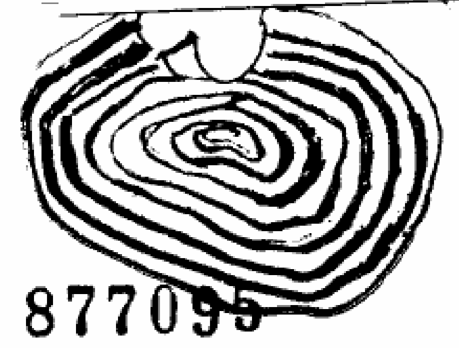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香港







装帧设计　林　墉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郁达夫文集
（国内版）
第四卷·散文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4插页　270,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128　　定价 1.40元



一九三[illegible]年八月六日，郁达夫和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共同出席上海漫谈会在功德林举行的聚会，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第二人为郁达夫。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目　　录

城里的吴山

不管是到过或没有到过杭州的人，只须是受过几年中等教育的，你倘若问他："杭州城里有什么大自然的好景？"他总会毫不思索地回复你一声"西湖"！其实西湖却是在从前的杭州城外的，以其在杭城之西而得名。真正在杭州城里的大观，第一要推吴山（俗名城隍山），可是现在来杭州的游客，大半总不加以注意；就是住在杭州的本地人，也一年之中去不得几次，这才是奇事。我这一回来称颂吴山，若说得僭一点，也可以说是"我的杭州城的发见"，以效My Discovery of London之颦；不过吴山在辛亥革命以前，久已经是杭州唯一的游赏之地，现在的发见，原也只是重翻旧账而已。

"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在镇海楼（即鼓楼）之右。盖天目为杭州诸山之宗，翔舞而东，结局于凤凰山；其支山左折，遂为吴山；派分西北，为宝月，为蛾眉，为竹园；稍南为石佛，为七宝，为金地，为瑞石，为宝莲，

为清平，总曰吴山。……”

这是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卷十二记南山城内胜迹中之关于吴山的记载。二十余年前，杭州人说是出游，总以这吴山为目的；脚力不继的人，也要出吴山的脚下，上涌金门外三雅园等地方去喝茶；自辛亥革命以来，旗营全毁，城墙拆了，游人就集中在湖滨，不再有上城隍山去消磨半日光阴的事情了。

吴山的好处，第一在它的近，第二在它的并不高，元时平章答剌罕脱欢所甃的那数百级的石级，走走并不费力。可是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象一面圆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还有一件吴山特有的好处，是这山上的怪石的特多；你若从东面上山，一直的向南向西，沿岭脊走去，在路上有十几处可以看到这些神工鬼斧的奇岩怪石。假山垒不到这样的巧，真山也决没有这样的秀，而襟江带湖，碧天四匝，僧庐道院，画阁雕栏，茂林修竹，尘市炊烟等景物，还是不足道的余事。

还有一层，觉得现在的吴山，对于我，比从前更觉得有味的，是游人的稀少。大约上吴山去的，总以春秋二节的烧香客为限；一般的游人，尤其是老住在杭州的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平时决不会去的。乡下的烧香客，在香市里虽则拥挤不堪，可是因为我和他们并不相识，所以虽处在稠人广众之中，我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我的孤独。

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

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象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前次语堂来杭，我陪他走了半天城隍山后，他也看出了这山的好处来了，我们还谈到了集资买地，来造它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大约吴山卜筑，事亦非难，只教有五千元钱，以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屋，就可以成功了；不过可惜的，是几处地点最好的地方，都已经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了去，我们若来，只能在南山之下，买几方地，筑数椽屋；处境不高，眺望也不能开畅，与山居的原意，小有不合而已。

不久之前，更有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人来游；我也照例的陪他们游过吴山之后，他们问我说："金人所说的立马吴山第一峰，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吴山总是杭州最高的山，所以金人会有这样的诗语。我一时解答不出，就只指示了他们以一排南宋故宫的遗址。大约自凤山门以西，沿凤凰山而北的一段，一定是南宋的大门，穿过万松岭，可以直达湖滨的。他们才豁然大悟地说："原来是如此，立马吴山，就可以看得到宫城的全部，金人的用意也可算深了。"这一个对于第一峰三字的解释，不知究竟正确不正确。但南宋故宫的遗址，却的确可以由城隍山或紫阳山的极顶，看得一望无遗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创作月刊》创刊号

扬州旧梦寄语堂

语堂兄：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后，写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两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够使人魂销而魄荡！

竹西歌吹，应是玉树后庭花的遗音；萤苑迷楼，当更是临春

结绮等沉擅香阁的进一步的建筑。此外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后土祠琼花万朵，玉钩斜青冢双行，计算起来，扬州的古迹，名区，以及山水佳丽的地方，总要有三年零六个月才逛得遍。唐宋文人的倾倒于扬州，想来一定是有一种特别见解的；小杜的"青山隐隐水迢迢"，与"十年一觉扬州梦"，还不过是略带感伤的诗句而已，至如"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那简直是说扬州可以使你的国亡，可以使你的身死，而也决无后悔的样子了，这还了得！

在我梦想中的扬州，实在太有诗意，太富于六朝的金粉气了，所以那一次从无锡上车之后，就是到了我所最爱的北固山下，亦没有心思停留半刻，便匆匆的渡过了江去。

长江北岸，是有一条公共汽车路筑在那里的；一落渡船，就可以向北直驶，直达到扬州南门的福运门边。再过一条城河，便进扬州城了，就是一千四五百年以来，为我们历代的诗人骚客所赞叹不置的扬州城，也就是你家黛玉的爸爸，在此撇下了孤儿升天成佛去的扬州城！

但我在到扬州的一路上，所见的风景，都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因而想起了晁无咎的《赴广陵道中》的诗句：

醉卧符离太守亭，别都弦管记曾称，
淮山杨柳春千里，尚有多情忆小胜。（小胜，劝酒女鬟也。）
急鼓冬冬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
帆开朝日初生处，船转春山欲尽头。
杨柳青青欲哺乌，一春风雨暗隋渠，

落帆未觉扬州远，已喜淮阴见白鱼。

才晓得他自安徽北部下泗州，经符离（现在的宿县）由水道而去的，所以得见到许多景致，至少至少，也可以看到两岸的垂杨和江中的浮屠鱼类。而我去的一路呢，却只见了些道路树的洋槐，和秋收已过的沙田万顷，别的风趣，简直没有。连绿杨城廓是扬州的本地风光，就是自隋朝以来的堤柳，也看见得很少。

到了福运门外，一见了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以及写在那洋灰壁上的三个福运门的红字，更觉得兴趣索然了；在这一种城门之内的亭台园囿，或楚馆秦楼，那里会有诗意呢？

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了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入睡之前，我原也去逛了一下街市，但是灯烛辉煌，歌喉宛转的太平景象，竟一点儿也没有。“扬州的好处，或者是在风景，明天去逛瘦西湖，平山堂，大约总特别的会使我满足，今天且好好儿的睡它一晚，先养养我的脚力罢！”这是我自己替自己解闷的想头，一半也是真心诚意，想驱逐驱逐宿娼的邪念的一道符咒。

第二天一早起来，先坐了黄包车出天宁门去游平山堂。天宁门外的天宁寺，天宁寺后的重宁寺，建筑的确伟大，庙貌也十分的壮丽；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寺里不见一个和尚，极好的黄松材料，都断的断，拆的拆了，象许久不经修理的样子。时间正是暮秋，那一天的天气又是阴天，我身到了这大伽蓝里，四面不见人影，仰头向御碑佛像以及屋顶一看，满身出了一身冷汗，毛发都倒竖起来了，这一种阴戚戚的冷气，教我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呢？

回想起二百年前，高宗南幸，自天宁门至蜀冈，七八里路，尽用白石铺成，上面雕栏曲槛，有一道象颐和园昆明湖上似的长

廊甬道，直达至平山堂下，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妃嫔成队，侍从如云的盛况，和现在的这一条黄沙曲路，只见衰草牛羊的萧条野景来一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当然颓井废垣，也有一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美感，所以鲍明远会作出那篇《芜城赋》来；但我去的时候的扬州北郭，实在太荒凉了，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

到了平山堂东面的功得山观音寺里，吃了一碗清茶，和寺僧谈起这些景象，才晓得这几年来，兵去则匪至，匪去则兵来，住的都是城外的寺院。寺的坍败，原是应该，和尚的逃散，也是不得已的。就是蜀冈的一带，三峰十余个名刹，现在有人住的，只剩了这一个观音寺了，连正中峰有平山堂在的法净寺里，此刻也没有了住持的人。

平山堂一带的建筑，点缀，园囿，都还留着有一个旧日的轮廓；象平远楼的三层高阁，依然还在，可是门窗却没有了；西园的池水以及第五泉的泉路，都还看得出来，但水却干涸了，从前的树木，花草，假山，迭石，并其他的精舍亭园，现在只剩了许多痕迹，有的简直连遗址都无寻处。

我在平山堂上，瞻仰了一番欧阳公的石刻像后，只能屁也不放一个，悄悄的又回到了城里。午后想坐船了，去逛的是瘦西湖小金山五亭桥的一角。

在这一角清淡的小天地里，我却看到了扬州的好处。因为地近城区，所以荒废也并不十分厉害；小金山这面的临水之处，并且还有一位军阀的别墅（徐园）建筑在那里，结构尚新，大约总还是近年来的新筑。从这一块地方，看向五亭桥法海塔去的一面风景，真是典丽裔皇，完全象北平中南海的气象。至于近旁的寺

院之类，却又因为年久失修，谈不上了。

瘦西湖的好处，全在水树的交映，与游程的曲折，秋柳影下，有红蓼青萍，散浮在水面，扁舟擦过，还听得见水草的鸣声，似在暗泣。而几个弯儿一绕，水面阔了，猛然间闯入眼来的，就是那一座有五个整齐金碧的亭子排立着的白石平桥，比金鳌玉蛛，虽则短些，可是东方建筑的古典趣味，却完全荟萃在这一座桥，这五个亭上。

还有船娘的姿势，也很优美；用以撑船的，是一根竹竿，使劲一撑，竹竿一弯，同时身体靠上去着力，臀部腰部的曲线，和竹竿的线条，配合得异常匀称，异常复杂。若当暮雨潇潇的春日，雇一个容颜姣好的船娘，携酒与茶，来瘦西湖上回游半日，倒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

船回到了天宁门外的码头，我对那位船娘，却也有点儿依依难舍的神情，所以就出了一个题目，要她在岸上再陪我一程。我问她："这近边还有好玩的地方没有？"她说："还有天宁寺、平山堂。"我说："都已经去过了。"她说："还有史公祠。"于是就由她带路，抄过了天宁门，向东的走到了梅花岭下。瓦屋数间，荒坟一座，有的人还说坟里面葬着的只是史阁部的衣冠，看也原没有什么好看；但是一部《廿四史》掉尾的这一位大忠臣的战绩，是读过《明史》的人，无不为之泪下的；况且经过《桃花扇》作者的一描，更觉得史公的忠肝义胆，活跃在纸上了；我在祠墓的中间立着想着；穿来穿去的走着；竟耽搁了那一位船娘不少的时间。本来是阴沉短促的晚秋天，到此竟垂垂欲暮了，更向东踏上了梅花岭的斜坡，我的唱山歌的老病又发作了，就顺口唱出了这么的二十八字：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写到这里，本来是可以搁笔了，以一首诗起，更以一首诗终，岂不很合鸳鸯蝴蝶的体裁么？但我还想加上一个总结，以醒醒你的骑鹤上扬州的迷梦。

总之，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作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者，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了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扬州之美，美在各种的名字，如绿杨村，廿四桥，杏花村舍，邗上农桑，尺五楼，一粟庵等；可是你若辛辛苦苦，寻到了这些最风雅也没有的名称的地方，也许只有一条断石，或半间泥房，或者简直连一条断石，半间泥房都没有的。张陶庵有一册书，叫作《西湖梦寻》，是说往日的西湖如何可爱，现在却不对了；可是你若到扬州去寻梦，那恐怕要比现在的西湖还更不如。

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想象

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枕上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一遇现实，那里还有 Dichtung 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

原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第二十八期

记耀春之殇

只教是一个动物，既然生了下来，不过迟早几年或几十年，死总免不了的。中国人的俗语，很澈底的在说，先注死后注生。英文中的一个不能免于死亡的形容词，大家在当作人字解，叫Mortal。

这一种谛观，这一种死的哲学的解识，当然谁也明白，我也晓得；但是对于死之伤痛，尤其是对于一个与己身有关的肉亲的死之伤痛，可终也不能学作太上的忘情。从前的圣贤，为悼爱子之丧，尚且哭至失明，我生原不肖，我又那得不哭？

幼子耀春，生下来刚只两整年；是我们逃出上海，迁住杭州之后的那一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时候，霞就有点害怕，怕于忙乱之中，要先期早产。用了种种的苦心，费了种种的周折，总算把家搬定了，胎也安下了，我们在灯下闲谈，就说及这一个未来的生命的命名。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三国志》里，也有飞、云的两位健将。那时候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儿来娱老境，所以我首先就提议，生下来

若是女孩，当叫她作银瓶，藉以凑成大小眼将军一门忠孝节义的全套。而霞又说："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他作亮；有了猛将，自然也少不得谋臣，历史上的智谋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

他的生日，是一般民间所崇奉的元帅菩萨的生日，元帅菩萨的前身，当然是唐时的张睢阳巡。现在桐庐的桐君山上，还有一尊张睢阳的塑像塑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谨，说这一位菩萨，有绝大的灵感。生下来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个巡字，但后来却终于被霞说服了，就叫他作亮；小名的耀春，系由阳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来的称谓；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而称耀，写作曜字，亦自可通。

他的先天是很足的；生下来时的肥硕，虽没有过过磅，可是据助产妇说来，在杭州城里，产儿的身体，肥得这样的，却很少见。三朝之后，就为雇乳母的事情，闹成了满城的风雨。原因是为了他的食量之大，应雇而来的将近百数个的乳母，每人都不够他的一天之食。好容易上诸暨去找了一个人来，奶总算够吃；但吃满周岁，她的奶也终于干涸，结果就促生了他去年夏季的奶疳之病。

去年天热，我和霞和飞，都去青岛住了月余；后来由青岛而之北平，由北平而去北戴河，一住再住，有两个多月不在家里。后来航空信来了，电报来了，都说耀春的病重，催我们马上回家，我们在赶回来的路上，一夕数惊，每从睡梦里骇醒过来，以为这一个末子终于无更生之望了，但后经同学钱潮医生的几次诊治，他的疳病竟霍然若失，到了秋天，又回复了平时肥白的状态。

经过了这一次的大病，大家总以为他是该有命的，以后总是很好养了；殊不知今年春天，又出了慢性中耳炎的恶疾，这一回

又因伤风而成肺炎，最后才变成了结核性脑膜炎的绝症，卧病不上半月，竟在五月二十日（阴历四月十八，去年有闰月，距他生日，刚满念四个月）的晚上去世了。

他的这一回的生病，异常的乖，不哭不闹，终日只是昏昏地睡着。经钱医生验了血液，抽了脊髓以后，决定了他的万无生望，我们才借了一辆车，送他回了富阳的原籍。

墓碑葬具以及坟地等预备好之后，将他移入到东门外的一家寺院中去的早晨，他的久已干枯的眼角上才开始滴了几滴眼泪。这是从他害病之日起，第一次见到的眼泪。他人虽则小，灵性想来是也有的。人之将死，总有一番痛苦与哀愁，可怜他说话都还不曾学会，而这死的痛苦，死的哀愁，却同大人一样地深深尝透了；"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我的衷情，当然也比他自己临死时的伤痛不会得略有减处。

十年前龙儿死在北平，我没有见到他的尸身，也没有见到他的棺殓，百日之后，离开北平，还觉得泪流不止。现在他的坟土未干，我的陪病失眠的疲倦未复，每日闲坐在书斋看看中天的白日，惘惘然似乎只觉着缺少了一件东西；再切实一点的说来，似乎自己的一个头，一个中藏着脑髓，司思想运动的头颅不见了。

十年之中，两丧继体，床帏依旧，痛感人亡；一想到他的明眸丰颊，玉色和声，当然是不能学东门吴子之无忧。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到深宵人静，仰视列星，我只有一双终夜长开的眼睛而已；潘岳思子之诗，庾信伤心之赋，我做也做不出，就是做了也觉得是无益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念二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发表时题为《记耀春》，

对于杭州作者协会的希望

我对于杭州的作者协会，始终是一个客员；第一次开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不在杭州，现在第二次再开的时候，我又因不得已的事故，须去上海。

并且还惭愧之至，自被选了理事以来，对于协会的事也始终没有理过，一切都由别的几位先生在偏劳；至多至多，也不过出席去做了几次主人，陪了几次客而已。

这一次的大会，听说会员也已经加多，而节目也很有可观，大约来会的诸君，总都能得到一天的快乐。不过我对协会的希望，却不仅仅在“交换智识，联络感情”的一面；我以为事到今日，正当中国上下涂炭之际，这种协会，还有些比较得重要的事情好做。譬如，第一，启蒙的工作，就是使一般昏聩糊涂的人，不要再去开倒车，再去做读经，念佛，求仙之类等无聊的事情；第二，作家倘在思想研究或合理的言论上有失去自由的时候，应当起来主持正义，互相扶助；第三，实际生活上，若有艰难困苦的作家，也应该想想法子，救济救济，以祈能达到会员于万一的时

候，能收到一点实效之类。

不过凡此种种，都是很大的事情，大家要团结坚固，志趋纯正，不受利用，不怕辛劳，才干得出一点头绪来；所以我想我对于协会的这些希望，虽则并不是绝对的无望之望，但至少，恐怕也是在最短期间之内，难以实现出来的罢？

五月三十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二三四二期

娱霞杂载

清康熙的时候，休宁赵吉士恆夫，于做了一任交城县后，就在北平住下了，做官到了给练。他的别业寄园，就在宣武门的西偏，菜市西南，教子胡同内。有人也说，长椿寺西，全浙会馆，便是寄园的故址。读查他山九日游寄园诗："累成曲磴叠成冈，高着楼台短着墙，花气清如初过雨，树阴浓爱未经霜，熟游不受园丁拒，放眼从惊客路长，亦有东篱归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阳，"可以想见当时寄园的花木楼台之胜。癸亥甲子之交，我寄寓北平，日斜客散，往往独步于菜市的附近，想寻出那寄园的遗址来；可是寻来寻去，不但旧迹无存，就是老树，也不多见。寄园藏书之富，本为当时的京官所艳称。赵著《万青阁全集》，流传不广，我也不曾见到，而其所编之《寄園寄所寄》十二卷，却为妇孺所共赏，现在还在流行。赵吉士的《万青阁诗余》，曾在《清百名家词钞》里见到十首，现在且抄一首游平山堂的《扬州慢》在这里，以见一斑："霜岸妆楼，草桥画舫，隔林几处烟钟。望江南无数，碧浪泻云峰。庐陵子，构堂以后，春风杨柳，岁岁啼红。到而今栏槛，依然半依

晴空。何方歌吹，杜郎梦断竹西中。想北海荒陵，东山老桧，曲径遥通。已是小阳春候，犹留得，半壑秋容。叹刘苏难再，风流谁继遗踪。”平时喜翻阅前人笔记及时文别集，很有仿《寄园寄所寄》遗意，随时抄录，别类分门，以成一书之野心。可是近年来日逼于衣食，做卖钱投稿之文，尚无暇晷，这事是办不到了，以后只想于茶余酒后，未拿正式写稿笔之先，来抄录一点，聊以寄兴。因为霞很喜欢读这一类的诗文，所以名之曰《娱霞杂载》。

金坛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花朝舟中寄内》诗云：“青山曲曲水迢迢，红白山花拥画桡，寄语归潮将信去，富春江外过花朝”。“梁燕双栖二月中，小桃庭院又东风，凭栏忆到春山外，可系花间一道红”。这乃是公宦游越中时所作，细腻风光，柔情可掬。我平时很想将关系富春的诗词文赋，抄成一册，仿《严陵集》例。名之曰《富春集》。象这两绝，当然是《富春集》里的材料。公乾隆进士，授修撰，历官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卒谥文襄。

幼时曾熟记律诗一首，题名《春景》：“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处柳花如梦种，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宝镜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宝，东风取次一凭栏”。书题作者为柳氏，不知是否牧斋夫人杨爱之作。即系后人伪托，诗总也是好诗，而尤以前半截为更有情趣。

宋吕蒙正微时，尝于腊月祀灶日，作《送神词》云：“一炷清香一缕烟，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报道文章不值钱。”这与刘后村《赠相士》诗：“拙貌惭君仔细看，镜中我自觉神寒，直从杜甫编排起，几个吟人作大官。”一样的感慨。

厉太鸿《宋诗纪事》，八十七卷闺媛部，有寇莱公妾蒨桃，为公因会赠歌姬以束绫，作诗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

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始成”。“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难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两诗虽象是满含醋意，可是相府的爱妾，而竟能关怀到寒窗织女的苦衷，也不得不说她是仁者之言。又同卷中，转载《随隐漫录》一条，记姑苏女子沈清友一绝：“昨天移棹泊垂虹，闲倚篷窗问钓翁，为底鲈鱼低价卖？年来朝市怕秋风”，也颇得风人微讽之意。

南丰刘壎，本为宋室遗民，其所著《隐居通议》二十卷，论诗论文，颇有独到之处。卷七记曾南丰一条，力辩世俗传言谓子固不能作诗之无识，曾抄有曾子固诗句若干，中有《城南》绝句一首：“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柳色齐。”又《夜过利沙门》一首：“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翚飞人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谿潮”，乃系曾在福建时作，的是好诗。

杭州的文人，大家都知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的一联，以为只有十字的断句。《全唐诗》中载有此诗，乃释处默《题圣果寺》之作：“路自中峰上，盘回出薜萝，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古木丛青霭，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钟磬杂笙歌”。据编者所考，处默初与贯休同薙染，后入庐山，与修睦，栖隐游，当为唐末五代初人。《全唐诗》中存诗亦仅八首，其《咏织妇》一绝：“蓬鬓蓬门积恨多，夜阑灯下不停梭，成缣犹自赔钱纳，未直青楼一曲歌”，语意与蒨桃相似，而织户苦状，和现下杭州的机织业者又略同。

绵州李调元雨村，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馆，改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三十九年，放广东副考官，四十二年因画稿两议被参。旋以特旨，简授广东学政，三年任满，补直隶通永道。解组归后，以著述自娱，晚号童山老人，刻有《函海》，

《升庵著书》,《全五代诗》等,《童山诗集》四十卷,《童山文集》二十卷，以及《雨村诗话》,《赋话》,《词话》,《曲话》,《剧话》等。与袁蒋赵同时而略少，后随园二十二年生，较问陶张船山又长一辈，其论诗要旨，亦重性灵，大约是当时的风尚。《诗话序》中有云:“夫花既以新为佳，则诗须陈言务去；大率诗有恆裁，思无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由人。诗衷于理，要有理趣，勿堕理障。诗通于禅，要得禅意，毋堕禅机。言近而指远，节短而韵长,得其一斑，可窥全豹矣”。又《词话序》中，有释话字之大旨两语曰:“大凡表人之妍，而不使美恶交混曰话；摘人之强，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话”，他的著作态度，可以想见。虽则僻处西蜀，才不如袁赵诸家，名亦不能传遍海内，但刻意好诗书，专心弄著述，童山老人当然亦是乾嘉文坛的一位健将。

遵义郑子尹，与独山莫友芝齐名，咸丰中，人目为黔中二杰,殁于同治三年。治许郑学,精三礼,故为文有根底,诗近苏黄,而不规规肖仿古人。著作除《经学笺考》诸书外，有《巢经巢文集》六卷,《诗集》九卷,《后集》《遗集》各若干卷。现在抄录几首他的诗在这里,以见经生辞藻,亦并非专是曰若稽古的一流。《晚兴》:“写毕黄庭册，归从道士家,晚风亭子上,闲看白莲花”。《寄远》:“美人夜起梅花底，身载梅花渡江水，四天寻遍不相闻，遥认寒灯九万里。柔肠牵引不禁愁，暗有铜仙涕泪流，多情赖得徒相忆，若便相逢尽白头”。《邯郸》:“尽说邯郸歌舞场,客车停处草遮墙,少年老去才人嫁，独对春城看夕阳”。《南阳道中》:“先车雨过尘方少，未夏村明望不遮，林脚天光如野水，麦头风焰渡晴沙。春当上巳犹无燕，地近南都渐有花，昼睡十分今减半,为留双眼对芳华。”《行至静怀庄寄家》:“秋山送客影萧萧，落拓吟魂不可招，村店雨来

天欲晚，行人方度杏花桥。”好句正多，抄不胜抄，割取一脔，聊当大嚼而已。

张泌初仕南唐，入宋官虞部郎中，《寄故人》一绝："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尚有“扬子江头杨柳春”的遗味，至汪水云《湖州歌》中之“京口沿河卖酒家，东边杨柳北边花，柳摇花谢人分散，一向天涯一海涯”，则语意率直，真是宋人口吻。诗分唐宋，并无优劣之意，不过时代不同，语气自然各异耳。

西溪老沤袁忠节公，正色立朝，谠言殉志，自是清末一代名臣。公故里桐庐，又与富阳接壤，我收藏他的著作以及关于当时的册籍不少，人但传其诗句僻涩，上追北宋，殊不知他的长短句，也音节悠扬，直入宋人堂奥，现在且抄两阕《朝中措》在这里，以示才人的多艺。其一《咏桂花》："一枝移得小山丛，肤粟镂金融。荷后菊前位置，秋光烂占离东。轻浮抹丽（俗作茉莉盖译音也），冶容栀子，扫地俄空。凭仗天风吹送，余香散入房栊”。其二，《淀园》："画桥流水碧潺潺，烟外几重山。曲涧朱阑一径，垂杨青琐双环。芊锦跸路，名园相倚，花掩重关。一片晓云开处，金庭出翠微间。”

昭文孙原湘字子潇，中式乾隆乙卯恩科江南乡试，嘉庆乙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假归，得怔忡疾，遂绝意仕进，但主毓文，紫阆，娄东，游文诸书院讲席；为人乐善好施，广惠乡里，道光九年享寿七十岁卒。著有诗词古文骈体文及外集六十卷，名《天真阁集》，而尤长于艳体。其论诗主性情，讲风雅，故所作辄玉润珠圆，不施金翠，而风格天然。夫人虞山席佩兰女士，本系外家中表，为随园入室女弟子，《长真阁集》诗词数

卷，亦情致缠绵，足与《天真阁集》前后辉映。闺中唱和无虚日，乾嘉诗人之饱享艳福者，当以子潇为第一，他若张船山，孙渊如，即袁子才，亦有所不及。子潇有《押环字无题诗二十四章和竹桥丈韵》，中数首为："绛阙宸妃字阿环，云軿小谪凤城间，神光离合随方变，仙梦凄迷竟夕闲。凝雪自穿衫缕茧，纤尘不上袜罗斑，玉楼咫尺如天远，何况楼中润玉颜"。"一年小梦事循环，又值秋分白露间，十洞三清皆阻碍，六张五角每空闲。诉将幽怨鹍弦语，替得悲啼凤蜡斑，镇日画图中看杀，何时暂许对芳颜"。"丽质休猜燕与环，秾纤修短适中间，小鬟戏学晨梳懒，中妇偷窥午梦闲。画角暗搔纤指晕，墨痕微舔绛唇斑，不知忆着何年事，半晌妆台独解颜"。夫人亦和成四章，其二云："小阁疏帘绿树环，妆台移至北窗间，工书赢得蛮笺积，贪绣翻抛羽扇闲。藕雪素丝留有节，瓜浮碧玉辨无斑，兰桡早绝清游想，羞共芙蕖斗粉颜"。其四云："屈膝围屏面面环，水沈炉火置中间，金铃远报风声紧，彩线频量日影闲。蔫蚕自劳盘掬粉，吟椒犹喜管拈斑，耐寒生与梅花似，冰作肌肤雪作颜"。至其《送外入都》一首："打叠轻装一月迟，今朝真是送行时，风花有句凭谁赏，寒暖无人要自知。情重料应非久别，名成翻恐误归期，养亲课子君休念，若寄家书只寄诗。"哀而不怨，情挚且长，真备有大家的风度。

原载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至十四日《东南日报·沙发》

住所的话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賞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把人一年年弄得意气消沉的这时间的威力，实在是可怕，实在是可恨。

从前很喜欢旅行，并且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一步一步的缓步着，向四面绝对不曾见过的山川风物回视着，一刻有一刻的变化，一步有一步的境界。到了地旷人稀的地方，你更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会上的虚伪的礼节，谨严的态度，一齐洗去。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大地高天，形成屋宇，蠛蠓蚊虱，不觉其微，五岳昆仑，也不见其大。偶或遇见些茅篷泥壁的人家，遇见些性情纯朴的农牧，听他们谈些极不相干的私事，更可以和他们一道的悲，一道的喜。

半岁的鸡娘，新生一蛋，其乐也融融，与国王年老，诞生独子时的欢喜，并无什么分别。黄牛吃草，嚼断了麦穗数茎，今年的收获，怕要减去一勺，其悲也戚戚，与国破家亡的流离惨苦，相差也不十分远。

至于有山有水的地方呢，看看云容岩影的变化，听听大浪啮矶的音乐，应临流垂钓，或松下息阴。行旅者的乐趣，更加可以多得如放翁的入蜀道，刘阮的上天台。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若要住家，第一的先决问题，自然是乡村与城市的选择。以清静来说，当然是乡村生活比较得和我更为适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电灯自来水等——的供给，家人买菜购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问题等合计起来，却又觉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在中国原也很多。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南方则未建都前之南京，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可是乡土的观念，附着在一个人的脑里，同毛发的生于皮肤一样，丛长着原没有什么不对，全脱了却也势有点儿不可能。所以三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春雨霏微的节季，终于听了霞的劝告，搬上杭州来住下了。

杭州这一个地方，有山有湖，还有文明的利器，儿童的学

校，去上海也只有四个钟头的火车路程，住家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是杭州一般的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间合乎理想的住宅，旧式的房子呢，往往没有院子，顶多顶多也不过有一堆不大有意义的假山，和一条其实是只能产生蚊子的鱼池。所谓新式的房子呢，更加恶劣了，完全是上海弄堂洋房的抄袭，冬天住住，还可以勉强，一到夏天，就热得比蒸笼还要难受。而大抵的杭州住宅，都没有浴室的设备，公共浴场呢，又觉得不卫生而价贵。

所以自从迁到杭州来住后，对于住所的问题，更觉得切身地感到了。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四面若有邻舍的高墙，当然要种些爬山虎以掩去墙头，若系旷地，只须植一道矮矮的木栅，用黑色一涂就可以将就。门窗当一例以厚玻璃来做，屋瓦应先钉上铅皮，然后再覆以茅草。

照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建筑房子，大约总要有二千元钱来买地皮，四千元钱来充建筑费，才有点儿希望。去年年底，在微醉之后，将这私愿对一位朋友说了一遍，今年他果然送给了我一块地，所以起楼台的基础，倒是有了。现在只在想筹出四千元钱的现款来建造那一所理想的住宅。胡思乱想的结果，在前两三个月里，竟发了疯，将烟钱酒钱省下了一半，去买了许多奖券；可是一回一回的买了几次，连末尾也不曾得过，而吃了坏烟坏酒的结

果，身体却显然受了损害了。闲来无事，把这一番经过，对朋友一说，大家笑了一场之后，就都为我设计，说从前的人，曾经用过的最上妙法，是发自己的讣闻，其次是做寿，再其次是兜会。

可是为了一己的舒服，而累及亲戚朋友，也着实有点说不过去，近来心机一转，去买了些《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来，在开始学画了；原因是想靠了卖画，来造一所房子，万一画画，仍旧是不能吃饭，那么至少至少，我也可以画许多房子，挂在四壁，给我自己的想象以一顿醉饱，如饥者的画饼，旱天的画云霓。这一个计划，若不至于失败，我想在半年之后，总可以得到一点慰安。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五卷第一号

海　　上

——自传之八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满清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

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上海街路树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在日暮的街头，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

远近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象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象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在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的当时我那幼稚的脑里，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背后房里的几位哥哥的朋友，却谈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戏剧；晚餐吃后，有人做东道主请去看戏，我自然也做了花楼包厢里的观众的一人。

这时候梅博士还没有出名，而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象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这一位色艺双绝的小旦的拿手风头戏；我们于九点多钟，到戏院的时候，楼上楼下观众已经是满坑满谷，实实在在的到了更无立锥之地的样子了。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后的一出贾璧云的名剧上台的时候，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

亮，台下的观众也起了动摇。而从脚灯里照出来的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与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几个钟头之前，那样的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感到不满的我这不自觉的精神主义者，到此也有点固持不住了。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为购买船票杂物等件，忙了几日；更为了应酬来往，也着实费去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终于在一天侵早，我们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马车向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出发了，这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行人，太阳也只出来了一线。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飘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

太阳升高了，船慢慢地驶出了黄浦，冲入了大海；故国的陆地，缩成了线，缩成了点，终于被地平的空虚吞没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鹄立在船舱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时的那种伤感的情怀，这一回仿佛是在回国的途中。大约因为生活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

海上的生活开始了，我终日立在船楼上，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傍晚的时候，曾看了伟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来，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黄海，驶入了明蓝到底的日本海的时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与白鸥水鸟为伴时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

性，但是正当青春的盛日，在四面是海的这日本孤岛上过去的几年生活，大约总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绝大的影响无疑。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象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哩！

由神户到大坂，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东京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经是十月将终，寒风有点儿可怕起来了。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语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我到东京住下的两三个月里，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静静儿的回想起来，方才感到了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

在这郁闷的当中，左思右想，唯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语的早日的谙熟，与自己独立的经济的来源。多谢我们国家文化的落

后，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收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只教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试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费可以领得；我于绝望之余，就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入了学日本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

早晨五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里去高声朗诵着“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我有着许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课文，一到八点，就嚼着面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则学校去补课。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里吃过午餐与夜饭，晚上就是三个钟头的日本文的夜课。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雨雪。因为日日步行的终果，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的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半年中的苦学，我在身体上，虽则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智识上，却比在中国所受的十余年的教育，还有一程的进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为决定要考入官费的五校去起见，更对我的功课与日语，加紧了速力。本来是每晚于十一点就寝的习惯，到了三月以后，也一天天的改过了；有时候与教科书本茫茫相对，竟会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五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相当的酬报，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里占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业的

时候，哥哥因为一年的考察期将满，准备回国来覆命，我也从他们的家里，迁到了学校附近的宿店。于八月底边，送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戚属，永久地断绝了连络。从此野马缰弛，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计算起时日来，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时候。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人间世》第三十一期

璨霞道情

天气渐渐的热了，近来正如有一位攻击我个人的先生之所说，觉得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做。这一位攻击我个人的先生，他的题目，原也是很大；但事实却与《新生》上登载了一篇无聊的文章，致惹起国交的经过（见十二日本报），正成反对。因为应该讨论的，是关于杭州人的气质的问题，而这一位先生，却置这大问题于不顾，只做了一篇向我个人作人身攻击的文章。他的论点是这样，一，不是理想的人，不应该谈理想；推而进之，就是只有猫可以说猫，狗可以说狗；你若要说苍蝇蚊子，你自己就先得是一个蝇和蚊子；所以不是俄国人来芒笃夫，也不配从俄文去译来芒笃夫的诗。二，当以人废言；总之是我这一个人不对，所以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犯罪的证据；甚而至于死儿子也是罪，有老婆也是罪，当然写点东西，更是无往而非罪了。三，大约是这一位先生所以要做那一篇文章的顶大的理由，就是说，他的诗，他的文章，都比我做得好，人也比我伟大，或者最坏的时候，也不过和我一样。这几点，我已经在《学校生活》

要我做的一篇短文里说过了，本来是可以不必再说的；事实就胜于雄辩，大家只须看了这一位先生的文章，大家就马上可以晓得他的文章和诗，的确都比我做得好，最坏的时候也不过和我一样。今天的所以要再来犯罪的原因，象是为了我们的一位长辈的一首《道情辞》，目的是在介绍，犯罪也许是犯罪，可是情有可原，也许能减轻一等。

爱读本刊的人，如那一位对我作人身攻击的先生一样，大约还能记得起去年冬天我所做的一篇颂八十三老人三姑母太太的大寿的文字；今年她是又加了一岁了，但兴致却更添得浓厚，却是变成了一十八岁的样子。日长无事，于侵晨早起之余，昨天偶尔踏到她老人家那里去一省起居，问她当这火炎的夏日，用何方法来消遣纳凉，她却不忙不怕，念出了这样的一首《道情辞》来：

六月炎天似火烧，年轻人个个觉心焦；
闲来无法消长昼，十副儿消磨且解嘲。
一个是八一老人璨霞客，一个是摩登少女美人蕉，
一个祥保母亲仇二姐，一个是绕腮胡子老萧曹；
四人坐定分筹马，被招的总是老年高。
左一看来右一看，你和我吃闹嘈嘈，
阁老尚书人本分，更有时失引不开优，
姐妹串通成活手，掉牌偷摸一团糟，
尚书阁老筹输尽，散场时也只好挖腰包。
子时过，丑时到，白米香羹味胜糕，
熏鱼火腿盐鸡蛋，酱油麻油拌笋梢。
吃完分手明朝会，第二天又来麻雀四人操，
猫拖老鼠加元宝，摸进财神势就豪。

逢场必赌尚书赵，对酒当歌醉令陶。
消磨长夏原非博，骨肉团圆也足骄。
去日苦多来日少，得逍遥处且逍遥，
八一老人心澹泊，道情辞不是楚离骚。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东南日报·沙发》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以素无定职的我这一个长期失业者，来向青年们说些指导职业的话，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况且近来已经有一位青年在向我提出警告了，他说：一、你们若不是理想的人物，你就不配谈理想，所以只有狗可以谈狗，虎可以谈虎，你若要说到猫，你自己就得先变一只猫。二、总之是对于我个人的人身攻击，仿佛是我一日不死，中国就一日没有出路似的，所以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不对，甚而至于死儿子也是一罪，有了老婆也是一罪，做做诗写写文章也无往而不是罪。三、这是这一位青年的最重要的论点，大约也就是他那一篇文章的所以不得不写的原因，直接痛快的说将出来，就是他要使人晓得，他的文章比我写得好，诗也比我做得好。“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致惹起了日月的不平，只能自己出马，向我来迎头一击，以灭爝火的余辉，以示日月的伟大。

我虽则不肖，可这一点爝火的自知之明，倒也是有的，故而近来绝对的不想写东西了，好让些新进的青年，来多写些既强而

有力，又猛能扑人的文章。不过在世上旅（杭州骂人的俗语有旅世两字，不知是否这般的写法）得久了，几个认识的人当弄什么杂志新闻纸之类的时候，总得来硬拉；被拉不过，又只能勉强的应酬，重作着冯妇。所以半生过去，就积下了这么些个口头孽，也结下了许多不知不觉的暗中怨。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却不防低头三尺有神明，在空中又会触犯了那些值日的恶功曹。这一大堆废话，本来是与指导职业无关的，但已田引水，既不能如职业介绍所广告文一样，说出许多有益于就职前途的话来，自然只好发些弄文笔的人的牢骚，以示弄文笔的这一件事情，绝对不是青年的正业。

我们在小的时候，谁也有一种对于文人的盲目崇拜狂，以为真的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教文章写得好，就自然"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所以在中学毕业后的几年之中，老想做一个文人，可以"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实际上文学的麻醉力也真强，一首很好的诗歌，或一篇哀艳的小说戏曲，你读了的确要为它们所颠倒，正如意志未定，生理发育已竣完美的青年，见了妖艳的异性一样。但选职业，也犹之乎结婚，若只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跳入了富于诱惑、不着实地的急流旋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我所以说，弄弄文笔，决不是职业，要想立意做一个文人，只是血气未定的青年时候的一个迷梦。

那么以笔杆为生，靠卖文为活的这一回事情，根本是没有的么？若然，则文学、新闻纸类、书籍等等所谓文化的结晶品，又从何处产生呢？这当然是很合理的一个问难。依文笔为生的正式

职业者，自然是有的，譬如新闻记者、杂志或书局编辑、电影编剧员、国家或私营机关的书记秘书，推而广之，更如律师教员以及替人写信的测字先生代书人物之类，都是以文笔为业的人。可是读了许多年的书，不能将书本子去活用，为人类为社会去做些真真能从无中生有，足供实用的东西出来，而一辈子只在笔墨纸上翻筋斗，实在是有点交代不过去的事情。象现代中国的有些青年，简直连上列各职业都不想去干，只一味的在打算避难就易，成一个作家，以冀得名利双收，那就更不是前进的青年所应有的态度了。

我以为选择职业，第一要从事于生产的职业，使筋肉与脑子同时劳动，可以独立，不必求人的种类为最上，如自作农、机器师、土木工程师之类，下而至于编藤椅、敲石子的小工，也觉得比咬文嚼字、只说空话而无实际的写文作家，更可尊敬。必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出卖智识，得人薪水，也须以不悖良心的职业为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富贵本不可羡，若再不以其道得之，则这一个人的肉，怕也不足食了，现在的那些卖国求荣，助桀为虐的大人先生，就是这一类的禽兽。

前些日子，在天津一家报上曾见过一段劝卒业生的议论，仿佛有这么的三点，第一，要刻苦；第二，自视不可过高，自恕不可过宽，勿嫌小事而不干；第三，以回农村去为得，这议论当然是切近可用的上策。在全国经济破产的现状下，唯有克苦耐劳的人，是生存的最适者；若个个人想享福，个个人想做官括地皮，那天下就无百姓，中国的领土，也马上要被括完卖完了。我常在计算，在目下的中国，亡了之后，也一样的可以享福无碍的人，总计大约也只有一百个。他们是美国也有一千万元存款，日本也有

一千万元，英国义国法国各有一千万元存款存在那里的；所以中国亡了，他们可以去日本，日本不容，他们可以去纽约伦敦巴黎。可是他们的子孙呢？戚属呢？万一世界各国，同时一致行起希脱勒的虐杀犹太人那么的政策来的时候，他们将往那里去逃呢？无用的私财的堆积，正象人身上生了癌病，愈积愈贫，愈容易促生社会的紊乱，国脉的凋丧，结果也不过一个人享受了十年五年，他们的子孙是一样的要做亡国流民的。古人的不以良田遗子孙，又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随身的种种教训，就在告诉我们要养成一种可以营独立职业的技术，才是做人的正道。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学校生活》第一一一、一一二期合刊

国 道 飞 车 记

两浙的山水，差不多已经看到十之七八了，只有杭州北去，所谓京杭国道的一带，自从汽车路修成之后，却终于没有机会去游历。象莫干山，象湖州，象长兴等处，我去的时候，都系由拱宸桥坐小火轮而去，至今时隔十余年，现在汽车路新通，当然又是景象一变了，因而每在私私地打算，想几时腾出几日时间来，从杭州向北，一直的到南京为止，再去试一番混沌的游行。

七月二十一日，亦即阴历六月下旬的头一天，正当几日酷暑后的一个伏里的星期假日，赵公夫妇，先期约去宜兴看善卷庚桑两洞的创制规模；有此一对好游侣，自然落得去领略领略祝英台的故宅，张道陵的仙岩了。所以早晨四点钟的时候，就性急慌忙地立向了苍茫的晨色之中，象一只鹤样，伸长了头，尽在等待着一九五号汽车的喇叭声来。

六点多钟到了旗下，和朱惠清夫妇，一共三对六人，挤入了一辆培克轿车的中间。出武林门，过小河寨，走上两旁有白杨树长着的国道的时候，大家只象是笼于里放出来的小鸟，嘻嘻哈

哈。你说一声“这风景多么好啊！”我唱一句“青山绿水常在面前！”把所有的人生之累，都撒向汽车后面的灰尘里去了。

飞跑了二三十分钟，面前看见了一条澄碧的清溪，溪上有一围小山，山上山下更有无数的白壁的人家，倒映在溪水的中流，大家都说是瓶窑到了；是拱宸桥以北的第一个大镇，也就是杭州属下四大镇中间的一个。前两个月，由日本庚款中拨钱创设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尾博士来浙江调查地质，曾对我说过，瓶窑是五百年前窑业极盛的地方；虽则土质不十分细致，但若开掘下去，也还可以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古瓶古碗来。车从那条架在苕溪溪上的木桥上驶过，我心里正在打算，想回来的时候，时间若来得及，倒也可以下车去看看，这瓶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当这一个念头正还没有转完，汽车到了山后，却迟迟迟地突然发出了几声异样的响声。勃来克一攀，车刹住了；车夫跳下去检查了一下，上来再踏，车身竟摆下了架子，再也不肯动了；我们只能一齐下来，在野道旁一处车水的地方暂息了一下尘身。等车夫上瓶窑公路车站去叫了机器师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几个茶叶蛋，两杯黄酒，和三个梨儿；而四周的野景，南面的山坡，和一池浅水，数簇疏林，还不算是正式的下酒之物。

唱着自然的大道之歌，和一群聚拢来看热闹的乡下顽童，亨落呵落地将汽车倒推了车站的旁边，赵公夫妇就忙去打电话叫汽车；不负责任的我们四人，便幸灾乐祸，悠悠地踏上了桥头，踏上了后窑的街市，大嚼了一阵油条烧饼，炒豆黄金瓜。好容易把电话打通，等第二乘汽车自杭州出发来接替的中间，我们大家更不忙不怕，在四十几分钟之内，游尽了瓶窑镇上磨子心，横街等最热闹的街市，看遍了四面有绿水回环着的回龙寺的伽蓝。

当第二乘接替的汽车到来，喇叭吹着，催我们再上车去的一刻，我们立在回龙寺东面的小桥栏里，看看寺后的湖光，看看北面湖上的群山，更问问上这寺里来出家养老，要出几百元钱才可以买到一所寮房的内部组织，简直有点儿不想上车，不想再回到红尘人世去的样子。

因为在瓶窑耽误了将近两小时的工夫，怕前程路远，晚上赶不及回杭州，所以汽车一发，就拼命地加紧了速度；所以驶过湖州，驶过烟波浩荡的太湖边上，都不曾下来拥鼻微吟，学一学骚人雅士的流连风景。但当走过江浙交界的界碑的瞬间，与过国道正中途，太湖湖上有许多妨碍交通的木牌坊立着的一霎那，大家的心里，也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种感慨，这是人类当自以为把“无限”征服了的时候，必然地要起来的一种感慨，宇宙之中，最显而易见的“无限”的观念，是空间与时间；人生天地间，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来一较量，实在是太渺小太可怜了，于是乎就得想个法子出来，好让大家来自慰一下。所以国界省界县界等等，就是人类凭了浅薄的头脑，想把无限的空间来加以限制的一种小玩意儿；里程的记数，与夫山川界路的划分，用意虽在保持私有财产的制度，但实际却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无限”想加以征服的企图。把一串不断的时间来划成年，分成月，更细切成日与时与分，其用意也在乎此，就是数的设定，也何尝不是出于这一种人类的野心？因为径寸之木，以二分之，便一辈子也分不完，一加一地将数目连加上去，也同样一辈子都加不尽的。

车过太湖，于受到了这些说不出理由的感动之外，我们原也同做梦似地从车窗里看到了一点点风景。烈日下闪烁着的汪洋三万六千顷的湖波，以及老远老远浮在那里的马迹山洞庭山等的岛

影，从飞驰着的汽车窗里遥望过去，却象是电影里的外景，也象是走马灯上的湖山。而正当京杭国道的正中，从山坡高处，在土方堤下看得见的那些草舍田畴，农夫牛马，以及青青的草色，矮矮的树林，白练的湖波，蜿蜒的溪谷，更象是由一位有艺术趣味的模型制作家手捏出来的山谷的缩图。

从国道向西叉去，又在高低不平的新筑支路上疾驰了二三十分钟，正当正午，车子却到了善卷洞外了。

善卷洞外的最初的印象，是一排不大有树木的小山，和许多颜色不甚调和的水泥亭子及洋房，虽说是洋房，但洞口的那一座大建筑物，图样也实在真坏；或许是建筑未完，布置未竣，所以给来游的人的最初印象，不甚高明；但洞内的水门汀路，及岩壁的开凿等工程，也着实还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在我们这些曾经见过广西的岩洞，与北山三十六洞天的游客看来，觉得善卷洞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山洞而已，可是储先生的苦心经营，化了十余万块钱，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工的那一种毅力，却真值得佩服得很。善卷洞的最大特点，是由洞底流向后山出口的那一条洞里的暗水，坐坐船也有十几分钟好走；穿出后山，豁然开朗，又是一番景象了，这一段洞里的行舟，倒真是不可埋没的奇趣。我们因为到了洞里，大家都同饿狼似地感到了饥饿，并且下午回来，还有二三百里的公路要跑，所以在善卷洞中只匆匆看了一个大概。附近的古迹，象祝英台的坟和故宅，上面有一块吴天玺元年封禅國碑立着的国山等处，都没有去；而守洞导游的一群貌似匪类的人，只知敲竹杠，不知领导游客，说明历史的种种缺点，更令我们这六位塞饱了面包和罐头食物的假日旅行者，各催生了可嫌的呕吐。竹杠原也敲得并不很大，但使用一根手杖，坐一坐洞里的

石磙，甚而至于舒一舒下气，都要算几毛几分的大洋，却真有点几气人。

从善卷洞出来，大约东面离洞口约莫有十里地左右的路旁，我们又偶然发现了一个芙蓉古寺。这寺据说是唐代的名刹，象是近年来新行修理的样子，四围的树木，门外的小桥，寺东面的一座洁净的客厅，都令人能够发生一种好感；而临走的时候，对于两毫银币的力钱的谢绝，尤其使我们感到了僧俗的界别；因为看和尚的态度，倒并不是在于嫌憎钱少，却只是对于应接不周的这件事情在抱歉的样子。

再遵早晨进去的原路出来，走到了一处有牌坊立着的三叉路口，是朝南走向庚桑亦即张公洞去的支路了，路牌上写着，有三公里多点的路程。

张公洞似乎已经由储先生完全整理好了，我们车到了后洞的石级之前，走上了对洞口的那一扇门前坐下，扑面就感到了一阵冷气，凉隐隐，潮露露，立在那一扇造在马鞍小岭上的房屋下的圆洞门前发着抖，更向下往洞口一看，从洞里哼出来的，却是一层云不象云，烟不似烟的凉水蒸气。没有进洞，大家就高兴极了，说这里真是一块不知三伏暑的极乐世界。喝了几口茶，换上了套鞋，点着油灯，跟着守洞的人，一层一层的下去，大家的肌肤上就起了鸡粒，等到了海王厅的大柱下去立定，举头向上面前洞口了望天光的时候，大家的话声，都嗡嗡然变成了怪响。第一是鼻头里凝住了鼻液，伤起风来了，第二是因为那一个圆形的大石盖，几百丈方的大石盖，对说话的人声，起了回音。脚力强健的赵公夫妇，还下洞底里去看了水中的石柱，上前洞口去看天光，我们四个却只在海王厅里，饱吸着蝙蝠的大小便气，高声乱唱了

一阵京调，因而嗡嗡的怪响，也同潮也似地涨满了全洞。

从庚桑洞出来，已经是未末申初的时刻了，但从支路驶回国道，飞驰到湖州的时候，太阳还高得很。于是大家就同声一致，决定走下车去，上碧浪湖头去展拜一回英士先生的坟墓。道场山上的塔院、湖州城里的人家，原也同几十年前的样子一样，没有什么改易，可是碧浪湖的湖道，却是淤塞得可观，大约再过几十年，就要变得象大明湖一般，涨成一片的水田旱道无疑了；沧海变桑田，又何必麻姑才看得见，我就可以算是一个目睹着这碧浪湖淤塞的老寿星。

回来的路上，大约是各感到了疲倦的结果，两个多钟头，坐在车子里面，竟没有一个人发放一点高声的宏论；直到七点钟前，车到旗下，在朱公馆洗了一洗手脸，徒步走上湖滨菜馆去吃饭的中间，朱公才用了文言的语气，做了一篇批评今天的游迹的奇文，终于引得大家哈哈地发了笑，多吃了一碗稀饭，总算也是这一次游行的一个伟大的结局。

“且夫天下事物，有意求之，往往不能得预定的效果；而偶然的发生，则枝节之可观每有胜于根干万倍者。所谓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古语，殆此之谓欤？即以今日之游踪而论，瓶窑的一役，且远胜于宜兴之两洞；芙蓉的一寺，亦较强于碧浪的湖波；而一路之遥山近水，太湖的倒映青天，回来过拱埠时之几点疏雨，尤其是文中的佳作，意外的收成。总而言之，清游一日，所得正多，我辈亦大可自慰。若欲论功行赏，则赵公之指挥得体，夫人的辎重备粮，尤堪嘉奖；其次则飞车赶路，舆人之功不可磨；至于吟诗记事，播之遐迩，传之将来，则更有待乎达翁，鄙见如此，质

之赵公，以为何如？”

这一段名议论，确是朱公用了缓慢的湖北官音，随口诵出来的全文，认为不忍割爱，所以一字不易，为之记录于此。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三十一日、八月一日《东南日报·沙发》

送王余杞去黄山

新凉起来的时候，最容易怀念远地的故人。过了一个夏，犹如做了一世人；凉冷一点，头脑清晰一点了之后，就象隔世重生的样子，会这个那个的想起许多好久不见面的朋友来。

早晨刚发出了一封启明先生的信，问他宋将军回后的北地情形是如何，晚上余杞却从天津来了；在我，正仿佛是诗人但丁，从地狱里出来后，又到了天堂的故人的边上，这当然是心里高兴快活的比喻。

自从去年别后，和余杞又有一整年不见面了；平日懒得写信，所以在这一年之间，几乎只通了一两次短简。这一次他由北宁路局派赴青岛，料理铁道展览会的事务，居岛三月，事务完了，照例是有半月慰劳假给的，他就利用了这两星期的闲暇，一枝手杖、一卷铺盖地来了杭州，打算上黄山去旅行了。

去黄山之约，我已经是失信了好几次的；去年建设厅之约爽了；前天项美丽女士和邵洵美氏并且还来硬拉，一定要我参加他们的旅行团，去一上莲花峰的绝顶；但因本月二十一日有不得已

的事故，要回富春江去一行，所以终于辞却了他们的盛意，累得连有交换条件的陈万里先生都无意再和他们同去。现在，余杞又来约了，前后计算起来，约而未去的黄山之行，到今朝，总足足有了四五次之多；其中的原因，机缘的不巧，原是最大的理由，但我自己的内心准备的不足，与近年来身体的衰弱，也是实际的理由的两个。

游高山大水，是要有阔大的胸襟，深远的理想，饱吸的准备，再现的才能，才称合格；此外还须有徐霞客似的一双铁脚，孙行者似的一身本领。前两年血气方刚，自问虽则没有具备着这种种资格，却还抱有着一种不顾前后的勇气；攀高涉险死便埋我，此外就无问题了，所以以渺渺的一身，终也走尽了数万里的远路。现在衰极了，第一眼睛就不行，第二饮食起居都填入一种深沉的轨道，移动不得了。

余杞年纪方青，写大作品的兴致还很热烈，而又值这秋高气爽的年时，得了两星期的例假，青春结伴，自然正好出去漫游；我希望你回来之后，能有三十六峰似的劲笔，将俯视长江，横游云海，摘星斗，涉虬松，过阎王壁，进文殊洞的种种经历，都溶化入你的正在计划写的长篇小说中。我在斗室里，翻着前人的游记，指点着浙江安徽的地图，将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想象你的进境，预祝你的成功。

黄山的地势，我也很熟；黄山的好处，我也约略说得出来；等他年你回了四川，我或者也将去峨嵋，让我们到了长江上游，再来慢慢的谈下游的胜境，过去的回思罢！现在只写这一篇空文，略壮一壮你的行色。

二十四年九月

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东南日报·沙发》

过 富 春 江

前两天增嘏和他的妹妹，以及英国军官晏子少校（Major Edward Ainger）来杭州，我们于醉谈游步之余，还定下了一个上富春江去的计划。

这一位少校，实在有趣；在东方驻扎得久了，他非但生活习惯，都染了中国风，连他的容貌态度，也十足带着了中国气。他的身材本不十分高大，但背脊伛偻，同我们中国的中年人比较起来，向背后望去，简直是辨不出谁黄谁白；一般军人所特有的那一种挺胸突肚，傲岸的气象，在他身上，是丝毫也不具的。他的两脚又象日本人似地向外弓曲，立起正来，中间会露出一条小缝，这当然因为他是骑兵，在马背上过日子过得多的缘故。

他虽则会开飞机，开汽车，划船，骑马，但不会走路；所以他说，他不喜欢山，却喜欢水！在西湖里荡了两日舟，他问起近边更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我们就决定了再陪他上富春江去的计划；好在汽车是他自己会开，有半日的工夫，就可以往返的。

驶过六和塔下，走上江边一带波形的道上的时候，他果然喜

欢极了，他说这地方有点象日本的濑户内海。江潮落了，江水绿得迷人；而那一天午后，又是淡云微日的暮秋天，在太阳底下走起路来，还要出一点潮汗。过了梵村，驰上四面是小山，满望是稻田的杭富交界的平原里，景象又变了一变，他说只有美国东部的乡村里，有这一种干草黄时的和平村景，他倒又想起在美国时候的事情来了。

由富阳站里，沿了新开的那条环城马路，把车开到了鹳山脚下，一步登天，爬上春江第一楼头眺望的时候，他才吃了一惊，说这山水真象是摩西的魔术。因为车由凌家桥转弯，跑到杭富道上，所见的只是些青山平谷，茅舍枫林；到得富阳，沿了那座弓也似的舒姑屏山脚，驶入站里，也只能看到些错落的人家，与一排人家南岸的高山；就是到了东城脚下，在很狭的新筑马路上走下车来的一刻，没有到过富阳的人，也决不会想到登山几步，就可以看见这一幅山重水复的黄子久的画图的。

我们在山头那株樟树下的石栏上坐了好久，增嘏并且还指着山下的一块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石碑，将范文正公的《祠堂记》，以及上面七里泷边东台西台的故事，译给了这一位少校听。他听到了谢皋羽的西台恸哭的一幕，却兴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拿这个故事来做一本戏剧？象席勒的《威廉退儿》一样，这地方倒也很可以起一座谢氏的祠堂。"

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一面开着车，眼睛呆呆看着远处，一边却幽幽的告诉我和增嘏说："我若要选择第二个国籍的话，那我情愿来做个中国人。"

车过分境岭后，他跳下车来，去看了一番建筑在近边山上的碉堡；我留在车里，陪伴着一位小姐，一位太太，从车窗里看见

了他的那个向前微俯的背影，以及两脚蹒跚在斜阳衰草的山道上的缓步，我却突然间想起了一篇哈代的短篇，题名叫作《忧郁的骑兵》的小说。联想一活动，并且又想起刚才在鹳山上所谈的那一段话来了，皱鼻一哼，就哼出了这样的二十八字：

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
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

双十节近在目前，我想将这几句狗屁诗来应景，把它当作国庆日的哀词，倒也使得。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东南日报·沙发》

记曾孟朴先生

当孟朴先生作故的时候，《东南日报》的记者黄萍荪先生，曾来访问过我，已经将先生的身世，约略讲过一遍了，后来看见邵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郑君平先生在《新小说》上，各做过一篇关于曾先生的文字，现在在林语堂、陶亢德两先生合编的《宇宙风》上，并且还登载了哲嗣虚白先生自己编撰的一部很详尽的孟朴先生的《年谱》，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经过，和著作学问以及任事履历的人，但须去翻读第二三四期的《宇宙风》就对，这里我只想写一点先生和我个人的交谊。

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后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们的金屋书店，开幕了不久，后来又听见说，曾先生

父子，也拉集了几多股子，开起真美善书店来了；我当时因为在生病，所以他们开幕的时候请客，终于没有去成。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象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从他们的口里，我于听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与他的老而益壮的从事创作精神之余，还接到了一个口头招请，说曾老先生也很想和我谈谈，教我有空，务必上他家里去走走。这时候，他住在法界的马斯南路，我住在静安寺的近旁，心里虽则也时常在向往，但终因懒惰不过，容易发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当真美善开后的一年之中，还没有和他见一面的缘分。

后来，书业衰落了，金屋书店因蚀本而关了门。真美善也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老曾先生把家迁移了，迁住到了离我的寓舍不远的静安寺路犹太花园对面的一处松寿里中。

记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气很寒冷，洵美他们在我们家里吃饭。吃过饭后，没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议。上了洵美的车一拐弯，不到三分钟的时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们还正在那里吃晚饭。

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虽则年龄和我相差二十多岁，虽则嘴上的一排胡子也有点灰了，但谈话的精神的矍铄，目光神彩的奂奕，躯干的高而不曲，真令我这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了满面的羞惭。先生的体格，原是清癯的，那时候据说还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种丰彩，却毫没有一点病后的衰容。

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谈到了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限界。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那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坐到了夜半，才兹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

自从这一次见面之后，曾先生的印象，便永远新鲜活泼地印入了我的脑里；后来他与虚白先生合译的那本《肉与死》出版了，当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册赠送本，这一本三百多页的大著，因为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荐的作品，书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读到了早晨的八点。

先生的忏悔录的《鲁男子》，因为全书的计划很大，到现在也仍还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当时正想翻读的当儿，又因一转念，等出完了之后再读不迟，终于搁了下来。事后追想起来，何以那时候会偷懒到这一个地步，不于曾先生的生前，精读一下他这部晚年的巨著，当面去和他讨论讨论？现在虽则悔恨到了万分，可已经是驴鸣空吊，无补于实际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温和，十分的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象春风似的慰抚。有一次记得是张若谷

先生，提起了他的《鲁男子》里的某一节记叙，先生就露现了这一种笑容；当时在他左右的人，大约都不曾注意及此，我从侧面，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这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别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寿辰，同时也是他第三位公子新婚的日子；上海的一批朋友，大家是约好去常熟拜寿道喜的，我因为不在上海，终于错过了这一次游常熟的机会。等洵美他们回来之后，大家说起这一次常熟之游，还是谈得津津有味，对我说："可惜只缺少了你们夫妇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们去的。"这一回喜事过后，曾先生的身体，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后真美善也闭了店；先生的踪迹，只在苏州常熟的两处养病闲居，不常到上海来了，这中间我并且又迁到了杭州；嗣后一直到接先生的讣报为止，终于没有第二次再见先生一次面的机遇。不过现在虽和先生的灵榇远隔千里，我只教闭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丰貌，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眼帘之上。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长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越风》半月刊第一期

西溪的晴雨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前两星期，源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西溪的一项；恰巧第二天又下了微雨，秋原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西溪，好教源宁去尝一尝这西湖近旁的野趣。

天色是阴阴濛濛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霉灰的阴气。

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一耸肩膀，大家都说，可惜忘记带了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坞的溪旁，走进窗明几净的静莲庵（？）堂去坐下，喝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象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益，你若坐在汽车座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一派空明，遮盖在淡绿成阴的斜平海上；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从留下下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还不足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移上你的面前来，和你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

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个站在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使桨，身体一伸一俯，一往一来，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边，竹西歌吹的闲情，而源宁昨天在漪园月下老人祠里求得的那枝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文，是《鄘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作“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后便到了交芦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里，带水拖泥，终于也感不到什么的大趣，但这一天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源宁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

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了芦花怒放

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精馔相待，聊当作润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一剑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十四个字，我也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那里见过的联语："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

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象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东南日报·沙发》

雨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喜，因其难得之故。象今年那么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那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

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的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王二南先生传

先生是杭州人的一位代表的典型。凡在杭州人性格中所有的特异处，都具备在先生的一身。自然，杭州人的弱点，也不免略具着些。

先生的曾高始祖，于何时始迁杭州，我并不知道。是琅琊系呢，抑太原系？是田齐之后呢，还是比干或信陵君之后呢，我也无从说起。先生晚年，日夜在编的一部《三千年王氏世系叙略》，不幸属稿未终，就去世了；上面只追溯到了周秦，下面不过叙到了两晋南北朝之际。然而先生平时告我，每说真正的杭州土著老百姓，近来是很少了，王氏就是这些仅少的土著老百姓中间的一族。

我生也晚，和先生相去，远隔着四十多年（先生生咸丰三年癸丑，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又以少时流寓四方，杭郡耆旧，亲睦得很少，所以和先生游处的时日，只有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以后的四五年光景。

与先生相识，当然是由于先生孙女映霞的绍介。映霞本姓

金，实系先生长女之所出，按例为先生的外孙女，但因先生的一子早世，无所出，故将映霞及伊幼弟抚育，以继王氏之宗。我平时亦常以爹爹呼先生（杭州俗语，爹爹即祖父之亲称），不过自相识以后，熟而缺礼，和先生时时对酒谈诗书，一顿饭，总要吃尽三四个钟头；有时夜半起来，挑灯，喝酒，翻书，谈古今，往往会痴坐到天亮；先生不以尊长自居，我也不觉得先生是长两辈的亲属；所以现在在这里写他的回忆，也仿佛只是一个后学小子，在对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前辈，直抒着胸臆间不能自已的仰慕与追思，亲属的观念，倒并不觉得十分浓厚似的。这，一半虽然也是由于我的不恭少敬的天性之所致，但是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度的感化，想来还是更大的原因无疑。

十五年丙寅的秋季，在上海和因避乱而寄寓在法界的映霞认识以后，十六年春，为了政治及个人的关系，我不得不逃到杭州来小住。那时候，先生正在梅花碑的育婴堂里任董事。初次与先生见面，是在育婴堂的那一间会客室里，记得是一天阴寒欲雨的早春天。

当时，我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因政治关系而入了停滞的状态；对于前妻并子女的离异赡养等问题，又因现款无着，祖产未分，而处到了两难之境；尤其是危急的一个生死关头，是因为有几位朋友的政见之故，我也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的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虽起

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

先生一见，就殷殷以保养身体为劝，对于我与映霞的结合，也不持异议，但问祖产分后，让给前妻，也够得她们母子的衣食否？说到后来，先生还微叹着气，笑念出了两句“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的梅村的名句来。

这一年，先生已经有七十五岁了，圆头大耳，面色红润，肌肉也非常丰硕，说话的声气，沉着洪爽，而微笑起来，真有点象弥勒的塑像。

在杭州养病的中间，和先生谈话的机会很多，自己的过去七十五年中间的悲欢起伏，在旁人是决不能忍受的打击与被欺，先生谈的时候，总不改他的微笑的态度，仿佛是在谈利害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先生是于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寅时，生在宁波宁绍台道的官署里的，那时候先生的父亲六平公正在段镜湖观察的幕里佐金榖。

“九月廿八，本来是财神的生日，象我这样的一个穷措大，居然会和财神同一日生，你说可笑不可笑？”

先生每次谈到他的生日，总忘不了对运命之神，作一段诙谐。听他的口吻，看他的神气，却并不是在怨贫，倒是真正地在乐道。

七岁上，因六平公的出宰沙县，先生也就上福建延平府下的这沙县去读书了。第二年庚申，咸丰十年，再下一年辛酉，咸丰十一年，杭州曾两次陷入洪杨军手，先生一家总算因宦游在外，得免于惊恐。

先生的敏慧，自小就有名了。每谈到十二岁时，就为宁德县

学云南汤四如先生所赏识，十六岁时，为徐寿蘅学使所拔擢，十九岁时补廪的种种过去，先生于破颜一笑之余，总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两句话来自嘲自慰；看他笑着说出这两句结尾语的时候，我总要想起“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那一首诗来，而为他悒郁；但先生自己，却说完就忘了似的，又去看他的书，喝他的酒，或睡他的觉，干他的事去了。

廿一岁时，考试选拔，头场取列，二场因母病不去，是先生一生功名潦倒的开始。其后十余年中丧母丧父，托人经营的钱庄数家，同时破产；更因给嫁海宁查氏以四妹之故而倾家，甚至于弄得饘粥不继，不得不依敷文，崇文，紫阳，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五个书院的膏火收入以自活；你试想想，一个不更世事的宦家迂腐少年，同时遭遇着了这种种的重大打击，谁能够免得了不垂头丧气，从此一蹶不振，萎靡下去的呢？而先生，却也不改他的常态，只苦笑着说：“大约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我也！”当这时候的先生的这种旷达的风度，是适赵氏的先生的三妹，今年已达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的餐霞老人向我说的。先生是独子，姊妹却有四人，长适陈氏，早故，仲姊先亦适查，殁后又以四妹嫁过去的。

先生生平的知己，第一个要算是当时在浙江做按察使的安徽寿州孙稼生氏。氏名家穀，咸丰丙辰进士，由荆宜施道，升任浙江按察使司；当时的三司六道，凡由科甲出身的人，总爱上书院去阅卷课士，分出他们一部分的俸来，助作膏火。这位孙按察使于庚辰年（按这一年先生正念八岁）的四月，在诂经精舍看到了先生的《筹海赋》和三十首上下平韵《西湖棹歌》的卷子，早在想和先生见见，谈谈文艺了；他这一个募才下士的心愿，不意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很奇异地实现了出来；这事情若说得玄妙一点，倒真可以

做一对从前的章回小说里的回目，叫作："三雅园谈诗，穷士千秋逢伯乐；二南公作赋，江城五月落梅花。"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这一年六月的有一天午后，先生正与同人等从西湖接卷回来，在三雅园的西室里喝茶。前一月的课题，是一篇《江城五月落梅花赋》，先生的卷子，考在第一。他们的一群人正在将旧卷互评互赞的中间，一位衣冠楚楚，举止不凡的中老先生，却也混到他们的中间去倾听，细阅，攀谈起来了；朗诵了一回先生的卷子，又读出了几句《西湖棹歌》里的警句，直到先生请教他的名姓的时候，这一位老者才微笑着说出了真名实姓，与两月来的向慕之殷。这位孙廉访的微服出游，本意也许是在私行察访，但结果却成了个后车载士的近代的桓公。从这一回后，先生后半生的事业便决定了，就是入幕为宾，去各府院阅试卷，为书院山长或大学教授等闲冷的小头衔。

从庚辰年念八岁起，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五十八岁止，先生曾到过宁波(入鄞县陈槐庭大令幕)，萧山(为商禹卿西宾)，绍兴(入霍子方太守幕)，诸暨(入倪恳山大令幕)，东阳(掌教东白书院)，义乌(掌教绣湖书院)，嘉善(入苏俪笙刺史幕)，秀水(入寿子千大令幕)，宁海，归安等处，虽则所入甚微，但先生却葬了双亲，养大了一儿一女，各办嫁娶，周济了朋友，更为苏俪笙刺史代垫了巨款；从这一篇粗账来下一个观察，则先生的自奉的俭约，与待人的宽大，也就可以想见的了；谁知苍天偏不佑忠良，对于先生，真象是要降以大任似的，在革命前后的六七年间，竟连接不断地赐予了先生以种种怎么也意想不到的横祸。

鼎记庆余的两家先生所开的那钱庄的倒闭，已经在前面说起过了，倒还不算是了不得的打击，最使先生的老境难堪，觉得象

我们这样的常人决受不了的，却是民国三年先生的夫人胡恭人与媳华氏的相继双亡，翌年八月，先生独子的去世，又下一年的十二月，拱宸桥永安里寓所的失慎，越三年，当先生六十七岁时，爱婿的物故等等伤心的惨事。

入民国以后，先生虽则仍旧精神矍铄如从前，兴趣也不衰于往日，但老命迍邅，只身孤苦的际遇，终竟也影响到了先生的出处。历任省长象齐照岩，沈叔詹，夏定候诸前辈，都仰慕先生的高洁，佩服先生的才略，想借重先生，来做一个耆年硕德的名教模楷的；但先生却心早灰了，对于他们各位的敦劝，只承认做一个孔庙的奉祀官（一直任至国民革命军入杭州的那一年为止），与育婴堂的董事，以尽他的暮年卫道，且为浇薄的社会服一点务的初衷。

国民革命军入浙之先，先生为避免兵乱，曾经一度迁住过上海，这一段时期，就是我领先生的教益最多的几年。我们平常人的记忆力，大约总是幼年极强，中年消褪，老年全无的，而先生却独不然，那时候先生已经有七十五岁了，有一次看见我在翻汲古阁本的《三国志》，先生就问我要查那一个的事实，我就以"庞士元非百里才"的一句话的出处对，先生不借思索，就回答说：

"是鲁肃对先主说的话：'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你且翻开蜀志卷七，头一二页上就有了。"

我翻开来一看，真惊异得想叫起来，非但卷数不错，连页数都是对的。就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先生平时读书的用心来了，而少年时读在那里的浩漫的经史，直到老年，还记得这样清楚，实在是我生平只见到过一次的奇迹。

先生的性格，矛盾的地方也很多；生性本来是十分俭约的，但对于居室，先生却总喜欢住高大的房子。寄寓在上海的时候，一个讲究国学的群治大学，来聘先生去教书；先生以这样大的年纪，以素来不善步行的双脚，有时候去上课及回来，总老是不肯乘坐一步人力车。问他何苦如此，先生又微笑着回答说："只想省下几个车钱来付房租。"对于宗教的迷信，先生是以宋儒一贯的态度来排除的，所以先生所注的佛经，引用的都是儒家之语；但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先生总是五更起来，焚香沐手，要虔虔敬敬的卜一个文王卦来决这一年的休咎；这习惯先生一向没有忘记过，直到先生去世的那一年为止。先生对待坏人，总非常的宽厚，平时老持着一个恕字作根基，每对我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决不可负天下的任何人。"但对于自己的小辈，却又严谨得非常，说："在家里不吃苦，怕要到社会上去吃苦不好。"

先生的技艺，样样都能和专家比甲乙，自写字，刻金石，仿谜语，唱道情起，一直到缝衣补袜，制印泥，种花木，为小孩子们做玩意儿止，总件件都做得非常出色。我每惊叹他的多艺，私问他的秘诀，先生就以出卖捉臭虫秘方的笑话对我说："凡事总不外乎一个勤字，不要灰心，不要自弃，什么事情总做得好的。"

国民革命军平定江浙之后，先生又自上海迁回到杭州来住了，所以当先生作故的前一二年，我和他不能够日日的见面。每一次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里，玩两三天，先生就惦记杭州，想回来了！我问他杭州有什么好处，值得这样的怀恋？先生又笑着说："年纪大了一点，就只想和同年辈人谈谈，在上海总觉得找不到这么些个朋友。"

先生在杭州的知友，象扬见心先生，陆佑之先生，陈蝶仙先

生父子，孙廑才先生等，我都是由先生之介而认识的！至于比先生早故的吴公祇修，高公白叔等，我却不及见了。从前的人说，看了一个人的朋友，就知道他的为人！先生生前的益友数辈我近来也颇有接谈的机会，一见到他们的那种长者的丰度，我就要想起先生，所以会双重的感到如坐在霁月光风的怀里。

先生的同胞姊妹，都是和先生一样的老而不衰！我每见到先生和杭州适赵的三姑母太太与上海适查的四姑母太太的聚首欢谈，见到他们几位白发盈颠的老兄老妹，还亲爱得象少年时候一样，心里总要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高年阅世，确是人生最难得的一种机会！我少年时期的那一种厌世偏向的渐渐减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

闲时我也常问先生以养寿之方，先生于一般人所说的清心寡欲的四字之外，还加了一句说"少怒！"万事逆来顺受，退一步想，不与人争，寿自然是长了。

先生不喜蓄须，头每十日一剃，所以自署作不须老人！他的意思，虽在说妻财子禄，一无须要，但暗射双关，先生对这称号自己也很得意。酒酣耳热，先生就喜欢玩这些小玩意儿；譬如自己刻几个雅号的图章，做些谜语诗，或写一条格言贴在座右之类！而先生所最擅长的，却是在对对子。有一次我说到了曾在广西肇庆的望江楼上听到过一个对语，叫"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前人对的是"朝天寺外朝天子，天子万年，天寺万年。"先生嫌朝天寺拆成天寺还不大好，而且寺与子由杭州人念来，音总还不同楼流一样，就接着说："你们奶奶死，我曾在大佛寺里拜过七日的经忏追荐她，这里倒有一个现成的对子，是'大佛寺中大佛事，佛事当年，佛寺当年。'"还有先生最喜欢向人说的，是高公

封叔家有一次喜事，系先生做的媒人。先生在高庄账房里和账房分吃厨房孝敬账房的小菜，依杭州的俗例，这似应叫作小水的！高公见了，就笑对先生说："大宾吃小水，这对子若对得出，请你吃东道。"先生即口回答说："对出了！明天就请我落西湖怎么样？"高公说："算数！"先生说："那么已经对出了。"高公问："对什么？"先生说："岂不是东道落西湖么？"

先生的病是脑溢血，俗称中风的急症。民国二十年辛未的五月里，前几日正为黑龙江主席的母太夫人写成了两篇寿序，接着还在做律诗四首；但做到半夜，人就跌倒了。我和映霞在上海接到电报，赶来的时候，先生还能开口！听到了我们的到，先生还张眼看了我们一眼，读了几首新做的诗给我听。后来笑了一脸，眼睛闭上之后，就一直的长眠了；回想起来，正仿佛还是昨日的事情。

先生殁后，我们翻他的遗箧，连讣闻年谱及遗嘱之类，都井井有条地写好在那里，似乎先生已早就预备好有这么一日的样子。此外连竹头木屑，绳索油纸之类，也一篮篮地收拾得完完整整，纸包上都号有内有纸若干，有绳多少，可作什么用，几时几日包藏等字样；先生的整肃的精神，实在要使人感动得涕泪奔流。

先生的坟在洪春桥里头离茅家埠不远的饮马桥边，我每次过岳坟灵隐，总要中途弯进去上墓门前展拜一回，风摇叶落，宿草颠头，恍惚象是又亲承了先生的謦欬一样。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日《越风》半月刊第三、第四期

玉　皇　山

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若五台、普陀各佛地灵场，本来为出家人所独占的共和国，情形自然又当别论；可是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它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这，说是湖山的点缀，当然也可以。

杭州的和尚尼姑，虽则多到了如此，但道士可并不见得比别处更加令人触目，换句话说，就是数目并不比别处特别的多。建炎南渡，推崇道教，甚至官位之中，也有宫观提举的一目；而上皇，太后，宫妃，藩主等退隐之所，大抵都是道观，一脉相沿，按理而讲，杭州是应该成为道教的中心区域的，但事实上却又不然。《西湖游览志》里所说的那些城内外的胜迹道院，现在大都只变了一个地名，院且不存，更那里来的道士？

西湖边上，住道士的大寺观，为一般人所知道而且有时也去去的，北山只有一个黄龙洞，南山当然要推玉皇山了。

玉皇山屹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地势和南北高峰堪称鼎足；登高一望，西北看得尽西湖的烟波云影，与夫围绕在湖上的一带山峰；西南是之江，叶叶风帆，有招之即来，挥之便去之势；向东展望海门，一点巽峰，两派潮路，气象更加雄伟；至于隔岸的越山，江边的巨塔，因为是据高临下的关系，俯视下去，倒觉得卑卑不足道了。象这样的一座玉皇山，而又近在城南尺五之间，阖城的人，全湖的眼，天天在看它，照常识来判断，当然应该成为湖上第一个名区的，可是香火却终于没有灵隐三竺那么的兴旺，我在私下，实在有点儿为它抱不平。

细想想，玉皇山的所以不能和灵隐三竺一样的兴盛，理由自然是有的，就是因为它的高，它的孤峰独立，不和其他的低峦浅阜联结在一道。特立独行之士，孤高傲物之辈，大抵不为世谅，终不免饮恨而终的事例，就可以以这玉皇山的冷落来做证明。

唯其太高，唯其太孤独了，所以玉皇山上自古迄今，终于只有一个冷落的道观；既没有名人雅士的题咏名篇，也没有豪绅富室的捐输施舍，致弄得千余年来，这一座襟长江而带西湖的玉柱高峰，志书也没有一部。光绪年间，听说曾经有一位监院的道士——不知是否月中子？——托人编撰过一册薄薄的《玉皇山志》的，但它的目的，只在搜集公文案牍而已，记兴革，述山川的文字是没有的，与其称它作志，倒还不如说它是契据的好。

我闲时上山去，于登眺之余，每想让出几个月的工夫来，为这一座山，为这一座山上的寺观，抄集些象志书材料的东西；可是蓄志多年，看书也看得不少，但所得的结果，也仅仅二三则而已。这山唐时为玉柱峰，建有玉龙道院；宋时为玉龙山，或单称龙山，以与东面的凤凰山相对，使符郭璞"龙飞凤舞到钱塘"之句；

入明无为宗师，创建福星观，供奉玉皇上帝，始有玉皇山的这一个名字。清康熙年间，两浙总督李敏达公，信堪舆之说，以为离龙回首，所以城中火患频仍，就在山头开了日月两池，山腰造了七只铁缸，以象北斗七星之像，合之紫阳山上的坎卦石和北城的水星阁，作了一个大大的镇火灾的迷阵，于是玉皇山上的七星缸也就著名了。洪杨时毁后，又由杨昌濬总督重修了一次，现在的道观，却是最近的监院紫东李道士的中兴工业，听说已经化去了十余万金钱，还没有完工哩。这是玉皇山寺观兴废的大略，系道士向我述说的历史；而田汝成的《游览志》里之所记，却又有点不同，他说："龙山一名卧龙山，又名龙华山，与上下石龙相接。山北有鸿雁池，其东为白塔岭。上有天真禅寺，梁龙德中钱王建寺，今唯一庵存焉。山腰为登云台，又名拜郊台，盖钱王僭郊天地之所也。宋籍田在山麓天龙寺下，中阜规圆，环以沟塍，作八卦状，俗称九宫八卦田，至今不紊。山旁有宋郊坛。"

关于玉皇山的历史，大约尽于此了，至于八卦田外的九连塘（或作九莲塘），以及慈云（东面）丁婆（西面）两岭的建筑物古迹等，当然要另外去考；而俗传东面山头的百花公主点将台和海宁陈阁老的祖坟在八卦田下等神话，却又是无稽之谈了。

玉皇山的坏处，实在也就是它的好处。因为平常不大有人去，因为山高难以攀登，所以你若想去一游，不会遇到成千成万的下级游人，如吴山的五狼八豹之类。并且紫来洞新开，东面由长桥而去的一条登山大道新辟，你只教有兴致，有走三里山路的脚力，上去化它一整天的工夫，看看长江，看看湖面，便可以把一切的世俗烦恼，一例都消得干干净净。我平时爱上吴山，可以借登高的远望而消胸中的块磊，可是块磊大了，几杯薄酒和小小

的吴山，还消它不得的时候，就只好上玉皇山去。去年秋天，记得曾和增嘏他们去过一次，大家都惊叹为杭州的新发现；今年也复去过两回，每次总能够发现一点新的好处，所以我说，玉皇山在杭州，倒象是我的一部秘藏之书；东坡食蚝，还有私意，我在这里倒真吐露了我的肺腑衷情。

甘四年十一月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文学时代》第一卷第三期

江南的冬景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坑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象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

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象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作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 1843—1918）罢，他用这一个

“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

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感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Hiking，德国人叫作Spaziergang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一号

怀四十岁的志摩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经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阴晦的早晨的凶报，福煦路上遣宅里的仓皇颠倒的情形，以及其后灵柩的迎来，吊奠的开始，尸骨的争夺，和无理解的葬事的经营等情状，都还在我的目前，仿佛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后，我因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见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墓前倾一杯酒，献一朵花，但推想起来，墓木纵不可拱，总也已经宿草盈阡了罢？志摩有灵，当能谅我这故意的疏懒！

综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几年不算外，自从中学入学起直到他的死后为止，我是他的命运的热烈的同情旁观者；当他死的时候，和许多朋友夹在一道，曾经含泪写过一篇极简略的短文，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五年，回想起来，觉得对他的余情还有许多郁蓄在我的胸中。仅仅一个空泛的友人，对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谊的许多女友，伤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说了，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

称他作孩子，或者有人会说我卖老，其实我也不过是他的同

年生，生日也许比他还后几日，不过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也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以之处世，毛病就出来了，他的对人对物的一身热恋，就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甚而至于还不得不遗诟于死后。他和小曼的一段浓情，在他的诗里，日记里，书简里，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那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那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以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觉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六岁——正是壮盛到绝顶的黄金时代。他若不死，到

现在为止，五六年间，大约我们又可以多读到许多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诗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这一部未完的杰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处却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当时，就有人说，志摩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和美人一样，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又和罢伦，奢来的死法一样，确是最适合他身分的死。若把这话拿来作自慰之辞，原也有几分真理含着，我却终觉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发生，虽说是偶然的结果，但我们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这惨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说过的一句话，"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不是身处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无从知道的。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在志摩的死后，再来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劳的事情。所以这次当志摩四十岁的诞辰，我想最好还是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纪念他，较为适当；小曼已经有编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这原是纪念志摩的办法之一，此外象志摩文学奖金的设定，和他有关的公共机关里纪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图书馆的发起，以及志摩传记的编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们后死的友人，来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时势的混乱，当这一个国难的关头，要来提倡尊重诗人，是违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浇薄，现在有些活着的友人，一旦钻营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挤诋毁，诬陷压迫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对于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说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变相的自悼罢！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宇宙风》第八期

浙江的今古

黄梨洲《今水经》述浙江的水源经过说：浙江——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县北七十里浙源山，名浙溪，一名渐溪。东流，经休宁县南，率水入之（率水出休宁县东南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扬之水入焉（扬之水出绩溪县东六十里大鄣山，西流至临溪，经歙县界，抵府城西，入徽溪），为滩三百六十，至淳安县南，为新安江；又东，轩驻溪从北来注之（轩驻溪在淳安县东五十里），又东，寿昌溪从南来注之（寿昌溪在寿昌县六十里）。经建德县界，至严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来（金溪源出开化县马金岭，西北流，绕县治，名金溪。又转而东南流，经常山县，东流，文溪入之。文溪出江山县之石鼓山，东北流，永丰水注之；至江山县南，名文溪；下流合于金溪），会于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环城西北，东流入龙游县界，号盈川溪。又东经兰谿县，东阳水入之（东阳江其源出东阳县大盆山，一出处州缙云县，双溪合流，至府城南为谷溪，西流为兰溪，至严州府城东南二里，入于浙）。又东至严州府城南，

与歙江合浙水。又东至富春山，为富春江；又东至桐庐，桐江北来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经桐庐县北，三里入于富春江）。又东，浦阳江南来注之（浦阳江源出金华府浦江县西六十里深袅山，经浦江县界，北流抵富阳，入于浙江）。又东至杭州府城东三里，为钱塘江；又东，钱清曹娥二江入之（钱清江在绍兴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绍兴府城东南七十里，钱清曹娥二水入于浙江，三水所会在绍兴府城北三十里，谓之三江海口）。浙水又东，而入于海。

这是黄梨洲时代的浙水，去今三百多年，其间小溪涨塞，或新水冲注，变迁当然是有一点，可是大致总还是不错。我也曾到过徽州婺源休宁等处，看见浙水水源，现在仍在东流。又去闽浙赣边境时，亦曾留意看江山玉山各县的溪流，虽则水名因地不同而屡易，但黄梨洲所说的浙水源一出衢州之说，当然可信。所以现在的浙水经过，以及来源去路，还不难实地查考，而最不易捉摸的，却是古代的浙水水源和经过；因为《禹贡》记水，阙而不备，郦道元注《水经》又曲折而多臆说，并且重在饰词，不务实际，是以很难置信。现在但依阮文达公《揅经室集》中的《浙江图考》三卷，略记一记浙水在四千年中的变革经过。

《禹贡》"淮海唯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照阮文达公的考证，则当时的三江，实即岷江之北江中江南江，分岐于彭蠡之东，成三孔而入海者；南江一支，穿震泽（今太湖）西南行至杭州，经会稽山阴，至余姚而入海，就是《禹贡》时的古浙江；后人不察，每以浙江縠水为古浙江，实误。这错误的由来，第一在于古人注三江的不确，如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或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之类。博学多闻如苏东坡，解说三

江，尚多岐异，余人可以不必说了。《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郭氏注谓"《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系误浙江为浙江之一大原因。出安徽黟县者，为浙江，是合入浙江之一水，非古浙江之本身，阮文达公引经据典，考证最详。至郦道元注《水经》时，自震泽西南曲流之浙江故道，已经淤塞不通，故郦氏所注之浙江，曲折回环，形成与现代之浙江完全不附之江水，且说来说去，完全以浙江为浙江了。郦氏注中，关于縠水亦交代不清，以縠水与浙江至钱塘县而始合并，实不可通。班氏《地理志》，述浙江之交流分聚，较郦氏为更明晰；大约以辞害意，未经实地查考的两件弊病，是《水经注》的最大短处，也难怪钟伯敬要割裂《水经注》拿来当作美文读本用了。

总之，经阮文达公的考证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现代的浙江实即浙水縠水两水的合流，亦即黄梨洲《今水经》所说之浙江的二源。而古代的浙江，乃系岷江之南江，过震泽，经吴江石门，由杭州东面经过，出仁和县临平半山之西南，即今塘栖地，复与浙水縠水会，折而东而北，由余姚北而而入海的。

桑田沧海，变幻极多，古今来大水小溪的改道换流，也计不胜计。阮文达公为一水名之故，不惜费数年的精力，与数万字的文章，来证明前人之误，以及古代水道的分流通塞，足见往时考据家的用心苦处。而前人田地后人收，我们读到了阮公的《浙江图考》，对于吴越的分疆，历代战局的进退开展，与夫数千年前的地理形势，便瞭如指掌了；虽则只辨清了水名一字之岐异，然而既生为浙人，则知道知道这一点掌故，也当然是足以自慰的一件快事。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越风》第六期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模仿论创定以来，以为诗的起源是根据于模仿本能的学说，到现在还没有绝迹；论客的富有独断性者，甚至于说出"所有的艺术，都是自然的模仿；模仿得象一点，作品就伟大一点，文学是如此，绘画亦如此，推而至于音乐，舞蹈，也无一不如此"等话来。这句话，虽则说得太独断，太笼统；但反过来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绝大的威力，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

无论是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张画，里面总多少含有些自然的分子在那里，因为人就是上帝所造的物事之一，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决不能够离开自然而独立的。所以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诗的起源的另一个原因，喜欢调和的本能的发露。

自然的变化，实在多而且奇，没有准备的欣赏者，对于他的美点也许会捉摸不十分完全的；就单说一个天体罢，早晨的日出，

中午的晴空，傍晚的日落，都是最美也没有的景象；若再配上以云和影的交替，海与山的参错，以及一切由人造的建筑园艺，或种植畜牧的产物，如稻麦牛羊飞鸟家畜之类，则仅在一日之中，就有万千新奇的变化，更不必去说暗夜的群星，月明的普照，或风雷雨雪的突变，与四季寒暖的更迭了。

我们人类，大家都有一种特性，就是喜新厌旧，每想变更的那一种怪习惯；不问是一个绝色的美人，你若与她日日相对，就要觉得厌腻，所以俗语里有"家花不及野花香"的一句；或者是一碗最珍贵最可口的菜，你若每日吃着，到了后来，也觉得宁愿去换一碗粗肴淡菜来下饭；唯有对于自然，就决不会发生这一种感觉，太阳自东方出来，西方下去，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们可没有听见说有厌看白天晚上的一定轮流而去自杀的人。还有月亮哩，也是只在那么循行，自有地球有人类以来的一套老调，初一出，月半圆，月底全没有，而无论那一处的无论那一个人，看了月亮，总没有不喜欢的，当然瞎子又当别论了。自然的伟大，自然的与人类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就此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了，这就是欣赏自然景物的人类的天性。

欣赏自然景物的本能，是大家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忙于衣食，不便沉酣于大自然的美景，有些人习以为常了，虽在欣赏，也没有欣赏的自觉，因而使一般崇拜自然美的人，得自命为雅士，以为自然景物，就只为了他们少数人而存在的。更有些人，将自然范围限制得很小，以为能如此这般的欣赏，自然景物，就尽在他们的囊中了。下边的四首歌曲，和一张节目，就是这些雅士们的欣赏自然的极致，我们虽则不能事事学他们，但从小处也可以见大，倒未始不是另一种欣赏自然景物的规范。

山居自乐（四季之歌见乾隆御制《悦心集》）　　无名氏

爱山居、春色佳，有桃花有杏花；绿杨深处莺儿啼，天阴草色连云暖，夜静花阴带月斜。兴来时，醉倒荼蘼下；这是俺山中和气，岂恋他金谷繁华？（春）

爱山居，夏日长，抚苍松坐翠篁；南风不用蒲葵扇，放开短发迎朝爽，洗涤尘襟纳晚凉。竹方床，一枕清无汗；这是俺山中潇洒，岂恋他束带矜妆？（夏）

爱山居，秋月清，白蘋洲红蓼汀；芳菲黄菊开三径，风前倚石吹长笛，月下焚香抚玉琴。木兰花，坠露朝堪饮；这是俺山中雅淡，岂恋他人世红尘？（秋）

爱山居，冬景余，掩柴门著道书；红炉榾柮煨山芋，开窗积雪千峰白，绕屋梅花几树疏。兴来时，驴背闲寻句；这是俺山中冷趣，岂恋他车马驰驱？（冬）

明高濂雅尚斋四时幽赏目录：

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保俶塔看晓山。西溪楼啖煨笋。登东城望桑麻。三塔基看春草。初阳台望春树。山满楼观柳。苏堤看桃花。西冷桥玩落月。天然阁上看雨。（以上春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东郊玩蚕山。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压堤桥夜宿。湖心亭采莼。晴湖视水面流虹。山晚听轻雷断雨。乘露剖莲涤藕。空亭坐月鸣琴。观湖上风雨欲来。步山径野花幽鸟。（以上夏时幽赏）西冷桥畔醉红树。宝石山下看塔灯。满家衖赏桂花。三塔基听落雁。胜果寺月岩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资岩山下看石笋。北高峰顶观云海。策杖林园访菊。乘舟风雨听芦。保俶塔顶观海日。六和塔夜玩风潮。（以上秋时幽赏）湖冻初

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节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看晚炊。（以上冬时幽赏）（录自《西湖集览》）

这些原也不免有点过于自命风雅，弄趣成俗之嫌；可是对于有些天良丧尽，人性全无的衣冠禽兽，倒也可以给他们一个警告，教他们不要忘掉自然。我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位同事，是专门学法律的人，他平时只晓得钻门路，积私财，以升官发财为唯一的人生乐趣，你若约他上中央公园去喝一碗茶，或上西山去行半日乐，他就说这是浪漫的行径，不是学者所应有的态度。现在他居然位至极品，财积到了几百万了，但闻他唯一娱乐，还是出外则装学者的假面，回家则翻存在英国银行里的存折，对于自然，对于山水，非但不晓得欣赏，并且还是视若仇敌似的。对于这一种利欲薰心的人，我以为对症的良药，就只有一服山水自然的清凉散，到这里，前面所开的那两个节目，倒真合用了；因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我想中国贪官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设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之所致。

自然景物所包涵的方面，原是极博大，极广阔的；象上面所说的天地岁时，社会人事，静而观之，无一不是自然，无一不可以资欣赏，但这却非要悠闲自得，象朱夫子那么的道学先生才办得到；至于我们这种庸人，要想得到些自然的美感，第一，还是上山水佳处去寻生活，较为直截了当；古今来，闲人达士的游山

玩水的习惯的不易除去，甚至于有溺嗜烟霞成痼疾的原因，大约总也就在这里。

大抵山水佳处，总是自然景物的美点发挥得最完美，最深刻的地方；孔夫子到了川上，就觉悟到了他的栖栖一代，猎官求仕之非；太史公游览了名山大川，然后才死心塌地，去发愤而著书，从知我们平时所感受不到的自然的威力，到了山高水长的风景聚处，就会得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耀到我们的性灵上来；古人的讲学读书，以及修真求道的必须要入深山傍大水去结庐的理由，想来也就在想利用这一点山水所给与人的自然的威力。

我曾经到过日本的濑户内海去旅行，月夜行舟，四面的清葱欲滴，当时我就只想在四国的海岸做一个半渔半读的乡下农民；依船楼而四望，真觉得物我两忘，生死全空了。后来也登过东海的崂山，上过安徽的黄岳，更在天台雁荡之间，逗留过一段时期，每到一处，总没有一次不感到人类的渺小，天地的悠久的；而对于自然的伟大，物欲的无聊之念，也特别的到了高山大水之间，感觉得最切。所以要想欣赏自然的人，我想第一着还是先上山水优秀的地方去训练耳目，最为适当。

从前有一个赞美英国十九世纪的那位美术批评家拉斯肯的人说，他在没有读过拉斯肯以前，对于绘画，对于蒙勃兰高峰的积雪晴云，对于威尼斯，弗露兰斯的壁画殿堂，犹如瞎子，读了之后，眼就开了。这话对于高深的艺术品的欣赏，或者是真的，但对于自然美，尤其是山水美的感受，我想也未必尽然。粗枝大略的想欣赏自然，欣赏山水，不必要有学识，有鉴赏力的人才办得到的；乡下愚夫愚妇的千里进香，都市里寄住的小市民的窗槛栽花，都是欣赏自然的心情的一丝表白。我们只教天良不泯，本性

尚存，则但凭我们的直觉，也就尽够做一个自然景物与高山大水的初步欣赏者了。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第三期

记风雨茅庐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明明知道创造欲是好，所有欲是坏的事情，但一轮到了自己的头上，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我衣并不要锦绣，食也自甘于藜藿，可是住的房子，代步的车子，或者至少也必须一双袜子与鞋子的限度，总得有了才能说话。况且从前曾有一位朋友劝过我说，一个人既生下了地，一块地却不可以没有，活着可以住住立立，或者睡睡坐坐，死了便可以挖一个洞，将己身来埋葬；当然这还是没有火葬，没有公墓以前的时代的话。

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住呢，占据的还是别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而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发表了不久，就来了一个回响。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

或者还可以想法”。四面一凑，于是起造一个风雨茅庐的计划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谓我有了钱，深知我者谓我冒了险，但是有钱也罢，冒险也罢，入秋以后，总之把这笑话勉强弄成了事实，在现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笃笃地动起了工，造起了房子。这也许是我的Folly,这也许是朋友们对于我的过信，不过从今以后，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在这些地方，所有欲原也有它的好处。

本来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当然不能过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情。他说：“你要造房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出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还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屋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的无名的小房间。这么的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

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象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虽则不懂阳宅的地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时候看的原因，就因为我的胆子毕竟还小，不敢空口说大话要包工用了最好的材料来造我这一座贫民住宅的缘故。这倒还不在话下，有点儿觉得麻烦的，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已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象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归原，还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这间贫民住宅，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疯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黄钟》第八卷第一期

雪　　夜

——自传之一章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

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象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象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象似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

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当时的东京，除了几个著名的大公园，以及浅草附近的娱乐场外，在市内小石川区的有一座植物园，在市外武藏野的有一个井之头公园，是比较高尚清幽的园游胜地；在那里有的是四时不断的花草，青葱欲滴的列树，涓涓不息的清流，和讨人欢喜的驯兽与珍禽。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行独步，总能遇到些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象在梦里，也象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会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

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薰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里住满了一年，象上面所说过的那种强烈的刺激，不知受尽了多少次，我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乙卯）的秋天，离开东京，上日本西部的那个商业都会名古屋去进第八高等学校的时候，心里真充满了无限的悲凉与无限的咒诅；对于两三年前曾经抱了热望，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她怀里去的这异国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来见她的面。

名古屋的高等学校，在离开街市中心有两三里地远的东乡区域。到了这一区中国留学生比较得少的乡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国民的轻视虐待，虽则减少了些，但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我的面目的旅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驿的时候，我竟同被恶魔缠附着的人一样，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的看见，再则虑有病毒的纠缠，所以我一直到这时候为止，终于只在想象里冒险，不敢轻易的上场去试一试过。这时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极生

疏，时间又到了夜半，几阵寒风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经喝了几瓶酒后的热血，更激高了许多度数。踏出车站，跳上人力车座，我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返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

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的缊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三个钟头之后，皱着长眉，靠着车窗，在向御殿场一带的高原雪地里行车的时候，我的脑里已经起了一种从前所绝不曾有过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谁来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这就是我当时混乱的一团思想的翻译。

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一期

闽游滴沥之一

今年是一个闰年，——闰三月，——我老早就晓得在阳历二月尽头，要大冷几天；年纪大了一点，怕寒怕暑，比年青时厉害得多了，所以当旧历的年底，就在打算上什么地方去过一个冬尾和春头。

从前在一篇关于住所的话里，也曾提起过住家的适地；我以为北平住家，是最好也没有的地方，其次便想到了国民政府没有定鼎以前的南京，与偏处海滨，同时得享受海洋大陆两种调谐气候的福州。自从这一篇不关大体，猥杂无聊的浅短文字，在《文学》的散文栏里发表以来，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接连着就来了两个反响，致使我直到现在也还不能够逃出它们的圈子。

反响的第一个，是一位有志者的愿意借给我以造屋的金钱；结果，于杭州住屋之旁，一间避风雨的茅庐，就在去年年底，修盖起来了；到了现在，还是油漆未干，画龙之后，终于未曾点睛。反响的第二个，是这一回应了朋友之招，于阴历正月的初头，匆匆出走，附船南下的这一次的七闽之行。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象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等太阳出来了的时候为止。上小面馆去吃了一碗鳝鱼面后，头脑虽说清醒了一点，但将头深缩着在大氅的领里，看看天色，终于还不想马上就去上飘泊的长途。因此捱迟了一刻，又捱迟了一点，终于捱到了八点三十几分，离杭宁特快通车开车前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霞拚命的催我，早就把一包被包，和一只手提箱送上等在门口的黄包车去了，我临时还忘记了一串锁钥。

在阳光眩目的城站月台上立定，侧目西看看凤凰山上的朝霞，一阵西风，忽而又吹上我的头发，于是就想起了那顶新买的黑呢软帽还没有带来。霞着了急，马上去打电话；我倒还是随随便便的，今天趁这晴和的天气，再上孤山灵峰去走它一天，也不很好么？只教有钱，路总不会得卖完，到得明天，车总也自然会再开的。但是不多一忽，车子也从南星桥开来了，同时帽子也由佣人赶送到了站上；这么一来，迟疑的口实，都已经没有，不得已只好慢沌沌走上了车座。到上海是下午一点半的样子，在靖安轮船的舱里把身体横放倒的时候，看见太阳已经有点西斜，大约总在未末申初的几刻钟里了吧？不多一忽，船就开行了。

吴淞的进口出口，以及南行的海上风光，在这二十多年里，是不知道已经经过了多少次数的，所以也懒得上甲板上去吃西北风。和同舱的那位张涤如先生，一通问了姓名乡贯，知道彼此还是杭州许多亲戚朋友的 Mutual Friend，所以我们喝着酒，谈着闲天，计算着船进马尾港口，横靠南台的时日与钟点，倒也忘记了离乡背井的悲哀。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

熬，先还浑浑然不晓得究竟是为了什么？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

"有办法，有办法，让我来打一个无线电回去安慰她罢！"可是叫了船舱侍役来一问，却又说，船上原也有无线电机的设备，但是船客是不可以借此打电报的；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出之后，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

船进马尾港之先的一段渔村小岛的清景，以及大小五虎山，金刚腿，南北龟，瞿心庙，缺嘴将军等名胜故垒的眺望，想是到过福州的人，都看见过，听到过的事迹，我一时辨也辨不清，此地只能暂且不表，——记得在八九年前初到福州的时候，也曾经稍稍写过一点了——；只有一点，见了青山绿水的南国的海港，以及海港外山上孤立着的灯塔与洋楼，我心里倒想起了波兰显克微支的那一篇写守灯塔者的小说，与挪威伊孛生的那出有名剧本《海洋夫人》里的人物与剧情。同时并且也想起了少年时候，一样的在这一种海港里进出时的心境，血潮一涨，老态也因而渐除，居然自己也跑上前跑落后地上甲板去和那些年少的同轮船者来混了好半天。

三北公司闽行线的轮船靖安的唯一迷人处，是在直驶南台靠岸的六个大字；因为她的船身宽，船底平，乘着潮头，可以开进马尾，倒溯闽江而直上南台的新筑码头边上去靠岸。但是这一次，不晓得是我的运气呢还是晦气，终于受了她的一次骗。上海出口的时候，大家都说后天早晨船可以到马尾，第三天的中午，就可以到南台市上去买醉听歌了，所以船上的人，都非常之快

活，仿佛是踏上了靖安的船板，就等于已经踏上了南台的沙岸似的。并且天气也晴和，晚上还有了元宵节前的大半规上弦的月亮；风平浪静，在过最险恶的温州洋时，也同在长江里行船一样，船身一摇晃也不曾摇晃。可是到了该进马尾港的第三天的早晨，船只同蚂蚁爬地球似的在口外的丛岛中徘徊，似乎对口外的白水青山，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船后面“水波不兴，清风徐来”，——用这两句古人的妙句来形容那一日船后面的情景，或者有人会感到诗意，但实际则推动机失去了作用，连船后面所必拖的一条水纹也激不起来，不消说当高速度前进时所振动起的那一股对面风，也终于没有——，比到苏东坡在赤壁放舟时的那种舒徐态度，我想只会得超过几分。因而等潮落之后，过了中午，我们才入了马尾，在江中间抛下了锚。幸亏赖张涤如君及几位在建设厅车务处任职的同船者的尽力，我才能于下午三点多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惊涛骇浪里爬上了小火轮，驶到了马尾的江边；否则，我想就是做了水鬼，也将问不到到阎王那里去的路程，因为苦竹钩辀，那些苦力船家搬运男女在那里讲的，并不是中国话，也不是外国话，却是实实在在的马尾土话的缘故。

福州的情形大不同了；从前是只能从马尾坐小火轮去南台的一段路程，现在竟沿闽江东岸筑起了一条坦坦的汽车大道，大道上还有前面装置着一辆脚踏车，五六年前在上海的法界以及郊外也还看得见的三轮人力车在飞跑；汽车驶过鼓山的西麓，正当协和学院直下的里把路上，更有好几群穿着得极摩登的少年男女，在那里唱歌，散步，手挽着手的享乐浓春；汽车过后，那几位少女并且还擎摇着白雪似的手帕，微露着细磁似的牙齿，在向我招呼，欢笑，象在哀怜我的孤独，慰抚我的衰老似地。

到了南台，样子更不同了；从前的那些坍败的木头房屋，都变成了钢骨水泥的高楼；马路纵横，白牌子黑牌子的汽车也穿梭似的在鸣警笛。那一条驾在闽江江上的长桥，——万寿桥——拆去了环洞，改成了平面，仓前山上住着的中外豪绅，都可以从门口直登汽车，直上城里去了；十年的岁月，在这里总算也留下了成绩，和我自身的十年之前初到这里时的那一种勇气勃勃的壮年期来一比，只觉得福州是打了一针返老还童的强壮针，而我却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两个面目，完全相背而驰了十年，各不能认识各的固有形容了；到了这里，我才深深地，深深地加倍感到了树犹如此，我老何堪的古人的叹息。

南台本来是从前的福州的商业中枢，因而乐户连云，烟花遍地，晚上是闹得离人不能够安枕的，但现在似乎也受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那一批游荡的商人，数目却减少了。大桥的南面是中洲，中洲的南面是仓前山，这两处地方，原系福州附廓的佳丽住宅区，若接亦离，若离也接，等于鼓浪屿之于厦门一样，虽则典丽华贵，依旧是不减当年，但远看过去，似乎红墙上的夕照，也少了一层光辉，这大约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否则，想总是十年来的尘土，飞上了那些山上的洋楼，把它们的鲜艳味暗淡化了的缘故。

在南台的高楼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见了那一轮将次圆满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天气暖极，在夜空气里着实感到了一种春意，在这一个南国里的春宵，想该是“虫声新透绿窗纱”的时候了。看不多时，果然铜铜盘铜铜盘地来了几班踏高跷，跳龙灯的庆祝元宵者的行列，从大桥上经过，在走向仓前山去；于是每逢佳节思亲的感触，自然也就

从这几列灯火的光芒上，传染到了我的心里，又想起闺中的小儿女来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撇下了窗前的美景，灭去了灯，关上了门，睡下去寻还乡的美梦，虽然有没有梦做，原也是说不定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八日写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三期

闽游滴沥之二

曾经到过福州的一位朋友写信来，说福建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来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福建的山水，实在也真美丽；北峙仙霞，西耸武夷，蜿蜒东南直下，便分成无数的山区。地气温暖，微雨时行，以故山间草木，一年中无枯萎的时候。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桃李也同时怒放；相思树，荔枝树，榕树，杜松之属，到处青葱欲滴，即在寒冬，亦象是首夏的样子。

闽江发源浦城县北渔梁山下，亦称建溪，又叫剑江，更有一个西江的别号；大抵随地易名，到处收纳清溪小水，曲折而达福州，更从南台折而向东向南，以入于海。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你试想想，福建既有了那么些个山，又有了这么大的一条水，

盘旋环绕，终岁绿成一片，自然的风景，那里还会得比别处更差一点儿？然而“逢人都问武夷山”，仿佛是福建的景致，只限在闽西崇安的一角，除了九曲的清溪，三十六峰的崇山峻岭而外，别的就不足道似的，这又是什么缘故？想来想去，我想最大的原因，总还是在古代交通的不便。因为交通不便之故，所以外省的人士，很少有得到福建来的；一二个驰骋中原的闽中骚客，懒得把乌龟山，蛇山，老虎山，狮子山等小山浅水，一一的列举出来，就只青其大者著者的武夷山来包括一切；于是外面的人，只晓得福建仅有武夷的三三六六，而返射过来，福建人也只知道唯有武夷山是值得向人夸说的了。其实呢，在闽江的两岸，以及从闽东直下，一直至诏安和广东接壤的海滨一带，都是无山不秀，无水不奇的地方；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如我们故乡西湖上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之类。

说虽则如此的说，但因尘事的劳人，闽南闽北，直到今日，我终还没有去过，所以详细的记叙，只好等诸异日；现在只能先从实地见过到过的地方说起，还是来记一点福州以及附廓的山川大略罢。

周亮工的《闽小记》，我到此刻为止，也还不曾读过；但正在托人搜访，不知他所记的究竟是些什么。以我所见到的闽中册籍，以及近人的诗文集子看来，则福州附廓的最大名山，似乎是去东门外一二十里地远的鼓山。闽都地势，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形状绝象是一把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子。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内，则这一把椅子，又象是面前有一横档，给一二岁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两条扶手的脊岭，西面一条，是从延平

东下，直到闽候结脉的旗山；这山隔着江水，当夕阳照得通明，你站上省城高处，障手向西望去，原也看得浓紫絪緼；可是究竟路隔得远了一点，可望而不可即，去游的人，自然不多。东面的一条扶手，本由闽侯北面的莲花山分脉面来，一支直驱省城，落北而为屏山，就成了上面有一座镇海楼镇着的省城座峰；一支分而东下，高至二千七八百尺，直达海滨，离城最远处，也不过五六十里，就是到过福州的人，无不去登，没有到过福州的人，也无不闻名的鼓山了。鼓山自北而东面南，绵亘数十里，襟闽江而带东海，且又去城尺五，城里的人，朝夕偶一抬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见这座头上老有云封，腰间白墙点点的瑰奇屏障。所以到福州不久，就有友人，陪我上山去玩；玩之不足，第二次并且还去宿了一宵。

鼓山的成分，当然也和别的海边高山一样，不外乎是些岩石泥沙树木泉水之属；可是它的特异处，却又奇怪得很，似乎有一位同神话里老出来的艺术巨人，把这些大石块，大泥沙，以及树木泉流，都按照了多样合致的原理，细心堆叠起来的样子。

坐汽车而出东城，三十分钟就可以到鼓山脚下的白云廨门口；过闽山第一亭，涉利见桥，拾级盘旋而上，穿过几个亭子，就到半山亭了；说是半山，实在只是到山腰涌泉寺的道路的一半，到最高峰的岀崩——俗称卓顶——大约总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走过半山亭后，路也渐平，地也渐高，回眸四望，已经看得见闽江的一线横流，城里的人家春树，与夫马尾口外，海面上的浩荡的烟岚。路旁山下，有一座伟大的新坟，深藏在小山的怀里，是前主席杨树壮的永眠之地；过更衣亭，放生池后，涌泉寺的头山门牌坊，就远远在望了，这就是五代时闽王所创建的闽中第

一名刹，有时候也叫作鼓山白云峰涌泉院的选佛大道场。

涌泉寺的建筑布置，原也同其他的佛地丛林一样，有头山门，二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藏经楼，方丈室，僧寮客舍，戒堂，香积厨等等，但与别的大寺院不同的，却有三个地方。第一，是大殿右手厢房上的那一株龙爪松；据说未有寺之先，就有了这一株树，那么这棵老树精，应该是五代以前的遗物了，这当然是只好姑妄听之的一种神话；可是松枝盘曲，苍翠盖十余丈周围，月白风清之夜，有没有白鹤飞来，我可不能保，总之以躯干来论它的年纪，大约总许有二三百岁的样子。第二，里面的一尊韦驮菩萨，系蹻起了一只脚，坐在那里的。关于这镇坐韦驮的传说，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现在只能含混的重述一下，作未曾到过鼓山的人的笑谈，因为和尚讲给我听的话，实际上我也听不到十分之二三，究竟对与不对，还须去问老住鼓山的人才行。

——从前，一直在从前，记不清是那一朝的那一年了，福建省闹了水荒呢也不知旱荒；有一位素有根器的小法师，在这涌泉寺里出了家，年龄当然还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在这一个食指众多的大寺院里，小和尚当然是要给人家虐待，奚落，受欺侮的。荒年之后，寺院里的斋米完了；本来就待这小和尚不好的各年长师兄们，因为心里着了急，自然更要虐待虐待这小师弟，以出出他们的气。有一天风雨雷鸣的晚上，小和尚于吞声饮泣之余，双眼合上，已经朦胧睡着了，忽而一道红光，照射斗室，在他的面前，却出现了那位金身执杵的韦驮神。他微笑着对小和尚说："被虐待者是有福的，你明天起来，告诉那些虐待你的众僧侣罢，叫他们下山去接收谷米去；明天几时几刻，是有一个人会送上几千

几百担的米来的。”第二天天明，小和尚醒了，将这一个梦告诉了大家；大家只加添了些对他的揶揄，那里能够相信？但到了时候，小和尚真的绝叫着下山去了，年纪大一点的众僧侣也当作玩耍似的嘲弄着他而跟下了山。但是，看吓！前面起的灰尘，不是运米来的车子么？到得山下，果然是那位城里的最大米商人送米来施舍了。一见小和尚合掌在候，他就下车来拜，嘴里还喃喃的说，活菩萨，活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财。原来这一位大米商，因鉴于饥馑的袭来，特去海外贩了数万斛的米，由海船运回到福建来的。但昨天晚上，将要进口的时候，忽而狂风大雨，几几乎把海船要全部的掀翻。他在舱里跪下去热心祈祷，只希望老天爷救救他的老命。过了一会，霹雳一声，桅杆上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下更出现了那一位金身执杵的韦驮大天君。怒目而视，高声而叱，他对米商人说：“你这一个剥削穷民，私贩外米的奸商，今天本应该绝命的；但念你祈祷的诚心，姑且饶你。明朝某时某刻，你要把这几船米的全部，送到鼓山寺去。山下有一位小法师合掌在等的，是某某菩萨的化身，你把米全交给他者！”说完不见了韦驮，也不见了风云雷雨，青天一抹，西边还现出了一规残夜明时的月亮。

众僧侣欢天喜地，各把米搬上了山，放入了仓；而小和尚走回殿来，正想向韦驮神顶礼的时候，却看见菩萨的额上，流满了辛苦的汗，袍甲上也洒满了雨滴与浪花。于是小和尚就跪下去说：“菩萨，你太辛苦了，你且坐下去息息罢！”本来是立着的韦驮神，就突然地蹻起了脚，坐下去休息了——

涌泉寺的第三个特异之处，真的值得一说的，却是寺里宝藏着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

学者，来住寺影印，据说在寺里寄住工作了两整年，方才完工，现在正在东京整理。若这影印本整理完后，发表出来，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就是在梵文国的印度，也早已绝迹了的缘故。此外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和几叶菩提叶画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也算是这涌泉寺的寺宝，但比起那一部绝无仅有的佛典来，却谈不上了。我本是一个无缘的众生，对佛学全没有研究，所以到了寺里，只喜欢看那些由和尚尼姑合拜的万佛胜会，寺门内新在建筑的回龙阁，以及大雄宝殿外面广庭里的那两枝由海军制造厂奉献的铁铸灯台之类，经典终于不曾去拜观。可是庙貌的庄严伟大，山中空气的幽静神奇，真是别一个境界，别一所天地；凡在深山大寺，如广东的鼎湖山，浙江的天目山，天台山等处所感得到的一种绝尘超世，缥渺凌云之感，在这里都感得到，名刹的成名，当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福州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宇宙风》第十四期

闽游滴沥之三

《福建通志》的《山经》里，说鼓山延袤有数十里长，所以鼓山的山景，决不至只有几处；而游览的人，也决不是一个人在山上住几天就逛得了。不过涌泉寺是全山的一个中心，若以涌泉寺为出发点而谈鼓山，则东面离寺只有里把路远的灵源洞，喝水岩，以及更上一层的朱子读书台，却象是女子脸上的脂粉花饰，当能说是一山的精华荟萃的地方。

到灵源洞的山路，是要从回龙阁的后面经过，延山腰的一条石砌小道，曲折而向东去的。路的一面，就是靠小顶峰的一面，是铁壁似的石岩；在这一排石岩里，当然还有些花草树木，丛生在那里，倒覆下来，成了一条甬道。另一面，是一落千丈的山下绝壑了；但因为在这绝壑里，也有千年老的树木生长在那里，这些树顶有时候高得和路一样平，有时候还要高出路面一二丈长，所以人在这一条路上走路，倒还不觉得会发什么寒栗，仿佛即使掉了下去，也有树顶树枝，会把你接受了去，支住你的身体似的。不过一种清幽，静谧的感觉，却自然而然的在这些大树，绝

壁，深壑里蒸发出来，在威胁着你，使你不敢高声地说一句话。

山径尽处，是一扇小小的门；穿门东望出去，只是一片渺渺茫茫的天与海，几点树梢，或一角山岩，随你看的人所立的角度方位的变移，或者会显现一下，随即隐去，到了这狭狭的门外，山路就没有了。没有路，便怎么办呢？你且莫急，小门外的百丈谷中，就是灵源洞底了；平路虽则没有，绝高绝狭的下坡石级，自然是有的。下了这一条深深的石级，回头来一看高处，又是何等耐人寻味的一幅风景！石级的狭路，看过去象是一条蛇的肚皮，回环曲屈，夹盘在绿的树，赭黑色的岩石的中间。在这层层阴暗的石树高头，把眼睛再抬高几分，就是光明浩荡的一线长天了，你说这景致，还不够人寻味么？

下了石级，我们已经到了灵源洞底了，虽说是洞，但实际却不过是一间天然的石屋。平坦的底，周围有五六丈方广，当然是一块整块的岩石。而在这底的周围，中部，以及莫名其妙的角落里，都有很深很深的绝涧，包围在那里。下石级处，就是一条数丈深的石涧，不过在这石涧上面，却又架着有一块自然的石桥。站在这石桥上，朝西面的桥下石壁一看，就看得见朱夫子写而刻石的那一个绝大的寿字，起码总要比我们人高两倍，宽一倍的那一个寿字。

洞的最宽广处，上面并没有盖，所以只是一区三面有绝壁，前面是深坑的深窝。岩石，岩石，再是岩石；方的，圆的，大的，小的，象一个人的，象一块屏风的，象不知什么的，重重叠叠，整整斜斜；最新式的立体建筑师，叠不到这样的适如其所，挑华车的舞台布景画，也画不到这样的伟大；总而言之，这一区的天地，只好说是神工鬼斧来造成的，此外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可是

刻在这许许多多石头上的古代人的字和诗，那当然是人的斧凿；自宋以后，直到现代，千把年工夫，也还没有把所有的石壁刻遍；不过挤却也挤得很，挤到了我不愿意一块一块地去细看它们的地步。

洞的北面靠山处，有一间三开间的小楼造在那里；扶梯楼板，有点坏了，所以没有走上去。小楼外的右边，有一块高大的岩石立着，上面刻的是喝水岩的三个大字。故事又来了，我得再来重述一遍古人脑里所想出来的小说。

《三山志》里说：“建中四年，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建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峤，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曰华严台，亦以名其寺。”照这记事看来，寺原还是洞古，而洞却以龙灵，所谓华严台，华严寺，也就在这洞的东边。不过喝水岩的三字，究竟是不是因这里出了龙，把水喝干了，于是就有此名的？抑或同一般人之所说，喝水的喝字，是棒喝之喝，盖因五代时圣僧国师晏，诵经于此，恶水声喧豗，叱之，西涧乃涸，迸流于东涧，后人尊敬国师，因有此名？我想这名目的由来，很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现在大家都只晓得坚持着后一说，说是经国师晏的一喝，这儿涧里的水就没有了，并流到了东涧；但我想既要造一个故事出来，何不造得更离奇一点，使象安得生的童话？一喝而水涸，也未免太简单了罢？

经过这灵源洞后，再爬将上去，果然是一个台，和一个寺；而这寺的大殿里，果然有一条水，日夜在流。寺僧并且还利用了这水，造了一个小小的水车，以绳的一端，钓上水车，一端钓上钟杵，制成了一个终年不息的自然冲钟的机械。而这一条水的水质，又带灰白色而极浓厚，象虎跑惠山诸泉，一碗水里，有百来

个铜子好摆，水只会得涨高，决不会溢出。

在这寺门前的华严台——也不知是不是——上，向西南了望开去，已经可以看得见群峰的俯伏，与江流的缭绕了；但走过石门，再升上一段，到了山头突出的朱子读书台去一看，眼界更要宽大，视野更要辽阔。我以为在鼓山上的眺望之处，当以此地为第一；原因是在它的并不象屴崱峰的那么高峻，去去很容易，而所欲望见的田野河流山峰城市，却都可以在这里看得明明白白。

我的第二次上鼓山，是于黄昏前去，翌日早晨下来的；下山之先，也攀上了这一处朱夫子读书的地方。同游的人，催我下山，催了好几次，我还有点儿依依难舍，不忍马上离去此二丈见方的一块高台。坐上了山轿，也还回头转望了好几次，望得望不见了，才喃喃念着，念出了这么的几句山歌：

“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

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

实在也真奇怪，灵源洞喝水岩前后左右的那些高深的绝涧里，竟一点儿流水也没有。我去的两次，并且还都是在大雨之后，经过不久的时候哩。

鼓山的最高峰名屴崱峰或名大顶峰，卓顶峰，状如覆釜，时有云遮；是看日出，看琉球海岛的胜地，我不曾去。大顶峰北下，是浴凤池；据说樵者常见五色雀群，饮浴于此。池之南，有石门砑立；应真台，祖师岩，涌泉窦，甘露松，白猿峡，香炉峰，都在石门之右。浴凤池右下，走过数峰，达海音洞；洞口宽大，有好几张席子好铺；其中深不可测，时闻海音，所以有此名称。白云洞，在海音洞下，由黄坑而登，只有一里多的山路，险

巉峻峭，巨石如棋散置路上。听老游的人说来，鼓山洞窟，当以白云洞为第一，但这些地方，我都还不曾亲到，所以夸大的话，也不敢说；迟早，总再想去一趟的，现在暂且搁起在一旁罢。此外的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狮子峰，钵盂峰，……峰，……岩之类，名目虽则众多，但由老于游山者看来，大约总是大同小异的东西，写也写不得许多；记鼓山的文字，想在此终结了，此外只抄一点古人游鼓山的诗在下面，以润泽润泽我这一篇干燥的记事。

灵源洞　　　五代释神晏国师

何事最堪依，岩中独坐时，路险人难到，峦高鸟不飞。白云常满洞，论劫未曾亏，不话曹溪旨，焉于道者机。

鼓　山　　　宋蔡　襄仙游人知福州

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忽惊触。扪萝挤上峰，太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遁人，素尚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

重游鼓山山有元公亭　　　宋元　绛钱塘人知福州

谁书吾姓揭亭颜，栋宇飞腾气势完，谷口秋风吹鬓发，海东朝日上栏杆。地高顿觉群山小，天近须知六合宽，三到岩扉殊不厌，异时长向画图看。

游鼓山淳祐辛酉立秋后一日　　　释痴绝

野径斜连石洞旁，草根呢呢语寒螀，郊原经雨多秋意，庭院无人自夕阳。风卷暮云归碧嶂，叶随野水入寒塘，数家篱落枫林外，枳壳垂青菊绽黄。刻大顶峰

登屴崱峰　　　　元黄镇成邵武人

屴崱峰高万丈梯，上方高与白云齐，青山尽处海门阔，红日上来天宇低。喝水无人空晏坐，磨崖有客漫留题，飘然欲御长风去，一笑何烦过虎溪。

寒食与傅子登鼓山　　　　明郑善夫

绝顶天风云乱飞，海门高浪拍春衣，霸图王气东南尽，尧韭秦花天汉稀。此地赏心惟汝共，万方愁目欲何依，要知寒食山中意，萍梗江湖几是非。

大顶峰　　　　陈学麟

绝巘发高歌，天空见海多。

不知登泰岱，俯视更如何。

宿鼓山庆历丙戌秋　　　　宋邵去华

玉磬声流夜阒寥，天风吹送海门涛，鹤来松顶云归后，人倚栏杆月正高。刻灵源洞

（以上自黄任辑《鼓山志》中抄出）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五期

记闽中的风雅

到了福州，一眨眼间，已经快两个月了。环境换了一换，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果然都是新奇的事物，因而想写点什么的心思，也日日在头脑里转。可是上自十几年不见的旧友起，下至不曾见过面的此间的大学生中学生止，来和我谈谈，问我以印象感想的朋友，一天到晚，总有一二十起。应接尚且不暇，自然更没有坐下来执笔的工夫。可是在半夜里，在侵晨早起的一点两点钟中间，忙里偷闲，也曾为《宇宙风》、《论语》等杂志写过好几次短稿。我常以为写印象记宜于速，要趁它的新鲜味还不曾失去光辉中间；但写介绍、批评、分析的文字，宜于迟，愈观察得透愈有把握。而现在的我的经验哩，却正介在两者之间，所以落笔觉得更加困难了一点。在这里只能在皮相的观察上，加以一味本身的行动，写些似记事又似介绍之类的文字，倒还不觉得费力，所以先从福建的文化谈起。

福建的文化，萌芽于唐，极盛于宋，以后五六百年，就一直的传下来，没有断过。宋史浩帅闽中，铺了仙霞岭的石级，以便

行人，于是闽浙的交通便利了，文化也随之而输入。朱熹的父亲朱松，自安徽婺源来闽北作政和县尉，所以朱子就生在松溪。朱松殁，朱子就父执白水刘致中勉之，籍溪胡原仲宪，屏山刘彦冲翚，及延平李文靖愿中等学，后来又在崇安，建阳，以及闽中闽南处讲学多年，因而理学中的闽派，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所以到了民国廿五年的现代，一般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风气，也比任何地方还更盛行。风雅文献的远者，上自唐朝林邵州遗集，欧阳詹四门集起，中更西昆，沧浪，后村，至谢皋羽而号极盛；元明作者继起，致诗中有闽派之帜，郑少谷，曹石仓辈，更是一代的作手；清朝象林茂之，黄莘田，朱梅崖，伊墨卿，张亨甫，林颖叔辈，都是驰骋中原，闻名全国的诗人，直到现在，除汉奸郑孝胥不算中国人外，还有一位巍然独存的遗老陈石遗先生。所以到了福建之后，觉得最触目的，是这一派福州风雅的流风余韵。晚上无事，上长街去走走，会看见一批穿短衣杉裤的人，围住了一张四方的灯，仰起了头在那里打灯谜。在报上，在纸店的柜上，更老看见有某某社征诗的规约及命题的广告。而征诗的种类，最普遍的却是嵌字格的十四字诗钟。譬如"微夹""凤顶"，就是一个题目，应征者若呈"夹辅可怜工伴食，微臣何敢怨投闲"（系古人成句）的一联，大约就可以入上选了。开卷之日，许大众来听，以福州音唱，榜上仍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摇头摆尾，风雅绝伦，实在是一种太平的盛事。福州也有一家小报名《华报》，《华报》同人都是有正当职业的人，盖系行有余力，因以弄文的意思，和上海的有些黄色小报，专以敲竹杠为目的的，有点两样。曾有一次和《华报》同人痛饮了一场之后，命我题诗，我也假冒风

雅，呈上了二十八字："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这打油诗，虽只等于轻轻的一屁，但在我的心里，却诚诚恳恳地在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一次最后的光芒。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立报·言林》

闽游滴沥之四

在上一回的杂记里，曾说记鼓山的话已经说完了，这一次本应该记些别的闽中山水的；可是当前七八天的那一天清明节日，又和朋友们去攀登了鼓山后卫的一支鼓岭；翻山涉谷，更从鼓岭经浴凤池西而下了白云洞的奇岩，觉得这一段路景，也不可以不记，所以想再来写一次鼓山的煞尾余波。文字若有灵，则二三十年后，自鼓岭至鼓山的一簇乱峰叠嶂，或者将因这一篇小记而被开发作华南的避暑中心区域，也说不定。

鼓岭在鼓山之北，省城的正东；出东门，向东直去，经过康山，马鞍山等小岭，再在平原里走十来里地，就可以到鼓岭的脚下。走走须一个半钟头，汽车则有二十分钟就能到了；鼓岭的避暑之佳，是我一到福州之后，就听说的，这一回却亲自去踏查了一下，原因也就想租它一间小屋来住住，可以过去一个很舒适的炎夏。

岭高大约有二千余尺，因东南面海，西北凌空之故，一天到晚，风吹不会停歇；所以到了伏天，城里自中午十二时起，到下

午四点中间，也许会热到百度，但在岭上，却长夏没有上九十度的时候。二三十年前，有一位住省城内的美国医生，在盛夏的正中，被请去连江县诊视急病；自闽侯去连江的便道，以翻这一条岭去为最近。那一个病人，被诊治之后，究竟痊愈了没有，倒已无从稽考；但这一条鼓岭，却就被那一位医生诊断得可以避暑、先来造屋，现在竟发达到了有三四百号洋楼小筑的特殊区域了。

鼓岭的外观，同一般的山中避暑地的情形，也并无多大的不同。你若是曾经到过莫干山鸡公山一带去过过夏的人，那见了鼓岭，也不会惊异，不会赞美，只会得到一种避暑地中间的小家碧玉的感想；可是这小家碧玉的无暴发户气，却正是鼓岭唯一迷人之处。

山上的房子，因为风多地峻的关系，绝少那些高楼大厦的笨重式样；壁以石砌，廊用沙铺，一区住宅，顶多也不过有五六间房间；小小的厨房，小小的院落，小小的花木篱笆，却是没有一间房子不备的。此外的公众球场，游泳池，公会堂，礼拜堂之类，本就是避暑地的必具之物，当然是可以不必说了。而象这一种房子的租金的便宜——每年租金顶多不过三百元，最廉者自百元起——日用的省约，却是别的避暑地方所找不出的特点。

我们同去者六人，刘爱其氏父子，刘运使，王医生，以及新自北方南下的何熙曾前辈，在东西南的三处住宅区里，看了半天，觉得任何一间房子都好得很，任何一个地方都想租了它来。对于山水的贪爱，似乎并不妨碍廉洁，但一到了小家碧玉的丛中，看到了眼花撩乱的关头，这一点贪心，却也阻滞了决定的选择；佛家的三戒，以贪字冠诸瞋痴，实在是最有经验的哲理，我这一次去鼓岭，就受了这贪字之累，终于还没有决下想租定那里

的一间。

还有这一次在鼓岭的一个附带的节目，是我们这一群外来的异乡异客，居然杂入到了岭上居民的老百姓中间，去过了一个很愉快很满足的清明佳节的那一幕。

在光天化日之下，岭上的大道广地里，摆上了十几桌的鱼肉海味的菜；将近中午，忽而从寂静的高山空气里，又传来了几声锣响；我们正在惊疑，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么?”的中间，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却前来拱手相迎，说要我们去参加吃他们的清明酒去。酒是放在洋铁的大煤油箱里，搁在四块乱石高头，底下就用了松枝树叶，大规模地在煮的。跑上前去一看，酒的颜色，红得来象桃花水汁；浮在面上的糟滓，一勃一块，更象是美人面上，著在那里的胭脂美点。刘运使出口成章，一看就说这是牛饮的春醪；我起初看了，也觉得这酒的颜色不佳，不要是一醉千日的山中秘药。但经几位长者的殷勤劝酌，尝了几口之后，却觉得这种以红糟酿成的甜酒，真是世上无双的鲜甘美酒，有香槟之味而无绍酒之烈；乡下人的创造能力，毕竟要比城市的居民，高强数倍，到了这里，我倒真感得我们这些讲卫生，读洋书的人的无用了。

酒宴完后，是敬神的社戏的开场；男女老幼，都穿得齐齐整整，排列着坐在一个临时盖搭起来的戏台的前头；有几位吃得醉饱的老者，却于笑乐之余，感到了疲倦，歪倒了头，在阳光里竟一时呼呼瞌睡了过去，这又是一幅如何可爱的太平村景哩！“出门杨柳碧依依，木笔花开客未归，市远无饧供熟食，村深有纻试新衣，寒沙犬逐游鞍吠，落日鸦衔祭肉飞，闻说旧时春赛罢，家家鼓笛醉成围”，这虽是戴表元咏浙江内地的寒食的诗，但在此

时此地，岂不也一样地可以引用的么？

我们这一批搅乱和平的外客，自然没有福气和他们长在一道享受尽这一天完美的永日；两点钟敲后，就绕过东头，在苍翠里拾级下山，走上了去白云洞的大道。鼓岭南下，是一条弯曲的清溪，深埋在岩石与乱峰的怀里；狭长的一谷，也散点着几树桃花，花瓣浮漾在水面，静静地向西流去，去报告山外的居民以春尽的消息了；到了谷底，回头来再向鼓岭一看，各人的脑里，才涌起了一种惜别的浓情。千秋万岁，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来祝福祝福这些鼓岭山里的居民；因为今天在鼓岭过去的半天，实在太有意思，太值得人留恋了。当我这一个念头，正还没有转完，而重从谷底向南攀援上岭还没有到几十级之先，不知是我这私念感动了天心呢还是鼓岭的老百姓在托天留我，忽而一阵风来，从东面吹起了几朵乌云，雷声隐隐，从云层厚处，竟下起同眼泪似的雨滴来了，于是脚上只穿着毛布底鞋的我和刘运使两个，就着了急，仍想跑回鼓岭去躲雨去。究竟还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大家将这问题在商量着还没有决定的一刹那，前面树荫底下却突然闪出了一位六七十岁的乡下老寿星，在对了我们微笑着走上前来了。刘运使说："这是来救我们的急难的山神老土地！"而刘家的小弟弟广京，跑上了前头，向这老者去请了一下示；他果然高声的笑着，对我们作满足的报告说："这雨是下不大的，大约过五分钟就会晴了。"对于天候的经验，我不如老农，对于爬山的勇气，我又不如这位小弟弟，等雨滴住了以后，路也正绕到了浴凤池的西边，他们大家往前面去了，我却自怨自艾，对了山头的怪石，又作了半天的忏悔。

向西一转，走到了山头尽处，将到白云洞的里把来路中间，

忽而地辟天开，风景大变，我们已经走入了一条万丈绝壁的鸟道的高头；头上面只有一块天，眼底下只是黑黝黝的大石壁，石壁中间盘旋着一条只容一个人走得的勉强开凿出来的小曲径；上这里来一看周围，我才晓得从前所走过的山路，直等于平坦的大道，一般人所说的白云洞的奇岩险路，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绝景了。

原来鼓山西面的这一处山坳，是由两大块三千尺高的石壁，照人字形对立着排列起来的。所谓白云洞者，就是在人字的左面那块大石壁中间的一个洞，上面有一块百丈内外的方壁横盖在那里。这一块方壁就叫一片岩，而那个佛寺，就系以这一片岩为屋顶，以全洞做它的地基的。西北角里，接近人字上半部的一角一片岩下，还留起了一弓空地，造出了几条石椅石桌，可以供游人的栖息，可以看雨后的烟岚，更可以大叫一声，听对面那块大石壁里返传过来的不绝的回音。

白云洞的寺并不大，地方也并不觉得幽深曲折与灵奇，可是从寺门走出，往下向绝壁里下来，经过陡削直立的头天门二三天门，云屏，挹翠岩，与夫最危险的那条龙脊路，而到凡圣寺的一段山路，包管你只教去过一次，就会得毕生也忘记不了，妙处就在它的险峻。同去的何熙曾氏，是曾经登过西岳华山的绝顶的，到了龙脊路上，他也说，这一块地方倒确有点儿华山的风味。

凡圣寺，是曾居士在住修的一所新庵；庵左面有瀑布流泉，在大石缝里飞奔狂跳。瀑布下面，一块大方岩的顶上，有一处空亭，也安置了些石桌石椅，在款待游人。我们走过寺门，从寺门前一小块花园里走上这观瀑亭去的中间，在关闭着的寺门上，看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说："庵主往山后扫落叶，拾枯枝去了；来客们请上观瀑亭去息息！"这又是何等悠闲自在的一张启事书！

从凡圣寺下来，再走上三五里路，就是积翠庵了；陡绝的石壁，到此才平，千岩万壑的溪流，到此汇聚；庵前有一排大树，大树下尽是些白石清泉，前临大江，后靠峻岭，看起来四平八稳，与白云洞一路的奇岩怪石一比，又觉得这里是一篇堂而皇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而白云洞那面却是鬼气阴森的李长吉的歌曲。积翠庵下，是名叫作布头的一个村子，千年的榕树，斜覆在断桥流水的高头，牛眠犬吠，晚烟缭绕着云霞；等我们走过村上面的一泓清水的旁边，向烈妇亭一齐行过最敬礼后，田里的秧针，已经看不出来，耕倦了的农民，都在油灯下吃晚饭了；回到了南台，我和熙曾，更在江边的高楼上喝酒谈天，直到了半夜过后，方才上床去伸直了两只倦脚。一九三六年的清明节日，就这样的过去了。人虽则感到了极端的疲倦，但是回味津津，明年此日，还想再去同样地疲倦它一次，不晓得天时人事，可能容许？

四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宇宙风》第十六期

闽游滴沥之五

福州城的雅号，叫作榕城，原因是为了在城内外的数千年老榕树之多得无以复加；福州的别号，又叫作三山，就因为在福州城里有许多许多大大小小的山。

凡到过福州，或翻开福州游记及指南之类的书来看过一道的人，都背诵得出山歌似的一句形容福州城内诸山的熟语，叫作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所谓三山藏者，有的说系指法海寺所在地的罗山，屏山东南麓的冶山，与在闽山巷光禄坊附近的闽山而言；有的更变换名称，说是罗山、泉山（即冶山）、玉尺山（即闽山）的三山。总之，这不大惹人注意的三山，是在三山现的三山之外的高地，或共脉而异名，或沿山而起屋，使一般身履其顶的人，不觉得是登在山上。此外则福州城内，尤其是在北城，还有许多以岭取名的地方，若说起藏而不露的山来，我想这些岭地，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所谓三山看不见者，听说是指在钟山涧里的钟山，芝涧里的芝山，以及龙山巷一家私人园内的龙山（或谓系指东城的灵山）而言；这些大约本不是山，不过那些

好奇爱僻的先生们，手捧着水烟袋，眼看着梅雨天，闲空不过，才想出来难难人的说法。至于三山现的三山哩，却位置天然，风景互异，真是值得一说的福州佳丽。凡曾经身到过福建省会的人，钩辀的鸟语，海陆的奇珍，都会年久而或忘，唯有这三山的形势，却到死也不会忘记。福州的别号三山，实在也真是最简括不过的命名。

福州城全体的形状，象一只龙虾的赴蛰；两只大钳，是东面的于山，西面的乌山，上跷的尾巴，恰正是上面有一座镇海楼在的屏山（即越王山）；一道虾须，直拖出去，是到南台为止的那一条大道；虾须尽处，就是闽江的江面，众水汇聚而入海的地方了。

福州城的创建，当然要远溯到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无疆；及秦二世时，无诸开国，都冶为城，就在现在的布政里，屏山东南麓名冶山的一块小地方。晋太康三年，始置郡；后太守严高，听了郭璞之言，方经始于越王山之南，又向南开辟了一下。于是就有了左鼓右旗，玉带横腰的谶语。唐宋而后，渐次扩充；到了明朝，因元之旧，更建樵楼敌台，覆以重屋，门列七城，于是便“隐然金汤之固，三峰峙于城中，二绝标于户外；甘果方几，莲花现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溉”，居然成了现在那么的一大都会。宋谢泌的“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及陈轩的“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两诗，就是到了现代，也还用得着。诗里头每有人题起，而会城别号之所从出的三山，就是屏山，乌山，与于山了。

屏山在现在省城的正北，下面拖落来就是冶山，实际上，却

从何处起是屏山，到何处止是冶山的界限也分不明白。旧日的城墙，一半就绕在这山的北部；而山的绝顶，雄镇着一座巍巍乎大不可当的镇海楼。楼的原建筑，虽则已经摧毁，但旧址上的那座碉堡，也足以令人想起当年的豪举。每于夕阳欲下时，车过山脚，举头一望碉堡上金黄的残照，总莫名其妙的要起一种感慨，真也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

屏山东南下的一区山地，南为冶山，再南为将军山，是古代闽中衙署府第的中枢。无诸建国，都即在此；晋守严高的刺史衙署，也就在这里。唐为都督府衙，又为观察使衙，又为威武军衙。闽王审知建牙开府，造文德殿长春宫紫薇宫东华宫跃龙宫明威殿的地方，原全在这些低山浅阜的中间。其后王氏父子兄弟的荒淫流血，钱氏纳土归宋后之创置清和堂，垂拱殿，元之行中书省，明的布政使司，也都在这些地方，所以屏山古时又有越王山之称。再南下去，是山坡的尾闾了，现在的那座鼓楼所在的地方，就是唐观察使元锡建置之威武军门；宋元以后，屡毁屡建；明宣德年间、御史方端命僧了心募修之后，更名全闽第一楼。所谓造三狮以制五虎，或只开左门出入等传说，当自这时候起的无疑。

总之，屏山雄镇北城，大有南面垂拱的气象，所以历代衙署，咸集于此。现在则王都旧府，却只剩了衰草斜阳，陆军被服厂，科学馆，惠儿院，乾元寺，以及许多摧毁的空房，分占据了这一圈地面。上去在西北的半山中，建有许多新式的平楼房屋，系省府县政人员训练之处。再上去，革命纪念碑先烈墓等，纵横的立着，桃花千树，更散点在断碑残碣的中间；当碉堡下半里的地方，且有石砌的七星缸一簇，埋在青草碎石里，想系北斗

七星之遗意，或者是用以来镇压火患的也说不定。

屏山亦即越王山的妙处，是在它的能西眺闽江上游，如洪塘桥以上的风景；登稠楼而北望，莲花峰以下的乱山起伏，又象是万马千军，南驰赴海的样子。若在阴雨初霁，残阳欲落的时候，去登高一望，包管你立不上十五分钟，就会得怆然而泪下，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之念，唯在这北门管钥的越王台上，感觉得最切。登其他二山之巅，则所见者，唯民房塔影，与日夜的江流船只而已；和煦繁华，仿佛是坐在春风怀里，一种温柔软感，与在屏山上所感得的哀思愁绪，截然的不同。

省城东南角的于山，别名九仙山，因传说中有何氏兄弟九人修炼于此（兄弟各养一鲤，后各成龙飞去，解化于九鲤湖中）之故。据说，高有一百五十步，周回三百一十步。《闽中记》上又说，越王无诸，九日宴集兹山，有大石樽尚存。所以又名九日山。山的最高峰，名鳌顶峰，在火神庙荧星祠南，是宋状元陈诚之读书处；后来在山的南麓开了一所书院，取名鳌峰，想来总就在影射着这件事情。山前山后，寺院道观，不计其数，而规模最大，香火也最旺盛的，当首推东面斜坡上的那一座九仙观。旧志上所说的磊老岩，跃马岩，喜雨台，仙人床，金锁园，杏坛，棋盘石，醉乡石，九日台，石门，龙舌泉，以及揽鳌亭倚鳌轩等等故迹，都在九仙观之西南北的三面，因为山本不高不大，所以许多奇名怪石的名胜，大抵总在五十步百步之间。而正德间太监尚春，于宋丞相陈自强宅假山取来的三石，现在还直立在平远台的门外，旁边两石上所刻"景元春"三字，仍旧是鲜明得同前日刻出的一样。

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

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祠中的醉石一方，因为戚公醉后，曾经在此坐卧休息过的，游人过墟，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限的很多很多，将来想做一篇详细一点的《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所以在这里只能简单的一提了事。

于山的好处，是在它的接近城市，遥揖闽江，而鼓山的岚翠，又近逼在目前。你若于饭后省下三十分钟工夫，从东面九曲亭边慢慢地走上山去，在大榕树下立它片时半刻，看看城市的繁华，看看山川的苍翠，一定会感到积食俱消，双眸清醒；而正因为俯拾即是市场之故，所以又不至于有厌离人世，想一个人去羽化而登仙。我故而常对人说，快活的时候，可以去上上于山，拜拜戚将军的遗像，因为在于山上所感到的气氛，是积极的，入世的，并没有那一种遗世独立的佛徒门的悲观色彩。

城内和于山东西对峙的，是西南角上的一簇乌石。因为乌石山来得高大一点，所以照堪舆家说来，右强左弱，往往有关气运。唐咸通中侯官令薛逢，与神光僧灵观游此，创亭山侧，刻薛老峰三字于石上；五代开运元年，雷雨大作，薛老峰三字倒立，是年闽亡，就是一个应验。但是将这些风水地理之说丢开，照我们常人的意思来说，觉得乌石山的所以得胜过于山的地方，就在它的高大灵奇，可以扩充视野。这山在唐天宝时，曾奉敕改称过闽山；宋熙宁初，光禄卿程师孟知福州，谓此山登览之胜，敌得过道家的蓬莱方丈，所以又称作了道山。山顶最高处，是凌霄台

的遗址，东下是香炉峰，金刚迹，浴鸦池，初阳顶，华严岩，般若台等名胜了；而旧时祀唐处士周朴的刚显庙，祀明督学宗子相的宗公祠等，现在却没有了踪影。

乌石山之秀，是在山头的那些怪石。如香炉峰的奇岩千丈，对辟两开，千年不动，永镇山巅，从远处了望过去，因日光云影的迁移，往往会幻变作种种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巅，爬上这些大石块去向四边一望，又象是脚不着土，飘飘然如腾云驾雾，身子在飞翔的样子。象这样秀丽的一支大石山，从前自然有不少的寺院，现在也自然要都被人家侵占去建别墅了。山的南面，有省立的师范学校一所，盘据的地位最大最好；稍东是沈文肃公祠堂，再东是私人的别业之类；南面上山的大道顶边，却直到现在也还有几个坍败得不堪的庙宇存着，在那里点缀名山，标示没落。关于乌石山周围的古迹名区，寺观金石，以及名宦僧道的寄迹题诗，本有一部《乌石山志》在那里，我可以不必再来抄录。我只想说一说我每次登乌石山的时候，所感到的，总是一种清空之气。这一种感觉的由来，大约是因眺望西门南门外的平野，与洪塘乡的水势而得。记得元蓝智游乌石道山亭时曾写过一首诗，特为抄在这里，以表示我的同感：

江国凉风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虚，天连野水蓬莱近，霜落汀洲橘柚疏。北望每怀王粲赋，南游空上贾生书，西郊但愿休戎马，独客何妨老钓鱼。

福州名胜，于三山之外，还有双塔二桥诸大寺等等，这一回是记不完了，所以只能暂时搁下了再说。

五月十五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宇宙风》第十八期

记富阳周芸皋先生

我小的时候，每在我们弄堂的近边，遇见一位比我要长五六岁年纪，身材生得不矮不高，眉目异常清秀，鼻梁高直，皮肤雪白的女子。那时候，她似乎已经出嫁到了乡下，重新又回到了城里来住下的样子。当她走过背后，旁人自然要说长道短；有几个轻薄少年，说得更加猥亵，有几个年长一点的总老是吓住他们的嘴，说："八十岁的老婆婆，也笑不得别人的麻子眼睛，你们不要小看了她，她还是我们富阳著名的循吏周道台的曾孙女哩！"

这些老成人的规劝，实在有理之至；名宦的后代之所以不振，就因为他们的做官清正，不晓得贪污，至使子子孙孙有能力受教育之故。我们应该感激古人，同情生者，为他们流涕吊悼之不暇，又那里可以用了轻薄的口吻，轻薄的行为，来妄肆讥侮的呢！

这一个女人，现在大约总还活着，大约总已经穷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我对她虽则没有抱什么幻想，但后来听到了她们中间的某一房，和我们还有极远的亲戚关系，总老是忘不了她，更忘

不了当时那些旁人所说的短和长。

年纪大了一点，读书读得多了，有一次忽然在贺耦耕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里看见了几篇《劝襄阳种桑说》，向作者经历栏去一翻，才知道作者周凯字芸皋，系嘉庆十六年辛未的翰林，浙江富阳县人。

后来更在人家的大厅上看见了些芸皋周凯所写的字，又从老前辈的口里听到了些关于芸皋先生的轶事与遗闻，我对他老先生的崇拜热，才高涨到了百度以上的沸点，而对于他的后裔的这位可怜的少女——当时自然还是少女——更同情到了万分。终于在我去国外读书的前一年，将家里的一只破书箱开了；在这破书箱里，我才第一次看到了有富阳周凯著的一行字题着的《内自讼斋文钞》与《诗抄》，是白莲史纸印的八开大版书。当时读了几遍，总也感不到什么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别，就永远的把内自讼斋丢向了脑后；二十余年来东飘西泊，我也没有回到故乡去小住的机会，所以那一位芸皋先生的后裔以及芸皋先生的故事等，都已经被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次来了福建，接触到了许多先生的手泽与遗书，在风雨晦暝的高楼旅舍里，方才很热烈地又重燃起了儿时的记忆与对乡前辈的不能自已的追思。

芸皋先生生在乾隆四十四年（公历一七七九年），正是大学士高晋及于敏中公去世的那一年。先生祖籍钱塘（待考，然大致总不错），迁富阳后，历三世而至先生；祖讳丰，考讳濂，祖妣李氏，妣杨氏，都因先生故而受封赠。先生同母兄妹六人，先生居第二。先生幼慧，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阳湖恽子居大令。时恽正在做富阳知县，因爱先生才，更令请业于武进张皋文先生，在这两位大文学家的领导之下打定的文学根据底，想来就

是先生后半生的诗文的渊源。十九岁（嘉庆二年）的时候，恽子居调任江山，皋文张惠言编修又因前一年丁艰回里去了，所以先生就改从同邑的高秋水先生读。秋水先生讳傅占，字说岩，本为下高村人，后迁居县城之西门岭，与兄进士公渭占友爱之笃，为全邑人所称颂。先生的得力师友之中，除这三人外，还有阳湖的刘五山氏，光泽的高南农氏。

这时候，富阳的文风，号称极盛，原因是为了继董文恪公东山之后的董文恭公蔗林在做宰辅，而先生的祖父与文恪公居同里闬，且为中表姻亲，所以周董两家，本来就是要好的。十九岁的冬天，先生结婚了；淑人罗氏，是南门头罗家巨观公的长女，年纪比先生要大一岁。

嘉庆五年庚申，先生年二十二岁，乡试荐而不售；越三年，补廪；到了三十岁的嘉庆十三年戊辰，才中了第四十四名的举人，这一年的年底自然要上京去会试了，但是第二年会试的结果仍旧不佳；直到嘉庆十六年辛未，先生三十三岁的时候，方成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过了三年，散馆，授编修；翌年，父让溪公殁；嘉庆廿三年戊寅十月，先生的座师兼亲属长辈同里董相国蔗林也去世了。

从四十一岁到四十四岁（道光二年）的中间，先生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两次；这一年冬天，才外放做了湖北襄阳府的知府（到任日，是道光三年的二月）。

在襄阳知府任上的三年半，是先生初展大才的发轫时期。劝农桑、设义学、广水利、修道路，以及其他的政绩，举不胜举；先生自述，还说古文的进步得力，也在这个时候；而乡里的遗闻传说，更有一段鞭打王灵官的故事，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

喜欢听，喜欢说的。

道光六年，先生年四十八岁，募修襄阳府城的工事未竣，就擢补了汉黄德道，翌年四月，奉檄去京山县勘堤，是年的十月，先生生母杨太恭人以八十岁的高龄去世了。

道光十年庚寅，先生年五十二岁，服阕入都，授福建兴泉永道；自这一年的冬天起，一直到道光十七年丁酉七月三十日，先生在台湾道任上去世之日止，六七年间，是先生第二次的发展文武材具的时期；倘若天假之年，使先生再在台湾经营三年两载，或者这一块东海的大岛，日后不致于会被外人夺去也说不定。

先生在福建的政绩，文的方面，兴书院、敷文教；修厦门、金门的志书，与明代监国鲁王的墓道等等，直到现在，将近百五十年，闽南的百姓，还在思慕先生，说象先生那么的英明果断的人，却是从来所不曾有过的监司。在武的方面呢，先生的成绩更是可观了；第一，消弥泉漳一带百姓的械斗习惯，就是一种绝大的治术。道光十三年先生平台湾嘉义匪徒张丙余孽之大乱，十四年又搜捣晋江之莲埭塔窟白崎诸贼窠，且广收通夷贩卖鸦片之奸匪讼棍等而并戮之。道光十六年调署台湾道后，台凤嘉三邑又因旱灾之故而匪徒纷起，先生南征北伐，终于斩枭凌迟二百八十余犯，乱事以平。

先生生长承平盛世，平时只知读书讲学，不习军旅，但一旦逢着了大难，却能指挥自如，远胜过疆场的宿将，这不是天才又是什么？而且先生的天才不但在政治军事上显了神通，还有先生的绘画，也是清朝一代的名笔。我在杭州，曾从同乡夏定域君处看到过先生在厦门时写的武当纪游二十四图的手卷；笔致的灵奇生动，取最着色的轻巧匀谐，若要到古人中去找比较，恐怕只有

把唐宋元明四代的名家山水，打成一图，然后再加以一味天风海涛的阅历进去，才可以说说。

关于乡前辈芸皋先生的遗闻轶事，还有许多好记；但因我人在客中，手边没有先生的诗文全集，也没有先生同时代人的记录可以参考，这一次只记这一点大略，错误遗漏之处，当更于第二次来补足订正。

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越风》第十三期

北平的四季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先说人的分子罢，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坑者是当然以外，也总

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其次说到北京物质的供给哩，又是山珍海错，洋广杂货，以及萝卜白菜等本地产品，无一不备，无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淡，生活太无变化；一鞭出走，出前门便觉胸舒，过芦沟方知天晓，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我那长子之骨，现在也还埋在郊外广谊园的坟山，而几位极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里同时毙命的受难者的一群。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为叙述的便利起见，想分成四季来约略地说说。

北平自入旧历的十月之后，就是灰沙满地，寒风刺骨的节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我以为顶好是当这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故而夏天去热带，寒天去北极，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说房屋的防寒装置罢，北方的住屋，并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样，用的是钢骨水泥，冷热气管；一般的北方人家，总只是

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墙；上面花厅内都有一张暖坑，一所回廊；廊子上是一带明窗，窗眼里糊着薄纸，薄纸内又装上风门，另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简陋的房屋之内，你只教把炉子一生，电灯一点，棉门帘一挂上，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暖炖炖象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尤其会得使你感觉到屋内的温软堪恋的，是屋外窗外面乌乌在叫啸的西北风。天色老是灰沉沉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围障，而从风尘灰土中下车，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欢吃吃酒，烧烧羊肉锅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够割舍；酒已经是御寒的妙药了，再加上以大蒜与羊肉酱油合煮的香味，简直可以使一室之内，涨满了白濛濛的水蒸温气。玻璃窗内，前半夜，会流下一条条的清汗，后半夜就变成了花色奇异的冰纹。

到了下雪的时候哩，景象当然又要一变。早晨从厚棉被里张开眼来，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眩晕。在阳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来了，蛰伏得很久的小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觅食振翎，谈天说地，吱吱的叫个不休。数日来的灰暗天空，愁云一扫，忽然变得澄清见底，翳障全无；于是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营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赶冰车雪车，就在这一种日子里最有劲儿。

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与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直到了十余年后的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

会得打一个寒颤而吐一口清气，如同在钓鱼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间一样。

北国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记得当时我们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总不远千里地走拢来聚在一道，会谈少年时候在故乡所遇所见的事事物物。小孩们上床去了，佣人们也都去睡觉了，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长谈下去。有几宵因为屋外面风紧天寒之故，到了后半夜的一二点钟的时候，便不约而同地会说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话来。象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象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昙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得象如此的悠长。

总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赏识赏识北方异味者之唯一的机会；这一季里的好处，这一季里的琐事杂忆，若要详细地写起来，总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么大的书好做；我只记下了一点点自身的经历，就觉得过长了，下面只能再来略写一点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怀梦境，聊作我的对这日就沦亡的故国的哀歌。

春与秋，本来是在什么地方都属可爱的时节，但在北平，却与别地方也有点儿两样。北国的春，来得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得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

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一踏出九城的门户，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骤然间身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包管你要张不开眼，立不住脚，而昏蹶过去。

北平市内外的新绿，琼岛春阴，西山挹翠诸景里的新绿，真是一幅何等奇伟的外光派的妙画！但是这画的框子，或者简直说这画的画布，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那一日才能够重见得到天日呢？

从地势纬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象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熏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九十四五度，这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顶多又不过十日的样子。

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得温暖的时期相对立。由春到夏，

是短短的一瞬间，自夏到秋，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睡，就有点儿凉冷起来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别的觉得长，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觉得比别处来得浓厚。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道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实在也正象是一册百读不厌的奇书，使你愈翻愈会感到兴趣。

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烟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它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Indian Summer或叫作小春天气而已。

统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奄息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至于各节各季，正当移换中的一段时间哩，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如雍和宫的打鬼，净业庵的放灯，丰台的看芍药，万牲园的寻梅

花之类。

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七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宇宙风》第二十期

闽游滴沥之六

福州的名胜，三山之外，还有二塔。其实，从前中国的都市府县城池之类，大抵总有几个伽蓝塔院，以为妆饰；这在东洋建筑史上，一定有一段很久的历史，——所受的当然是印度与佛教的影响——不过福建省城的两塔，在对称上独觉得特别一点而已。

两塔的位置，一在于山即九仙山的西麓，城的东南隅；一在乌石山的东首，城的西南角；其间相去，不过两百步的样子，与南门——古称宁越门——两两斜对，却成一个正三角形。两塔的对称，于位置之外，还有一白一黑，一木一石的不同；因而关于两塔，民间也着实流传得有些荒唐的传说。

东面于山山麓的一塔，因为是木造而外面的砖壁上涂以白粉的，所以俗称白塔，与西面的那座颜色苍黑的石塔相对；其实呢，白塔本名定光多宝塔，为天祐元年琅琊王王审知所造，使与西面唐观察使柳冕所造之石塔无垢净光塔相齐。后来梁开平中，表为万岁塔，所以那一个藏塔的寺，亦称万岁塔或万寿塔寺。塔

七级八角，里面以木作阶，象螺旋的样子，共有一百四十二级。这塔看看虽不坚牢，仿佛是马上就得塌倒下来了，可是直到现在，也还每日有人在那里攀登。塔下的寺，有千秋堂，有佛经流通处，更有前后山门，倒也还象个大寺；比到西面的黑塔，与塔下的荒基，要堂皇得多了。

到西边石塔去的一条路，叫作下殿口；弯弯曲曲，狭小不堪，不是发有宏愿，非登一次这黑阴阴的石塔不可的人，决不会寻到。据说唐贞元十五年，德宗诞辰，观察使柳冕为祝圣寿而建此塔，有庾承宣贞元无垢净光塔碑记为证。五代晋天福六年，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圣坚牢塔，林同颖曾有碑记。塔共七层，十六门，七十二角。每一层的每一面中间，都有一个石龛，嵌一石刻佛像，角上刻有一篇愿赞。例如有一块大字塔名碑的那一层上，西南面嵌有石刻南无多宝佛一尊，款书"福清公主王氏二十六娘，驸马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文质，伏愿天宫降福，仙掖迎祥，舜华永茂于容仪，柳絮恒资于赋咏"的几行字刻在那里之类。凡为此塔出钱造像的善男信女，皇帝王后公主驸马以及其他的皇亲国戚，本在最高层上，有一块很详细的题名碑刻在那里的；不过不知于那一朝的那一年，被一位拓碑者的恶心肠所忌嫉，将塔上的碑刻，凡有年份与姓名处，都用锥凿来凿去了。这一个人，我想他总一定还在地狱里受罪，否则，那些塔上的菩萨，以及地下的王氏子孙，又那里肯干休？

石塔的底下一层，南面已经坍了，没有了攀登的入口。胆子放大一点，从坍下来的石块上勉强学着飞檐走壁的妙技，也还可以从第二层起，直登到塔顶。现在塔下面并没有佛寺围住，只剩了一条狭小的弄，向北直引到塔的根头；周围的荒地，也不过数

弓而已。但是塔的西南方，却还有一个住着比丘尼的庵，塔的东南而，也还有一个驻扎保安队的寺存在在那里；这些寺与庵，想来总还是这塔下的寺观的前身。

从双塔下来，一出南门，纵横十余里，直到著名的大桥止，是南台的境界了；南台以钓龙台得名，台在南台西北的大庙山上，也是福州的一个胜境。相传闽越王曾钓龙于此，所以山上的一个大庙的匾额，是闽中第一正神之祠的几个大字。庙后西北而，当福商小学的操场墙外，现在还有一块全闽第一江山的石碑立着；大约南台盛日，这地方一定是一般富商名姬的游宴之区，现在可不行了，只剩了些学校和诗社的建筑物，在那里迎送江潮，斜睁落日。

往日南台最著名的地方，叫作洲边与湾里，是游冶郎的流连忘返，城开不夜的淫乐的中枢。邵武诗人张亨甫，在他那部假名华胥大夫所著的《南浦秋波录》里，曾有过"春秋月夜，灯火千家；远望桥外，旗鼓山光，马龙江色，尽在帘栊几席间。丝竹之声，与风潮相上下，壮士为之激昂，美人为之惆怅，游冶郎之杂沓无论已……"（说洲边）。"湾里地稍宽于洲边，诸姬纵横为楼阁，而街衢之曲折随之。巷宛转以生风，帘玲珑而共月，春人对倚，秋士忘悲；东箇西箫，千珠万玉，是为香海？抑作情天？……"等美辞丽句，记述辛巳年火灾以前的这几处的繁华；现在虽则市而萧条，官娼失势，但是一二三等的妓馆，以及最下流的烟花野雉，还是集中在这一片地方。这地方的好处，是在门临江水，窗对远山，有秦淮之胜，而无吏役之烦；且为历来商业的中心，所以大腹贾与守财奴，都群集在脚下。陆上玩得不够，就可以游水里；西上洪山桥，是去竹崎关水口的要道，东下尚书庙，又是登

鼓山的捷径，故而张亨甫有两首诗说：

狎客宵宵拥翠鬟，水楼烟榭不曾闲，
尚书庙外红船子，只自呼人去鼓山。
新道（系浦西的俗称）年来歌舞繁，洪山桥畔几家存，
金陵珠市今重见，若个人如寇白门。

总之，自南台的大桥至洪山桥，二桥之间，不问是水中还是陆上，从前都是冶叶倡条，张根作势的区域；福州二桥的著名，一半当然是为了它们桥身的长，与往来交通的重要与频繁，可是一半，也在这种行旅之人所缺少不得的白面女姣娘。

因为说到了二塔，所以更及于双桥；既说及了双桥，自然也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女子。可是关于福州少女的一般废话，已经在一篇名《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杂文里说过了，这儿自然可以不必再来饶舌，现在只想补订一下前文所未及，或说错的地方，藉作这一篇短文的煞尾。

居住在水上，以操舟卖淫为业的女人，本来是闽粤一带都有的蜑妇；福州的蜑妇，名叫曲蹄婆，一说是元朝蒙古人的遗族。但据《南浦秋波录》之所载，则这些又似乎是真正的福州土人：

“初，闽永和——闽王王鏻年号——间，王鏻与伪后陈金凤，侍人李春燕，三月上巳，修禊于桑溪，五月端午，斗彩于西湖，皆以大姓良家女为宫婢，进迭奏之音，歌乐游之曲；及闽亡，宫婢年少者，沦落为鼓，世遂名之曰曲喜婆。（注）后音误为舸底，又曰诃黎，盖曲字闽音读如舸诃二音，喜字读如底黎二音。”

张亨甫是闽人，而且又是乾嘉间杰出的才子，考据当然不会错；我在那一篇文字里所说的曲蹄婆，就是这些曲喜婆的意思。

福州的女子，不但一般皮肤细白，瞳神黑大，鼻梁高整，面部轮廓明晰，个个都够得上美人的资格，就从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两点来讲，也当然可以超过苏杭一带的林黛玉式的肺病美女。我所以说，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腊式的；你即使不以整个人的相貌丰度来讲，切去了她的头部，只将胴体与手足等捏成一个模型，也足够与罗丹的Torso媲美了。这原因，是在福州的女子，早就素足挺胸，并没有受过裹脚布的遗毒的缘故。

周栎园的《闽小纪》里，有闽素足女多簪全兰，颇具唐宫妆美人遗意的一条。张亨甫的《南浦秋波录》里，讲得更加详细：

> 诸姬皆不缠足——按缠足或以为始于六朝，始于中唐，始于齐东昏，始于李后主，其说不一；然前明被选入宫之女，尚解去足纨，别作宫样，可知不缠足，原雅装也——所穿履，墙纵不过四寸，横不满二寸；底高不过二寸，长不过三寸，前斜后削，行媕娿以自媚，视燕齐吴越，缠而不纤，饰为假脚者，觉美观矣。

从此可知福州少女身体的健康，都从不缠足不束胸上来的；祖母是如此，母亲是如此，女儿孙女都是如此，几代相传，身体自然要比吴越的小姐们强了。

福建美人之在历史上著名的，当然要首推和杨贵妃争宠的梅妃；清朝初年，有一位风流的莆田县长至刻“梅妃里正”四字的印章，来作他的光荣的经历，与后来袁子才的刻钱塘苏小是乡亲的雅章，同是拜尸狂的色情的倒错。

闽王宫里，自陈金凤以后，代有父子兄弟因争宫婢而相残杀的事情；这些宫婢的相貌如何，暂可不问，但就事其父后，更事

其子的一点来看，也能够推测到她们的虽老不衰的驻颜的妙术。这一种奇迹的复兴，现在也还没有过去，颇闻某巷某宅有一位太太，年纪早就出了三十以外了，但看起来却还只象二十几岁的人。美妇人的耐久耐老，真是人生难得的最大幸福，而福建女子独得其秘，想来总也是身体健康，饮食丰盛，气候和暖，温泉时浴的结果。

听说长乐县的梅花村，是产美人之乡；而两广的俗语里，又有一句"福州妹"的美人称号，足见福建的美人，到处都有，也不必一定局限于梅妃的故里或长乐的海滨。就我及身所见的来说，当民国十一二年，在北京的交际场里最出名的四大金刚，便都是福州府下的人。至今事隔十余年，偶尔与这四位之中的一二人相见于倥偬的驿路，虽则儿女都已成行，但丰度却还不减当年。回头来一看我们自家，牙齿掉了，眼睛花了，笑起来时，皱纹越加得多了，想起从前，真觉得是隔了一世。俗语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所谓万事者，是指那一种浪漫的倾向而言；我的所以要再三记述福州的美女，也不过是隔雨望红楼，聊以留取一点少年的梦迹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宇宙风》第二十二期

饮食男女在福州

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的赞成刘崧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系旧日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上海的小有天以及现在早已歇业了的消闲别墅，在粤菜还没有征服上海之先，也曾盛行过一时。面食里的伊府面，听说还是汀州伊墨卿太守的创作，太守住扬州日久，与袁子才也时相往来，可惜他没有象随园老人那么的好事，留下一本食谱来，教给我们以烹调之法，否则，这一个福建萨伐郎（Savarin）的荣誉，也早就可以驰名海外了。

福建菜的所以会这样著名，而实际上却也实在是丰盛不过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天然物产的富足。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所以山珍海味，一例的都贱如泥沙。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海货来充作食品。又加以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

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是不断；野菜的味道，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福建既有了这样丰富的天产，再加上以在外省各地游宦营商者的数目的众多，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喧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福州海味，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而最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纪》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且鲜，以鸡汤煮得适宜，长圆的蚌肉，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听说从前有一位海军当局者，老母病剧，颇思乡味；远在千里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一刻的渴慕，部长纯孝，就以飞机运蚌肉至都。从这一件轶事看来，也可想见这蚌肉的风味了。我这一回赶上福州，正及蚌肉上市的时候，所以红烧白煮，吃尽了几百个蚌，总算也是此生的豪举，特笔记此，聊志口福。

蛎房并不是福州独有的特产，但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正二三月间，沿路的摊头店里，到处都堆满着这淡蓝色的水包肉，价钱的廉，味道的鲜，比到东坡在岭南所贪食的蚝，当然只会得超过。可惜苏公不曾到闽海去谪居，否则，阳羡之田，可以不买，苏氏子孙，或将永寓在三山二塔之下，也说不定。福州人叫蛎房作"地衣"，略带"挨"字的尾声，写起字来，我想只有"蚳"字，可以当得。

在清初的时候，江瑶柱似乎还没有现在那么的通行，所以周亮工再三的称道，誉为逸品。在目下的福州，江瑶柱却并没有人提起了，鱼翅席上，缺少不得的，倒是一种类似宁波横脚蟹的蟳

蟹，福州人叫作“新恩”，《闽小纪》里所说的虎蟳，大约就是此物。据福州人说，蟳肉最滋补，也最容易消化，所以产妇病人以及体弱的人，往往爱吃。但由对蟹类素无好感的我看来，却仍赞成周亮工之言，终觉得质粗味劣，远不及蚌与蛎房或香螺的来得干脆。

福州海味的种类，除上述的三种以外，原也很多很多；但是别地方也有，我们平常在上海也常常吃得到的东西，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不说。至于与海错相对的山珍哩，却更是可以干制，可以输出的东西，益发的没有记述的必要了，所以在这里只想说一说叫作肉燕的那一种奇异的包皮。

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地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什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福州食品的味道，大抵重糖；有几家真正福州馆子里烧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是同蜜饯的罐头一样，不杂入一粒盐花。因此福州人的牙齿，十人九坏。有一次去看三赛乐的闽剧，看见台上演戏的人，个个都是满口金黄；回头更向左右的观众一看，妇女子的嘴里也大半镶着全副的金色牙齿。于是天黄黄，地黄黄，弄得我这一向就痛恨金牙齿的偏执狂者，几乎想放声大哭，以为福州人故意在和我捣乱。

将这些脱嫌糖重的食味除起，若论到酒，则福州的那一种土黄酒，也还勉强可以喝得。周亮工所记的玉带春、梨花白、蓝家酒、碧霞酒、莲须白、河清、双夹、西施红、状元红等，我都不曾喝过，所以不敢品评。只有会城各处在卖的鸡老（酪）酒，颜色却和绍酒一样的红似琥珀，味道略苦，喝多了觉得头痛。听说这是以一生鸡，悬之酒中，等鸡肉鸡骨都化了后，然后开坛饮用的酒，自然也是越陈越好。福州酒店外面，都写酒库两字，发卖叫发扛，也是新奇得很的名称。以红糟酿的甜酒，味道有点象上海的甜白酒，不过颜色桃红，当是西施红等名目出处的由来。莆田的荔枝酒，颜色深红带黑，味甘甜如西班牙的宝德红葡萄，虽则名贵，但我却终不喜欢。福州一般宴客，喝的总还是绍兴花雕，价钱极贵，斤量又不足，而酒味也淡似沪杭各地，我觉得建庄终究不及京庄。

福州的水果花木，终年不断；橙柑、福橘、佛手、荔枝、龙眼、甘蔗、香蕉，以及茉莉、兰花、橄榄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品物；好事者且各有谱谍之著，我在这里，自然可以不说。

闽茶半出武夷，就是不是武夷之产，也往往借这名山为号召。铁罗汉，铁观音的两种，为茶中柳下惠，非红非绿，略带赭色；酒醉之后，喝它三杯两盏，头脑倒真能清醒一下。其他若龙团玉乳，大约名目总也不少，我不恋茶娇，终是俗客，深恐品评失当，贻笑大方，在这里只好轻轻放过。

从《闽小纪》中的记载看来，番薯似乎还是福建人开始从南洋运来的代食品，其后因种植的便利，食味的甘美，就流传到内地去了；这植物传播到中国来的时代，只在三百年前，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亮工所记如此，不晓得究竟是否确实。不过福建的米

麦，向来就说不足，现在也须仰给于外省或台湾，但田稻倒又可以一年两植。而福州正式的酒席，大抵总不吃饭散场，因为菜太丰盛了，吃到后来，总已个个饱满，用不着再以饭颗来充腹之故。

饮食处的有名处所，城内为树春园、南轩、河上酒家、可然亭等。味和小吃，亦佳且廉；仓前的鸭面，南门兜的素菜与牛肉馆，鼓楼西的水饺子铺，都是各有长处的小吃处；久吃了自然不对，偶尔去一试，倒也别有风味。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些当然又是菜馆中的别调。至如我所寄寓的青年会食堂，地方精洁宽广，中西菜也可以吃吃，只是不同耶稣的飨宴十二门徒一样，不许顾客醉饮葡萄酒浆，所以正式请客，大感不便。

此外则福建特有的温泉浴场，如汤门外的百合、福龙泉，飞机场的乐天泉等，也备有饮馔供客；浴客往往在这些浴场里可以鬼混一天，不必出外去买酒买食，却也便利。从前听说更可以在个人池内男女同浴，则饮食男女，就不必分求，一举竟可以两得了。

要说福州的女子，先得说一说福建的人种。大约福建土著的最初老百姓，为南洋近边的海岛人种；所以面貌习俗，与日本的九州一带，有点相象。其后汉族南下，与这些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餔人”，餔者系日暮袭来的

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还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他们作三把刀，据说就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只今台湾的福建籍妓女，听说也是一样；亡国到了现在，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而她们却仍不肯与日本的嫖客同宿。若有人破此旧习，而与日本嫖客同宿一宵者，同人中就视作禽兽，耻不与伍，这又是多么悲壮的一幕惨剧！谁说犹唱后庭花处，商女都不知家国的兴亡哩！试看汉奸到处卖国，而妓女乃不肯辱身，其间相去，又岂只泾渭的不同？这一种古代的人种，与唐人杂婚之后，一部分不完全唐化，仍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仪式的，就是现在仍旧退居在北门外万山深处的畲民。此外的一族，以水上为家，明清以后，一向被视为贱民，不时受汉人的蹂躏的，相传其祖先系蒙古人，自元亡后，遂贬为蜑户，俗呼科蹄。科蹄实为曲蹄之别音，因他们常常曲膝盘坐在船舱之内，两脚弯曲，故有此称。串通倭寇，骚扰沿海一带的居民，古时在泉州叫作泉郎的，就是这一种人种的旁支。

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颚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划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富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

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又因为东南是海港的关系，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比中原僻地为频繁，所以闽南的有些都市，简直繁华摩登得可以同上海来争甲乙。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天生丽质难自弃”，表露欲，装饰欲，原是女性的特嗜；而福州女子所有的这一种显示本能，似乎比什么地方的人还要强一点。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

亦唯因此之故，所以也影响到了社会，影响到了风俗。国民经济破产，是全国到处都一样的事实；而这些妇女子们，又大半是不生产的中流以下的阶级。衣食不足，礼义廉耻之凋伤，原是自然的结果，故而在福州住不上几月，就时时有暗娼流行的风说，传到耳边上来。都市集中人口以后，这实在也是一种不可避免而急待解决的社会大问题。

说及了娼妓，自然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官娼。从前邵武诗人张亨甫，曾著过一部《南浦秋波录》，是专记南台一带的烟花韵事

的；现在世业凋零，景气全落，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福州最上流的官娼，叫作白面处，是同上海的长三一样的款式。听几位久住福州的朋友说，白面处近来门可罗雀，早已掉在没落的深渊里了，其次还勉强在维持市面的，是以卖嘴不卖身为标榜的清唱堂，无论何人，只须化三元法币，就能进去听三出戏。就是这一时号称极盛的清唱堂，现在也一家一家的废了业，只剩了田墩的三五家人家。自此以下，则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下等娼妓，与野鸡款式的无名密贩了，数目之多，求售之切，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至于城内的暗娼，包月妇，零售处之类，只听见公安维持者等谈起过几次，报纸上见到过许多回，内容虽则无从调查，但演绎起来，旁证以社会的萧条，产业的不振，国步的艰难，与夫人口的过剩，总也不难举一反三，晓得她们的大概。

总之，福州的饮食男女，虽比别处稍觉得奢侈，而福州的社会状态，比别处也并不见得十分的堕落。说到两性的纵驰，人欲的横流，则与风土气候有关，次热带的境内，自然要比温带寒带为剧烈。而食品的丰富，女子一般姣美与健康，却是我们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见。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逸经》第九期

日本的文化生活

无论那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间，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时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从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的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的舒适。

但是住得再久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就马上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拚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识开展的食粮。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

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日本吃过的早餐酱汤的风味；教医院厨子去做来吃，做了几次，总做不象，后来终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里去要了些来，从此胃口就日渐开了；这虽是我个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种简易生活的耐人寻味的地方。

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在后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刻苦精进，原是日本一般国民生活的倾向，但是另一面哩，大和民族，却也并不是不晓得享乐的野蛮原人。不过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这，一半虽则也是奇山异水很多的日本地势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些岛国民族的天性。

先以他们的文学来说罢，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学，当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国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了。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

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最近有一位俳谐师高滨虚子，曾去欧洲试了一次俳句的行脚，从他的记行文字看来，到处只以和服草履作横行的这一位俳人，在异国的大都会，如伦敦、柏林等处，却也遇见了不少的热心作俳句的欧洲男女。他回国之后，且更闻有西欧数处在计划着出俳句的杂志。

其次，且看看他们的舞乐看！乐器的简单，会使你回想到中国从前唱"南风之薰兮"的上古时代去。一樽七弦或三弦琴，拨起来声音也并不响亮；再配上一个小鼓——是专配三弦琴的，如能乐，歌舞伎，净琉璃等演出的时候——同凤阳花鼓似的一个小鼓，敲起来，也只是冬冬地一种单调的鸣声。但是当能乐演到半酣，或净琉璃唱到吃紧，歌舞伎舞至极顶的关头，你眼看着台上面那种舒徐缓慢的舞态——日本舞的动作并不复杂，并无急调——耳神经听到几声琤琤琤与冬冬笃拍的声音，却自然而然的会得精神振作，全身被乐剧场面的情节吸引过去。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能乐舞台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体会得到。将这些来和西班牙舞的铜琶铁板，或中国戏的响鼓十番一比，觉得同是精神的娱乐，又何苦嘈嘈杂杂，闹得人头脑昏沉才能得到醍醐灌顶的妙味呢？

还有秦楼楚馆的清歌，和着三味线太鼓的哀音，你若当灯影阑珊的残夜，一个人独卧在"水晶帘卷近秋河"的楼上，远风吹过，听到它一声两声，真象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不由你不扑簌簌地落下几点泪来；这一种悲凉的情调，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从日本的简单乐器和歌曲里，才感味得到。

此外，还有一种合着琵琶来唱的歌；其源当然出于中国，但

悲壮激昂，一经日本人的粗喉来一喝，却觉得中国的黑头二面，决没有那么的威武，与“春雨楼头尺八箫”的尺八，正足以代表两种不同的心境；因为尺八音脆且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迹近女性的缘故。

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游，也是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的地方。春过彼岸，樱花开作红云；京都的岚山丸山，东京的飞鸟上野，以及吉野等处，全国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是游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之诗，仿佛是为日本人面咏的样子。面祇园的夜樱与都踊，更可以使人魂销魄荡，把一春的尘土，刷落得点滴无余。秋天的枫叶红时，景状也是一样。此外则岁时伏腊，即景言游，凡潮汐干时，蕨薇生日，草菌簇起，以及萤火虫出现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谑浪笑傲，脱去形骸；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虽系中国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盛大无伦。

日本人的庭园建筑，佛舍浮居，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甚至家家户户的厕所旁边，都能装置出一方池水，几树楠天，洗涤得窗明宇洁，使你闻觉不到秽浊的熏蒸。

在日本习俗里最有趣味的一种幽闲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礼节；各人长跪在一堂，制茶者用了精致的茶具，规定而熟练的动作，将末茶冲人碗内，顺次递下，各喝取三口又半，直到最后，恰好喝完。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真令人会想起唐宋以前，太平盛世的民风。

还有“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种有派别师承的妙技；一

只瓦盆，或一个净瓶之内，插上几枝红绿不等的花枝松干，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点缀，小小的一穿围里，可以使你看出无穷尽的多样一致的配合来。所费不多，而能使满室生春，这又是何等经济而又美观的家庭装饰！

日本人的和服，穿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十分雅观；可是女性的长袖，以及腋下袖口露出来的七色的虹纹，与束腰带的颜色来一辉映，却又似万花缭乱中的蝴蝶的化身了。《蝴蝶夫人》这一出歌剧，能够耸动欧洲人的视听，一直到现在，也还不衰的原因，就在这里。

日本国民的注重清洁，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件美德。无论上下中等的男女老幼，大抵总要每天洗一次澡；住在温泉区域以内的人，浴水火热，自地底涌出，不必烧煮，洗澡自然更觉简便；就是没有温泉水脉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为设备简洁，浴价便宜之故，大家都以洗澡为一天工作完了后的乐事。国民一般轻而易举的享受，第一要算这种价廉物美的公共浴场了，这些地方，中国人真要学学他们才行。

凡上面所说的各点，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生活的一小部分。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现在连男女的服装，旧剧的布景说白，都带上了牛酪奶油的气味；银座大街的商店，门面改换了洋楼，名称也唤作了欧语，譬如水果饮食店的叫作Fruits Parlour，旗亭的叫作Café Vienna或Barcelona之类，到处都是；这一种摩登文化生活，我想叫上海人说来，也约略可以说得，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东西，所以此地从略。

末了，还有日本的学校生活，医院生活，图书馆生活，以及

海滨的避暑，山间的避寒，公园古迹胜地等处的闲游漫步生活，或日本阿尔泊斯与富士山的攀登，两国大力士的相扑等等，要说着实还可以说说，但天热头昏，挥汗执笔，终于不能详尽，只能等到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写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福州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五期

怀　鲁　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

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从鹿囿传来的消息

霞：

昨天到了京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旧都，我在八高学生时代，曾经来过好几次的旧游之地。将近二十年的久别，这回见了，心里的确也感到了不少的愉快；但是腐蚀一切旧文化的物质文明，在这旧都的表面上，也留下了许多俗恶浓艳的斑点样的波纹。火车站前高耸着的“丸物”的层楼，“京极”边矮屋檐下闪烁着的轻质的年红，以及少女身上穿着在那里的不相称的洋服，我以为都是将这旧都的固有的美摧残下去的污点。

五层的塔，有挑角的寺院，广袖虹文的少女的衣裳，日本人叫作“蓬婆丽”的那一种象斗斛似的龛灯，这些日本固有的美，现在虽则也还存在，但被新世纪的魔术品来一打混，颜色就暗淡得多了。

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坐汽车到了奈良法隆寺前，是日本圣德太子的道场，古物之多，多得象进了北京旧日的博物馆。木造的那间金堂，阅时一千好几百年，现在还坚强得同新造的一样。五

重塔，仁王门，以及东院的梦殿传法堂之类，古色古香，没有一处不令人肃然起敬。我在这梦殿里想起了正在受难的祖国，想起了又将纷乱的国内的政情。

午后到了奈良市内，与作家志贺直哉氏谈了两个多钟头的闲天。他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练绝伦；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大可以比得中国的鲁迅，我们也曾谈到了这一位新近去世的中国最大的文人。

这两日来，日本天气变得异常的闷热，虽在十二月里，却有点象黄梅时节的样子。我在奈良的汽车上，遇到了一阵大雷大雨，在志贺氏的书斋里也看了许多打在他那座庭园里的拳大的雨点。两个人听着雨声，吃着从新村送来的梨儿以及美味的红茶三明治等，竟把门外面等着送我回车站去的汽车忘了。直到志贺氏告诉我说"把汽车先回覆了它吧"的时候，我才感到了谈话的时间过于久长，想立起身来告辞。但一则碍于主人的款待太殷，二则也嫌天上的雨点太大，看看他所收藏着的八大山人，沈石田以及元人的画幅，竟又把站起来的半身坐了下来。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雨点住了，我匆匆地向他道了谢，告了别，但他却硬主张同我一道地出去走走。临行的时候，还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著作集《万历赤绘》。一边走出了门，一边他说："印错的字太多，实在不愉快得很"。

从雨后的山谷里，穿到上春日山若草山去的那一条深林古道，实在令人有点舍不得马上就将它走完。他说："昨天有古装的行列，前天将宝镜从里宫搬到了外宫，今晨又搬回来，这是奈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祀，可惜你迟来了两天，没有赶上"。被他这么的一说，我倒也深感到了昨天不上奈良来过夜的失策。

我们从山后走到了山前，在路上又遇着了东大寺的住持上司氏。由上司氏引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看完了大佛寺及附近的一切值得看的古物与风景。

志贺氏说："我虽则在这里住上了十几年的光景，但一个人却从没有出来这样的走过"。

在大佛寺前的茶座里吃完了一盆薇蕨做的糕饼之后，天色也渐渐的晚了；我们和上司氏分了手，他又和我走上了坐公共汽车的站头。在灰暗的夜阴里踏上汽车，和他点头作别的一瞬间，我于感激之余，几乎想再跳下车来，仍复送他回去。若在十几年前的年青时代，当这样的时候，我想又免不得要滴几滴感伤的清泪了。志贺氏的待人的诚挚，实在令人感动。我真想不到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还会遇得到这一个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他是日本第一个寡作的小说家，正唯其寡作，所以篇篇都是珠玉。他说"近来在改削那篇长篇《暗夜行路》的后半"，我坐在回京都来的电车中，仿佛看到了他那种枯坐在灯下，握笔推敲，不到自己满意时不止的真情热意。今天是十八，明天要上船离开日本了；上床睡不着，所以又重新起来，挑灯写这一封信。

你将此信看完之后，就请加封转寄给亢德，信上面应加上一个《从鹿囿传来的消息》的题名，余事等到了台湾之后再谈，祝你和小孩们都好！

达夫　十二月十八夜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三十三期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最近在发起纪念鲁迅的文学奖金基金的募集，这当然是一件盛举。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功，鲁迅在国际间的地位，鲁迅的思想与人格，在鲁迅死后各新闻杂志上，已经登载了不少了，我在这里，可以毋庸赘说；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在中国，象这一种纪念文豪的文学奖金的绝无而仅有。

民族是要生长的，民族文化，也是要演进培育的；我们纪念前人，若用奖励后进的方法来纪念，岂不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我在厦门的时候，已经商请厦门市政府将厦门大学前面的一条大道命名作鲁迅路，以资纪念这作家的伟大了，现在当这些筹备委员正在发起基金募集的时候，我也希望福建的文艺界中人，都能够踊跃参加，表示我们的民族、也未始不可以有为，对于发扬民族光辉的人物，也未始不个个都在崇拜。捐款请代交福建民报会计处收，时间当以二月底为第一期截止之期，募款启事，附在下面：

近接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启事一则，内云：鲁迅

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是办理正式纪念委员会组织事宜的临时机关，经过情形，已见公告。现在筹备会，敦请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等先生为正式纪念会委员，并且已蒙诸先生同意了。这正式的纪念委员会，还包括了国际的文化界名人，日本方面已经接洽就绪，欧美方面已去接洽，不久也可以有回讯。

"关于永久纪念办法，筹备会已收到了许多提议。'纪念文学奖金'是其中之一。这既可以纪念鲁迅先生在文化上的功业，也可以发扬鲁迅先生提掖青年的精神，用意甚善。不过既要建立文学奖金，就先得有基金，现在拟先募集基金，至于纪念奖金的详细办法，将来等正式纪念委员会成立以后，另行拟订。筹备会本已委托各地中国银行信托部代收各界输捐之纪念基金，现在为求便利起见，特商请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诸先生负责收集后代交银行再发收据。盼望各界热心人士共襄盛举，就近与前述诸先生接洽，至为感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启"。

凡热心人士有愿输捐者，请将芳名并捐款示知为荷。一俟捐款有相当成数，既当汇沪请筹备会发给正式收据以昭信实。

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谨启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福建民报·小园林》第九六二号

里西湖的一角落

记得是在六七年——也许是十几年了——的前头，当时映霞的外祖父王二南先生还没有去世，我于那一年的秋天，又从上海到了杭州，寄住在里湖一区僧寺的临水的西楼；目的是想去整理一些旧稿，出几部书。

秋后的西湖，自中秋节起，到十月朝的前后，有时候也竟可以一直延长到阴历十一月的初头，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

天气渐渐凉了，可是还不至于感到寒冷，蚊蝇自然也减少了数目。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教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桨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

滓的地步。“秋天好，最好在西湖……”我若要唱一阕小令的话，开口就得念这么的两句。西湖的秋日真是一段多么发人深省，迷人骨的时季吓！（写到了此地，我同时也在流滴着口涎。）

是在这一种淡荡的湖月林风里，那一年的秋后，我就在里湖僧寺的那一间临水西楼上睡觉，抽烟，喝酒，读书，拿笔写文章。有时候自然也到山前山后去走走路，里湖外湖去摇摇船，可是白天晚上，总是在楼头坐着的时候多，在路上水上的时候少，为的是想赶着这个秋天，把全集的末一二册稿子，全部整理出来。

但是预定的工作，刚做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天午后二南老先生却坐了洋车，从城里出来访我了。上楼坐定之后，他开口就微笑着说：“好诗！好诗！”原来前几天我寄给城里住着的一位朋友的短札，被他老先生看见了；短札上写的，是东倒西歪的这么的几行小字：“逋窜禅房日闭关，夜窗灯火照孤山，此间事不为人道，君但能来与往还。”被他老先生一称赞，我就也忘记了本来的面目，马上就教厨子们热酒，煮鱼，摘菜，做点心。两人喝着酒，高谈着诗，先从西泠十子谈起，波及了杭郡诗辑，两浙輶轩的正录续录，又转到扬州八怪，明末诸贤的时候，他老先生才忽然想起，从袋里拿出了一张信来说：

“这是北翔昨天从哈尔滨寄来的信，要我为他去拓三十张杨云友的墓碣来，你既住近在这里，就请你去代办一办。我今天的来此，目的就为了这件事情。”

从这一天起，我的编书的工作就被打断了，重新缠绕着我，使我时时刻刻、老发生着幻想的，就是杨云友的那一个小小的坟亭。亭是在葛岭的山脚，正当上山路口东面的一堆荒草中间的。四面的空地，已经被豪家侵占得尺寸无余了，而这一个小小的破

烂亭子，还幸而未被拆毁。我当老先生走后的第二天带了拓碑的工匠，上这一条路去寻觅的时候，身上先钩惹了一身的草子与带刺的荆棘。到得亭下，将荒草割了一割，为探寻那一方墓碣又费了许多工夫。直到最后，扫去了坟周围的几堆垃圾牛溲，捏紧鼻头，绕到了坟的后面，跪下去一摸一看，才发见了那一方以青石刻成的张北翔所写的明女士杨云友的碑铭。这时候太阳已经打斜了，从山顶上又吹下了一天西北风来。我跪伏在污臭的烂泥地上，从头将这墓碣读了一遍，觉得立不起身来了；一种无名的伤感，直从丹田涌起，冲到了心，冲上了头。等那位工匠走近身边，叫了我几声不应，使了全身的气力，将我扶起的时候，他看了我一面，也突然间骇了一大跳。因为我的青黄的面上，流满了一脸的眼泪，眼色也似乎是满带了邪气。他以为我白日里着了鬼迷了，不问皂白，就将我背贴背的背到了石牌坊的道上，叫集了许多住在近边的乡人，抬送我到了寺里。

过了几天，他把三十张碑碣拓好送来了，进寺门之后，在楼下我就听见他在轻轻的问小和尚说：

"楼上的那位先生，以后该没有发疯罢！"

小和尚骂了他几声"胡说！"就跑上楼来问我要不要会他一面，我摇了摇头只给了他些过分的工钱。

这一个秋天，虽则为了这一件事情而打断了我的预定的工作，但在第二年春天出版的我的一册薄薄的集子里。竟添上了一篇叫作《十三夜》的小说。小说虽则不长，由别人看起来，或许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在我自己，却总因为它是一个难产的孩子，所以格外的觉得爱惜。

过了几年，是杭州大旱的那一年，夏天絜妻带子，我在青岛

北戴河各处避了两个月暑，回来路过北平，偶尔又在东安市场的剧园里看了一次荀慧生扮演的《杨云友三嫁董其昌》的戏。荀慧生的扮相并不坏，唱做更是恰到好处，当众挥毫的几笔淡墨山水，也很可观，不过不晓得为什么，我却觉得杨云友总不是那一副相儿。

又是几年过去了，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忽而发了醉兴，跑上了福州。福州的西城角上，也有一个西湖。每当夏天的午后，或冬日的侵晨，有时候因为没地方走，老跑到这小西湖的边上去散步。一边走着，一边也爱念着“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的两句成语，以慰乡思。翻翻福州的《西湖志》，才晓得宛在堂的东面，斜坡草地的西北方，旧有一座强小姐的古墓，是很著灵异的。强小姐的出身世系，我也莫名其妙，但是宋朝有一位姓强的余杭人，曾经著过许多很好的诗词，我仿佛还有点儿记得。这一个强小姐墓，当然是清朝的墓，而福州土著的人，或者也许有姓强的，但当我走过西湖，走过这强小姐的墓时，却总要想起“钱塘苏小是乡亲”的一句诗，想起里湖一角落里那一座杨云友的坟亭；这仅仅是联想作用的反射么，或者是骸骨迷恋者的一种疯狂的症候？我可说不出来。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在福州

原载一九三七年《越风》增刊第一集

看　闽　剧

福州的高尚娱乐场所不多，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家属的高尚娱乐地方为更少。所以一个健全的剧场和电影院的设立，我以为是必要的事情。

星期例假，若遇到天晴，还可以上鼓山，鳝溪，磨溪，罗星塔等地方去走走，若遇天雨，则简直没有走走的地方了，于是只有群居终日，作不义之言之事的消遣，这我以为是都市住民的不幸。

到福州以来，闽剧场是去过好几次的，最感到不满的一点，是那些演员的知识的不高。他们非但知识不丰富，有些地方，简直连常识都还不够。譬如，随地涕吐的这件事情，是进过小学的学生，都知道是应该戒绝的，而演员在台上演戏，竟老有若无其事，随地乱吐痰唾的事情。

演员的一般习气，更加觉得幼稚得可怜。譬如在三十年前，上海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小孩子的玩具，现在在闽剧演员的身上，个个都还带着。这玩具是什么？就是用黄铜薄皮打成，三个铜子

一枚的那些牙齿套——假冒金牙齿的牙齿套。镶金牙齿，本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证明这人的知识的不足，而于金牙齿之外，再个个人以黄铜牙齿套来做装饰品，岂不更可笑了么？我想第一个闽剧演员，满口黄牙地用这种装饰品的人，必定是一个大滑稽家。他因为要故意夸张他的没有常识浅薄可笑，才用这一个满口黄牙的化装方法来表现他的滑稽可笑，仿佛是刚刚吃过什么污臭食品似的。现在却连悲剧的主人公，都装出这一副滑稽的样子来了，岂不是本末颠倒的事情？或者有人要说，闽剧演员的个个要套这黄牙齿套是在表示他们的有钱，那么我们看戏，还不如去看法币，倒要比看这些黄牙齿，更直截了当些。

其次是剧本的问题了。后花园私定终身，落监小生中状元，金銮殿上大团圆，这似乎是闽剧一定的节目。当然这一种戏，也未始不可以做，但不对的却是那些中间前后穿插的太没有变化。大关节目，既然是一定了，那穿插就非多一点变化不可，譬如中状元之后的情节，也可以添演上去的，为什么就只演到中状元为止呢？未定终身，未落监之前的情节，也是一样。所以剧情的延长和缩短，我以为都是可以救这千篇一律的坏处的。

还有关于闽省的历史剧和地方实事剧，以及短的滑稽剧，忠义剧，在闽剧里，似乎不多。这一方面，若去开发起来，我以为材料是不会少的。譬如一个小工人或小商人，冒险到南洋去经商，他的家里的儿女子等辈，总也有许多的悲欢喜愤的事情，可供演剧的材料。闽王开国以来，几百年的中间在福建难道就找不出《三国志》似的戏剧的材料？譬如蔡状元修造洛阳桥，郑成功远渡东南海，梅妃恨多谢珍珠赐，郑和船喜有海神扶之类，随便想想，就有这么些个。

闽剧的必须有头有尾，全本自始至终的连演下去，我以为是不十分好的现象。譬如我们要排演一出郑所南，或者俞大猷的戏，若要从他们的自小读书习艺演起，演到寿终正寝为止，不知道要费去几多回的场面。我们若能将精彩的地方，割出几段来排演，岂不省事？

神仙怪诞，外国戏里，也未始没有；可是闽剧里的神仙之类，似乎也只是状元与千金小姐一样地单调的产物。

闽剧的歌辞，我本来是不懂的，但听来听去，觉得总是那几个老调子。从这一方面来下手，假如有几个象京剧里的汪大头，秦腔里的十三旦之类的人出来，加以一番改革，我想闽剧或可以独立地自成功一派，以与京剧昆曲和粤剧来对抗（粤剧在近来是很进步的歌剧，闽剧改良，可以取来做个参考）。

综上所述，都是闽剧门外汉的闲谈。不过这些愚人之见，或者对闽剧的改进，也可以有点旁敲侧击之微功。改良会诸君，若能将闽剧改良到使观众不会感到肉麻的地步，我以为功劳就等于修造或千万间的广厦。使福州市民有一个在雨天在晚上及时行乐的去处，对社会自然是很有利益的，若更能进而至于教导民众的地步，那闽剧改良，就可以说是最后的目的，也达到了。

廿六年四月廿六

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福州《闽剧月刊》创刊号

福州的西湖

天气热了之后，真是热得不可耐，而又不至于热死的时候，我们老会有那一种失神状态出现，就是嗒焉我丧吾的状态。茫茫然，浑浑然，知觉是有的，感觉却迟钝一点；看周围的事物风景，只融成一个很模糊的轮廓，对极熟悉的环境，也会发生奇异的生疏感，仿佛似置身在外国，又仿佛是回到了幼小的时期，总之，是一种半麻木的入梦的状态。

与此相反，于烈日行天的中午，你若突然走进一处阴凉的树林；或如烧似煮地热了一天，忽儿向晚起微风，吹尽了空中的热气，使你得在月明星淡的天盖下静躺着细看天河；当这些样的时候，我们也会起一种如梦似的失神状态，仿佛是从恶梦里刚苏醒转来的样子，既不愿意动弹，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陶然泰然，本不知道有我，更不知道有我以外的一切纠纷。

这两种情怀，前一种分明有不快的下意识潜伏在心头，而后一种当然是涅槃的境地。在福州，一交首夏，直到白露为止，差不多每日都可以使你体味到这两种至味。

因为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所以夏天的太阳出来得特别的早；可是阳光一普照，空气，地壳，山川草木，就得蒸吐热气。故而自上午八九点钟起，到下午五时前后止，热度，大约总在八十六七至九十一二度的中间。依这一度数看来，福州原也并不比别处特别的热，但是一年到头——十二个月中间，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天天都是如此，因而新自外地来的人，总觉得福州这地方比别处却热得不同。在福州热的时间虽则长一点，白天在太阳底下走路的苦楚，虽则觉得难熬一点，但福州的夏夜，实在是富有着异趣，实在真够使人留恋。我假使要模仿《旧约》诸先知的笔调，写起牧歌式的福州夏夜记事来，那开始就得这么的说：

——太阳平西了，海上起了微风。天上的群星放了光，地上的亚当夏娃的子女，成群，结队，都走向西去，同伊色列人的出埃及一样。……

为什么一到晚上，福州的住民大家要走向西去呢？就因为在福州的城西，也有一个西湖，是浮瓜沉李，夏夜乘凉的唯一的好地方。

没有到福州之先，我并不知道福州也有一个西湖。虽则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但我们所习知的，总只是与苏东坡有关的几个，河南颍上，广东惠州，与浙江杭州。到了福州之后，住上了年余，闲来无事，到各处去走走，觉得西湖在福州的重要，却也不减似杭州，尤其是在夏天。让我们先来查一查这福州西湖的历史（当然是抄的旧籍），乾隆徐景熹修的《福州府志》里说：西湖在侯官县西三里。

《三山志》蓄水成湖，可荫民田。《闽都记》周廻二十里，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湖，与海通潮汐，所溉田不可胜计。

《闽书》西湖晋太守严高所凿，蓄泄泽民田，周围十数里；王审知时大之，至四十余里。

自从晋后，这西湖屡塞屡濬，时大时小；最后到了民国，许世英氏在这里做省长的时候，还大大地疏濬了一次，并且还编了一部十二大册的《西湖志》。到得现在，时势变了，东北角城墙拆去，建设厅正在做植树，修堤，筑环湖马路的工作。千余年来西湖的历史，不过如此；但史上西湖的黄金时代，却有先后的两期。其一，是王审知王鏻以后的时期。闽王宫殿，就筑在现在的布使埕威武军门以内；闽王鏻时，朝西筑甬道，可以直达西湖，在湖上并且更筑起了一座水晶的宫殿，居民道上，往往可以听见地下的弦索之音。

闽王后代，不知前王创业的艰难，骄奢淫佚，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宫婢陈金凤的父子聚麀，湖亭水嬉，高唱棹歌，当然是在这西湖的圈里，这当是西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其次，是宋朝天下太平，风流太守，象曹颖区，程师孟，蔡君谟等管领的时代。诗酒流连，群贤毕至，当时的西湖虽小，而流传的韵事却很多！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那部民国初年修的《西湖志》里，所记的遗闻轶事，歌赋诗词，亦以这一代的为多，称它为西湖第二期的黄金时代，大约总也不至大错。

其后由元历明，以及清朝的一代，虽然也有许多诗人的传说在西湖；但穷儒的点缀，当然只是修几间茅亭，筑一些坟墓而已，象帝王家，太守府那般的豪举，当然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西湖的家谱，只能供好寻故事的人物参考，现在却不得不说一说西湖的面貌，以尽我介绍这海滨西子之劳；万一这僻处在一方的静女，能多得到几位遥思渴慕的有情人，则我一枝

秃笔的功德也可以说是不少。

杭州的西湖，若是一个理想中的粉本，那么可以说颐和园得了她的紧凑，而福州的西湖，独得了她的疏散。各有点相象，各有各的好处，而各在当地的环境里，却又很位置的得当。

总之，是一湖湖水，处在城西。水中间有一堆小山，山旁边有几条堤，几条桥，与许多楼阁与亭台。远一点，是附廓的乡村；再远一点，是四围的山，连续不断的山。并且福州的西湖之与闽江，也却有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那么的关系，所以要说象，正是再象也没有。

但是杭州湖上的山，高低远近，相差不多；由俗眼看来，虽很悦目，一经久视，终觉变化太少，奇趣毫无。而福州的西湖近侧，要说低岗浅阜，有城内的屏山（北）与乌石山（南），城外的大梦山祭酒山（西）。似断若连，似连实断。远处东望鼓山连峰，自莲花山一路东驰，直到海云生处。有时候夕阳西照，有时候明月东升，这一排东头的青嶂，真若在掌股之间；山上的树木危岩，以及树林里的禅房僧舍，都看得清清楚楚；与西湖的距离，并不迫近眉睫，可也不远在千里，正同古人之所说，如硬纸写黄庭，恰到好处的样子。

福州的西湖，因为面积小，所以十景八景的名目，没有杭州那么的有名。并且时过景迁，如大梦松涛的一景，简直已经寻不出一个小浪来了，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但是开化寺前的茶店，开化寺后，从前大约是宛在堂的旧址的那一块小阜，却仍是看晚霞与旭日的好地方。西面一堤，过环桥，就可以走上澄澜堂去，绕一个圈子，可以直绕到北岸的窑角诸娘的家里，这些地方，总仍旧是千余年前的西湖的旧景。并且立在环桥上面，北望诸山腰

里的人家，南瞻乌石山头的大石，俯听听桥洞下男男女女的行舟，清风不断，水波也时常散作鳞文，以地点来讲，这桥上当是西湖最好的立脚地。桥头东西，是许世英氏于五四那一年立"击楫"碑的地方，此时此景，恰也正配。

福州西湖的游船，有一种象大明湖的方舟，有一种象平常的舢板，设备倒也相当的富丽，但终因为湖面太小了一点，使人鼓不起击楫的勇气；又因为湖水不清，码头太少，四岸没有可以上去游玩的别墅与丛林，所以船家与坐船的人，并没有杭州那么的多。可是年年端午，西湖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总是人多如鲫，挤得来寸步难移；这时候这些船家，便也可以借吊屈原之名而扬眉吐气，一只船的租金，竟有上二三元一日的；八月半的晚上，当然也是一样。

对于福州的西湖，我初来时觉得她太渺小，现在习熟了，却又觉她的楚楚可怜。在《西湖志》的附录里，曾载有一位湖上的少女，被人买去作妾；后来随那位武弁到了北京，因不容于大妇，发配厮养卒以终。少女多才，赋诗若干绝以自哀，所谓"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以及"嫁得伧父双脚健，报人夫婿早登科"等名句，就是这一位福州冯小青之所作。诗的全部，记得《随园诗话》，和两般《秋雨庵随笔》里都抄登着在。她，这一位可怜的少女，我觉得就是福州西湖的化身；反过来说，或者把西湖当作她的象征，也未始不可。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福州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广州《宇宙风》第七十期

全面抗战的线后

自七月七日夜，芦沟桥日军来袭，八月十三晨，上海日水兵炮击我保安队后，数十年来之宿怨，四万万人之积愤，一旦爆发，立时演成了我中华全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我们虽是弱国，但我们决不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之耻，经此一战而雪尽；虽则苦战只一二月，以后长期抵抗，将不达到胜战的目的不止，多则三年，少亦两载，忍苦杀敌之来日方长；可是只将此一二月之战绩论，中华民族复兴之兆，已早显示在我们的目前，民族战争史上的光荣，我们早已占有一席地了。我们生逢着这一伟大时代，个人的情绪紧张，牺牲的决心坚固，原是当然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怀念着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孺同胞，以及无衣食无武器的劳工大众，直接简接在受暴日炮火炸弹的虐杀。记者于沪战开始后，曾由海上飘泊至宁波，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见，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迄今事隔多日，而中宵梦魇，犹见许多避难同胞，凄惨流离在道路之中。因借《公余》余白，略记二三目击琐事，以志日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惨无人道；并欲昭示子孙，永勿忘日本军

阀，实为我中华民族之世仇。

自八月上旬起，因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日日在公园靶子场一带耀武扬威，附近居民，深恐"一二八"惨剧之重演，早已纷纷迁避入英法租界。盖闸北"一二八"之血迹未干，而日本军人面貌之狞恶如故，矢在弦上，势在必发，惊弓之鸟，自不能如常时之镇定。

八月十日，记者因事去北四川路，见自老靶子路铁门以北，临街铺户，全部门窗紧闭，绝似元旦清晨阖街休息的景象。与元旦不同之处，唯在街上行人的绝少，——因行人一稀少之故，二三野狗与陆战队巡逻兵卒往来之影，反更惹人注意。——电车公共汽车内坐客的零落，与夫各铺户门上，都贴有红色及绛黄色迁移或招租广告的几点。记者栖息或经行沪滨垂二十年，从未见有如此凄惨萧条之市景。山雨欲来，大难将至，居民殆从日水兵之行动上早已感觉到了。

自老靶子路向西，转出北站，则铁栅栏附近，闸北居民，犹在列出埃及之长蛇阵。一只破旧皮箱，一捆帐子被褥，及便桶洋炉灶之类，几乎是伊辈各具之财产，因知稍为富有者，早已迁避一空，此辈均系捱迟避难之中下平民。人力车夫之趁火打劫，亦唯对此辈为独甚；记者曾亲眼见一辆车资，自北站拉至三马路大新街口，讨价为一元五角，讲定价钱为大洋一元，而车夫态度，尚强硬舒徐，有薄此而不屑拉的神气。

促成沪北居民如此恐慌之直接最大原因，实为八月九日午后，两日水兵因窥测我红桥机场之故的被击。敌国军人，际此险象环生之备战时期，无故而闯入我戒严地带，意图刺探军情，且先以枪弹伤杀我卫兵，我之还击，自属正当防卫，而日军部当局，反向我发最后通牒，欲威逼我保安团队，限刻全部退出淞

沪。在这情形之下，中国军人若无血气则已，若有人性，自然不能隐忍，必予以强有力之抵抗；居民熟悉此事之经过，知日军之已有计划地向我进攻，其仓皇逃避，理固宜然；所可恨者，诸江北同胞，漠不知同舟共济之大义，反欲乘危急而发此不义之大财，实为我民族之一污点。

记者因迎自日返国之一旧友而赴沪，居停十日，诸事已接洽就绪，早晚打点上船返闽，离去上海。十一日午后，适有三北公司之靖安轮南行，十一日晨便从谣言丛集难民满地之上海埠头上船，犹冀侵略者或将勒马悬崖，不轻作玩火之把戏；至少在江浙之片隅，或许能继续其平时通商生产诸事业。

半月来秋高气爽，天气日日晴明，若在平时，此番航海，如行地中海上，旅客可坐赏沿海各岛屿风景，反较陆行舒适。但因时局紧张，船中旅客增加至一倍以上。下午四时，船驶出吴淞口边，又见有日本军舰二三十只，停泊在浦江上下；陆战队兵士，正在阳光下搬运弹药食品，忙如雨后马蚁；而白色浅底之日本扬子江舰队，分靠在两岸，尚不在那二三十艘战舰之数中。因眼见到了这些日本备战的舰只，又夹以脑际带来的沪上所散布着的风闻，乘客之中，有断定今晚或即有战争爆发者；然亦有乐天家以滑稽口吻，在作谐谈，谓日本所有财产，都已搬至黄浦江上，目的实只在示威，小丑究何敢跳梁云。

船出口后，风平浪静，新月如钩，食堂内议论风生，所谈的无非是战争时事；殊不知在船客兴高采烈之此际，大风警报已由无线电传到船上，而上海的战云，亦正在一刻一刻地紧迫。

十二日，海上无事，唯觉风大了一点，就至宁波附近依岸行舟；至十三日晨从舱里睡醒起床，船主已使人来报信，谓上海战

事爆发，我军大胜，日海军司令部已被我军占据。自此消息传出后，船中乘客，个个紧张，逃难船客，亦顿忘了奔波之苦，而大风早已追近我们的路线，船于下午不得不在舟山湾附近抛锚躲避。自此日起，靖安每日一进一退，只在海上作游弋，绝似避暑之快艇，在大海中作逍遥游者；实则半为大风，半为敌舰，恐中途被劫虏，故不得不作迷途之鸥鸟，以避危险。如此行动，继续了两昼夜，到十五日晨，才决定回航，去宁波暂避。驶进镇海口，到达宁波江北岸时，正将近十点的样子。

在宁波上岸后，晨光中所见之街市萧条景象，与上海所见者略同；急驱车至鄞县县府，询之陈县长，方识敌机受汉奸密报，昨日曾飞来炸我曹娥及诸暨等处，我之军械战机，曾无若何损失，而敌机数架，却被击落在绍属境内。自宁波站上火车，一路上听人谈论，都系昨午空战之情形。下午一时，过慈溪车站，且见有被缚之汉奸两名在站上示众，手臂上有一油墨印成之令字，擦之不去。沿途聚观之乡民，眦裂发指，都有生啖奸肉之概。在火车内，且闻有人谈起，昨晚在一小客栈中，被臭虫咬扰，终夜不能合眼，因与大家议定，此后见有臭虫，将统叫作"日本军阀"，可以表示日军阀之吮吸人血，臭气熏蒸。我国国民之怨恨日本侵略，及愿世世勿忘此仇之志，于此等谈话及气概中可以见到。中日两民族，所以积怨至如此地步，比当年法德更甚者，实由日本军阀一手所造成。名臭虫作"日本军阀"大有油炸桧之意，预料一年半载之后，此类名词，将普遍流行于中国，汉奸及日军阀之遗臭，在我中国或将延长至万万年，也说不定。

车过曹娥，渡江后，还能见到昨午空战之遗迹；被击落之臭虫机一架，远堙在西北面之稻田中，小臭虫除两只被活捉，解赴

杭州外，四只尸体，尚未埋下，惜因时间匆促，未能往摄一影片，以示我空军之威武。夜宿绍兴，居民都早就息灯安寝，似有静卧一宵，预备明日再去杀敌之意。

绍兴晨起，即见有满天微雨，散落中庭。冒雨至五云，赶车到江边，还未敲八点。江边的景象，才是一幅惨极的流民移徙图，非身到其境者，不会感到日军的残酷无人道，专擅在无武器非战斗员的妇孺老幼间施虐；我军人之勇气百倍，誓欲为各老幼报仇之敌忾心，殆亦由日军的此种暴行所促成。

江边在大雨之下，泞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难民，将近一万，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东面水际，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之妇人备极忙碌，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婴儿啼哭声，隐隐自人丛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闻之巡警，谓此辈工人，都在此待搬运器来，将散归至宁绍各乡村。每日通过者，约有数万，如此情形，已继续了三四天了。

渡江至南星桥，自凤山门进城，路上行人稀少，商店亦大半掩户停业。到家前五分钟，已闻得空袭预报。入门坐定，则紧急警报已发，不上两分钟，敌机一队，自东南飞越到了；我迎击之机，四面蜂起，围住了敌机。一刹那间，空中机枪声大作，而振动屋宇之巨弹声，亦随急响了两下。不上五分钟，敌机逃逸，我机亦已远追开去。空中静寂，唯开微雨洒叶上之声；不三十分钟，警报解除之号吹亦发，我威武之空军杀敌情形，即在当午之号外上见到。是役敌投两弹，均落览桥田野中，损伤全无，敌机一架被击落在海宁附近，两架受伤，旋亦坠落，正由我军在寻觅中云。

原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福州《闽政与公余》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去年的今日，鲁迅先生病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当时我在福州，骤接讣电，真有点半信半疑。匆忙赶到上海，在万国殡仪馆瞻拜遗容之后，一腔热泪，才流了个痛快。因为当时情绪太紧张，而纪念鲁迅先生的文字也很多，所以一时并没有写什么东西。其后和景宋女士以及几位先生的老友讨论先生身后等问题，头脑现实化了，所以也写不出什么纪念的文字。鲁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实在太深沉广博了。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儿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遥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到彼；所以自从先生故后，虽老在打算写点关于他的纪录，但终于不能成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他相交，前后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情形，太习熟了，若想学高尔基记托尔斯泰那么的章法来写，一时又觉琐忆丛集，剔抉为难。因此种种，所以只能把这事情暂时搁起，打算等到我晚年的暇日，再来细细的回忆，慢慢的推敲。

先生逝世一周年日，同人等已于救亡协会成立之时，开过一

个小小的纪念会；大家都以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现在，先生遗志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对侵略者，我们已予以打击；可是黑暗势力所产生的汉奸们，还在我们的后方，跳梁显丑。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志的目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福州《小民报·怒吼》

小剧团公演之成功

十一月十二日晚，民众教育处实验小剧团在文艺剧场公演田汉的剧本《回春之曲》，由吴英年氏导演，观众情绪紧张，确为福州话剧界之一新纪元。剧情并布景及舞台效果，想为观众所洞悉，可不再说。现在只就各个演员之演出成分，下一二断语。

黄碧如身分适合，恰到好处，唯颜面化装，过于浓厚，或系脂粉质差之故。

梅娘唱做俱佳，二幕尤见精彩。所可惜者，服装不甚完美，当求改进。

胡夫人，态度自然，有大家少奶奶风，但发音欠高欠洪，加以练习，可致大成。

男演员，个个出色，连伤兵医生，都能各出长技，唤起观众注意，实系难能可贵之事。陈三水演作颇有独到处，唯说话时，过意置重于抑扬，易令人想起职业演员的窠臼。这一点，说好，原也是好，说俗，则难免有几分俗套，若能纠正，则锦上添花。

其次，是剧本问题，原作经导演者加以改编一二处后，舞台

效果，果然比原剧本增加不少；但有些对话，还觉有不自然处。方知作剧本者，非看原剧本演出至三五次，修改至五六次，决不能成功。

田汉之作此剧，想在三四年前，技巧比从前大进步了。由熟悉田汉前半生事迹之人看来，更觉弦外有音。首幕取材于南洋，且以南洋侨女与女教师为主角，以异地之风光，搬来故国，插入抗战情景，一半实系田先生己身之经历。及看到胡华生之头发早白，壮语解嘲，更令识田汉的人，发生夫子自道之感。与田汉不见将近五年，近来只见其出入沪阵火线，豪情一如旧日，实在可喜可庆。剧作者田汉，原成了功，而民教处小剧团的演员及辅导者的全体，尤其成功。

杀！前进！

杀！前进！

我们要把演剧与欣赏剧艺的精神，移到杀敌卫国的行动上去。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手 民 之 误

从前周作人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话："印刷出版物的错字太多，纸张太劣，是对于作者的侮辱。"原话或稍有出入，但大意是如此。这话系二十年前说的，在《自己的园地》一书中，大约还能看到。不想经过了二十年历史的现在，中国印刷品出版物的错字，还一样的多，甚至或比从前更不如的样子。每逢有这样的错字发现的时候，编辑责校对，校对推手民，也是必然的程序，不过有些手民，实际每有比作者识字识得更正确的。例如有些字，你写错了偏旁，或颠倒了上下，手民于排字时，每会替作者更正，这是手民之功，却不是手民之误了。所以归根结蒂，错字多时，责任总还在校对。

因校对错误而遗害最大的地方，是在外国人翻译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许多次的经验，看到外国人译我们的作品的时候，因原作校对错了一字，或落了一字两字之故，弄得全段文字，都变成离奇可笑。

校对是与文化有关的，中国印刷物长此错误下去，总不是好

现象。从外国的出版物来说，英国的比美国的好（校对者注意“英”、“美”两字，在许多刊物上，往往弄错），法国的比英国的好，德国的又比法国的好了。校对错误，虽系一件小事，但从这些小地方，也可以看到各国的国民性。

还有原稿的写法，与校对，也有相当的关系。我所见到的原稿，写得最整齐的，是已故蒋光赤（慈）的稿子，其次是鲁迅的，其次是张资平的。光赤的可以不必说，鲁迅与张资平的原稿，不管是改得如何多，但总读得很清楚。郭沫若的原稿，也还可以看得清，但有几个字体（草字）却很畸形。原稿之最看不清的，是田汉初期的作品，他的《咖啡店之一夜》，我为他校了三四次，后来错字还是很多；而田汉见了，还说我替他改坏了。我之写此短文，并非有意与校对者为难，不过求全责备，希望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能在小处更注一点意。大事不糊涂，原无伤于盛德，但并小事亦不糊涂，岂非更好了么？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

中国在无论那一方面，不必要的，架床迭屋的重复多余事，做得很多很多，但必要的事情，却总只见诸言论，而不见于实行。简单地说一句，是大家只会凑锦上添花的热闹，而不肯做雪中挖炭的苦行。行政组织也是如此，经营事业，也是如此。甚至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的现在，这一种架床迭屋的重复多余事，还在那里再三再四地赓做不厌。开会，组织同性质的团体，选举委员，发宣言，拍电报，定章程，出刊物之类的事情，依旧是一样的多。可是自己拿出钱来去买救国公债，自己跑上征兵处去应募入伍的两件事情，最不厌架床迭屋，重复地去做的这两件事情，却不见得人人都在那里抢着做，或模仿着做。

在这一个时候，除自己拿出钱去买救国公债，及自己跑上征兵处去应募两事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厌重复的，就是用了个人自己的力量，——金钱，时间，与精力——去慰劳前方的将校士卒，与已经退入病院的受伤的勇士这一个义举。自全面抗战以后，这一种工作，由各方面用各样的方式，做得原已经很多了，

但我们再重来一次，也未见得便是多余的模仿。

这一次文救协会发起书信慰劳前方将士的运动，看起来似乎也是重复的闲人事业，但我却认为和购买救国公债与去入伍一样地不妨重复的义举。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敌机的来袭

亢德兄：

文章写不出，先来写这一封通信，若第一期赶得上最好，赶不上，则第二期发表亦可。

我在福州，所以先从福州的事情谈起。自从去年七月，我国抗战以来，福州亦和别处一样，成日成夜，只在做抗敌救国的准备工作。要募公债时，我们就募公债，要征棉衣时，我们也征棉衣。其他如征兵，封锁江面，送出壮丁，去前线杀敌，组织战地服务团，去战线后方从事救护的工作；做反侵略运动，到各乡村去宣传抗敌救国的意义；节食救国，一日一分运动，收集旧铜烂铁，救国连索等等。凡可以尽力于国家，有助于抗战的事情，我们统统在做。但只有一件事情，福州在过去却没有做到，就是敌机的来袭，和来袭时奋勇的抗战。前者系属于敌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强迫他不得。因此倒很有些浅见的人，造成了许多类似汉奸的谣言，就是说，福州的特产是汉奸，敌人因欲保护汉奸，所以不来轰炸。这谣言当然是出于汉奸之口，想用以来分散我们一致对外的步骤的，离间分化，原是敌人善用的手段。后者系防御工作，

应该统属于中央的；敌机不来，我们也没有固定的防御飞机，所以奋勇在空中抗战的事情，到今朝为止，还是没有。

前天我大中华民国的飞机，飞去台北，大施轰炸。昨天早晨，刚见此消息于报端，大家正在猜想这次敌人的损失，和将显出的狼狈，不意谈话未完，敌人的大队飞机果然就来了。先来三只，绕市数周，在城东的机场，投了两三次弹。继复联合六只，复在机场，投下四十余弹。我方的损失，除在机场烂泥地上，有了五十余个土孔以外，另外只死了几个好奇正在机场近旁看飞机的乡民，一共死了八九人，伤了十一二。

这是福州受空袭的第一次，市民因为大众没有经验，不知敌机此次来炸的目的，所以民众中间，多增了两种活动。一是卷起铺盖的迁移，一是赶往机场的看热闹。

昨天过后，到了今朝，天气依旧是天青日白，云雾全无；而今天早晨，敌机又来袭了三次。一次是六架，二次也是六架，三次则机数不明。此番的敌机来袭，却并没有下弹，于是全城民众，又增加了些好玩的心思。

一个地方的空袭，本来事极平常，而且各地的报上，总也都已登载，我何以要特地写这一封通信呢？原因就在下列的几点：

一，从敌人的狼狈急图报复看来，前天台北的损失，一定出乎吾人意料之外地重大无疑。

二，从此也可以猜想到小岛倭君，如何地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惊恐，将来我机只须稍至东京、大坂、九州等处投放几弹，就可以使他们骇惧得屁滚尿流。

三，我们在海岸的防御工程，已经巩固了，此后将更进一步，来建设福州的防空工事。

这些是福州的事情，以下来谈谈我个人的行动。杭富失陷后，老母殉了国，兄弟妻子散而至于四方。这消息传到之后，不意此地有一家报纸，竟用大标题登载了出来。实际这事情是出在一个月半以前，而我的接到消息，却只在十日前头。同时这报纸的有一位记者，又以此而写成了我的罪状，仿佛是说殉国是不应该的样子。这是一笑。

其次，我将于数日后，去浙江火线上，一看情形，因老母的遗骸未收，看能不能去亲视含殓。但为了这几日敌机的不断来袭，恐又有人要造谣，来证说我自己的贪生怕死。因此之故，倒弄得我进退两难了。这是一哭。

从这一笑一哭之间，你总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抗战阵线的步骤来了罢！就是“精诚团结”这四个字的意义，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在借公济私，以公事来报复私仇，幸灾乐祸（并且这祸也并不是只限于我一个人的），借敌人来攻击同胞，最后胜利，恐怕要因此而迟缓几年，你说是也不是？

总之，中国这次军事上的失利，我以为并不在于物质，结果，还是在于精神。汉奸心理，包满了各个自以为在救国的人的体外，自然只有受敌人分化，利用，甚至于宰割了；这一种现象，我只盼能只限于我们的福州就好。

另外的下次再谈。此信到日，我将返浙江，以后当在浙江再写通信了。

弟郁达夫上　二，廿五。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大风》十日刊第二期

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

为慰劳前线将士并视察战区情形之故，十日前曾到过鲁南的火线之上。我们所见到的台儿庄，利国驿，及黄河南岸的阵地，都坚守稳固，敌人一时决不容易撼动。先从黄河南岸的阵线来说，敌人因欲拚死命打通津浦一线，所以黄河北岸的守兵，大部分已从山西河北河南境内抽调到鲁南去了；沿黄河一带，只有我们的游击队向北渡河活动的可能。实际上，在郑州，曾见到了许多渡河北击的壮士们，奏凯之后，携带回来的战利品，如炮弹，钢盔，日文的信件日记之类。在河北岸平汉沿线的游击战区以内，我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敌人的高大战马；现在因河水高涨，不易南渡之故，这些敌马暂时仍养在北岸的我军阵地之内。

据守黄河的将士，日夜只在战壕内严密监视着北岸，敌人一点儿也不敢露些踪影。因为我们南岸的守兵，见了敌人的踪影之后，就可以发炮告知北岸的我军，包围歼灭的缘故。

黄河南岸的景色，单调得非凡，春意虽则渐渐浓了，但堤上堤下，总仍是一片的黄色；树林青草的绿阴，终掩不住几百里路

的泥沙地壳；所以守河防的将士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在后方的执笔者，能多送些士兵的读物，及足以娱乐暇时的图画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资消遣。文人在战时所应做的工作，我想当以此事为最重要。或者我们大家来发动一种书的运动，将我们所读过的定期刊物，书报小说之类，统统捐助出来；送上各战区的后方办事处去，请他们转送前线，分给守土的将士们阅读。这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么？

台儿庄的大捷之后，敌人惊破了胆，不敢再冒昧地来作正面的攻击了；因而最近，敌人只在台儿庄的东北、临枣支线，郯城邳县一带迂回死攻，据说系延翼运动战。但是攻来攻去，敌人增援了数次，我们的阵地，却依旧是稳如铁垒。当然一村一庄的进退，是常有的事，但就是周围不过一二里方的一村一庄，敌人要想伸展一步，也必须付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代价。因此，津浦北段正面的韩庄利国驿一阵，倒现出了沉寂的状况。敌我隔运河而相对，两边相去，不过几十丈宽。敌人战坑里的人影，我们可以看得见，看见时就发一枪。有几处狭隘的地方，南面的话声，也都可以听得清楚，可是阵地里的谈话，是士兵们最忌的一种动作，因为继话声之后而来的总是枪声。

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儿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你不，你就瞧！兵士们的精诚奋勇！老百姓们的扶助协力！反过来，一面却又是敌人们的畏缩与不振！卑劣与残暴！

津浦线是稳定了，在这一月内，我们恐怕更要向南向北，发

展我奋勇杀敌的神威！

五四纪念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国 与 家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虽是我们中国人夸大口的老调子，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年头儿，因老家的沦陷，而至流离失所，或挺身作战的无名小卒，却也非常之多。

浙西的沦陷，是在去年十二月尽头，正当耶稣圣诞节前后的几天。老家本在富阳，是当富春江与之江交界的湾边；庐舍为墟，家财被劫，更因老母的不愿意远离乡土，致这一位七十余岁的白发老妪，也随庐舍而化成了灰烬。这些事，早在今年春季的各报消息上，频频登载过了，我在这里，自可以不必写，也不愿意又不忍想再写。当时我还在福建，等讣报传来，星夜驰归浙境，想去收拾遗骸，闭门读礼的当儿，已经到了今年三月的初头；那时候不但道路不便，并且连想渡过江去的船只，也沿江十里，绝对难找得到一篷一橹，忍气吞声，椎胸顿足，我也就只能冒受了一个百死不赎的不孝罪名，静静儿的在这里等我们义师的北定中原。

在浙东停留了一下，向各军政当局请示了几次，觉得渡江之梦，终难实现了，末后也只能带了妻儿、又流离到了武汉。然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东逃西避的流浪中间，不意小家庭内，又起了一层波浪。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

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了墓坟，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作辰阳，现在是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日人的炮火还在不断地轰飞，我们的抗战，也正在作更进一步的死拼。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

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上去尽我们的天职。现在却因为时机未至，而准备亦还没有充足，所以只能做几句仄仄平平的老调，聊以当过屠门的大嚼。知我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云尔。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十二期

回忆鲁迅

序言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

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智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那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惑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

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象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象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而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

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化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

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

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的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反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沈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

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象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的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 ）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诚告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在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 John Halifax 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

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 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酒。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

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他，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过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请教尊姓大名的缘故。象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的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顿行李，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那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村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村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抗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

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象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

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

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材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稿，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

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彩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象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帐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帐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而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

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的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

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象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

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那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并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那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

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的有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象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本文据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八月的上海《宇宙风乙刊》和同年六月至八月的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所载整理编入

岁朝新语

九月底边，从湘西出来，在粤汉浙赣两路上来回游弋的中间，忽而感到了一个信念，在当时觉得非常之新异；但是说将出来，恐怕大家都要嗤笑，因为这非但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新发见，这并且还是妇孺皆知的一句抗战老八股。这八股的起讲，就是："中国的土地，实在真大不过。"其次的承，转，合，当然也统是个老调子，就是："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当时日我正在武汉下游二百余华里的周围，作殊死苦战。日机日日在江西湖南境界放黄鼠狼的绝命臭弹。死伤人数，日人与我，是二与一的对比。日日死二三万，我则伤亡日自一万至一万五千不定。长沙，虽则日日被轰炸，可一到下午三时以后，市面就照常的兴旺，依旧的拥挤。走到南昌，则戏园还在开锣，摩登男女，还在百花洲、公园里嬉笑偕行，决不象是百公里外的修水以北，炮火连天，正在作你死我活的争夺战的样子。

至于车路上哩，当然有补充兵的列车与伤兵车的来回上落；但是沿岸的秩序，两旁的居民，车上的旅客等等，都和平时一

样，绝没有慌张绝望的神情。这些现象，是在说些什么话呢？不是在说：日我相持愈久，我愈对日人有自信，而相反的，侵略者则对我愈会感到焦燥困难么？并且在战线的前后左右，进出的次数愈频繁，感到的日并不足畏，我终有法能制胜的信念，自然也愈有确证。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去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上战线直后的各地一走就对。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得明白的。

所以我们的胜利，是决无问题的了；这反证，更可以在敌人的屡次提出求和条件，和再三再四的发表什么宣言上看得明白。唯其有了这一个信心，唯其有了这信念的确证，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为视察备战的情形，为加强抗战的力量，我跑到了东战场；更由东战场转到了国防第一线的福建的省会。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磨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福建的一隅，日人决不能轻易来进犯，这从我两个月的视察经验上讲来，是可以对大家保证的。

这一次路过厦门，船在死市外半里海中，停泊了一日之久。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一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奸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脸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寞的死市，我心里虽则也感到了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先知亚利米亚的哀歌，所吊的虽则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岂不是同郇市一样地，蒙了不洁了么！

第二天到了香港。香港是正在忙于过新年，一九三八年，只剩了七八日了，明年当是中国胜利获得的最可纪念的一年。我虽则不是预言家，但我也敢断定，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我们的抗战，以后只须支持七个月，就可以得到报酬了。这七个月的支持，只教有英美的金元，和苏联的机械热血，难道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么？

所可虑者，是日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的一般悲观主义者的得势。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在惊涛骇浪中写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百五十四期；同年一月十三日又载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改题为《必胜的信念》

槟城三宿记

快哉此游！槟榔屿实在是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县。（人家或称作花园，我却以为花县两字来得适当。盖四季的花木茏葱，而且依山带水，气候温和，住在槟城，“绝似河阳县里居”也。）

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氏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风尘仆仆，魂梦摇摇，忽而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象是在做梦。

是梦也吧，是现实也吧，总之，是“三宿槟城恋有余”也！

此番的下南洋，本来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两日过后便是新年的假日。却正逢星洲的兄弟报，槟城《星槟日报》，于元旦日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谓“值此佳期，何不北来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驰驱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

车抵北海，就看见了许多整齐高洁的洋楼，汇齿似的堤坝，和一湾碧海，几座青山。在车窗里看见的那些椰子园、树胶园、金马仑的高山，怡保附近的奇峰怪石，以及锡矿采掘场等印象，一忽儿又为这整洁、宽广、闲适的新印象掩没下去了，我们就在微风与夕照的交响乐中间，西渡到了槟城。

船到西码头就遇到了一次迎候者的袭击，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邓曾张三先生，此外还有A老兄、B大哥，真令人要下几点“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感泪。

初到的这一天晚上，上北海岸春波别业(Spring Tide Hotel)里去吃了一顿晚餐，又象是大罗天上的筵席。先不必提鱼翅海参等老饕的口头禅，你且听一听这洗岸的涛声，看一看这长途的列树，这银色的灯光，这长长的海岸堤路！

住宅区的房屋，是曲线与红白青黄等颜色交织而成的；灯光似水，列树如云，在长堤上走着，更时时有美人在梦里呼吸似的气嘘吹来，这不是微风，这简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来的香气。

第一晚，象这样的匆匆过了。第二天，就上了升旗山的绝顶。海拔高二千四五百英尺，缆车一路，分作两段，路上的岩石、清溪、花木、别墅，多得来记不胜记，尤其使这些海光山色，天日风云，生动灵奇，增加起异彩来的，是同游的我们这一群士女，因为地灵了，若人不杰，终于是画里的沧桑；总要“二难并，四美俱”后，才显得出马当的神赐，王勃的天才。

且让我来先抄一个同游的题名榜者。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夫妇、曾秘书夫妇、邓先生夫妇、林小姐、马利小姐、关夫子与区区。

一行十二人，占车两节半。到了山腰，已觉得空气寒冷，呼吸有点儿紧了起来，回头一看，更觉得是烟云缭绕，身体已化作魂灵，游弋在天半的空中。

屋瓦鳞鳞的，是乔其市的烟灶；白墙碧水，围绕着树木层层的，是两个蓄水池的区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从高处看下来，极乐寺的高塔，只象是一顶黄色的笠帽。

更上一层，便到了山顶；沿柏油马路弯弯曲曲的走去，路旁边摆在那里的，尽是一盆一盆的温带地的秋花，有西方莲（大丽亚），有四季春，有榆儿梅，有五月花（绣球花）。而最令人注意的，却是几盆颜色不同，种子各异的红黄白紫的陶家秋菊。

胡迈太太说："好久不看见菊花了，真令人高兴！"这句话实在有点儿诗意，我暗暗在心里记住了。

一霎时，高山上起了云雾，一块一块同飞絮似的东西，从我们的襟上头上，轻轻掠过；脚底下的市镇溪山，全掉落了在云海里了；我们中间，互相对视，也觉得隐隐现现，似在炉香缥渺的烟中，大家的童心发现了，一群大小，竟象是乐园中的童男童女，于是便卸去了尊严，回复了自然，同时高声叫着说：

"我们已经到了天上！"

在茶室里坐定，吃了些咖啡红茶，点心果饼之后，我一个人行出茶室来，又上山顶高处，独立在云雾中间，向北凝视了一回，正在登高望远，生起感伤病来的当儿，关先生走近我的身边来了；他拂了一拂云雾，微笑着说：

"这景象有点儿象庐山，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你的诗料，收集起来了没有？"

我虽也只回了他一笑，但心中落寞，却早想着了下面的两首

打油菜子：

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
高处旗升风日淡，南天冬尽见秋花。

这是用胡太太的那一句诗语的。

匡庐曾记昔年游，挂席名山孟氏舟，
谁分仓皇南渡日，一瓢犹得住瀛洲。

这是记关先生目前的这一句话的。

诗成之后，天也阴阴地晚了；赶下山来，还在暮天钟鼓声中，上极乐寺去求了两张签诗。其一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诗叫作"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团圆事事双，谁料半途分析去，空帏无语对银缸。"我问的是前程，而他说的却似是家室。详猜不出，于是乎再来一次。其二是刘先主如鱼得水的故事，诗叫作"草庐三顾恩难报，今日相逢喜十分，恰似旱天俄得雨，筹谋鼎足定乾坤。"（前者第十四签，后者第廿一签。）签也求了，春满园的饱饭也吃了，回来之后，身体疲倦得象棉花一样。夜半挑灯，起来记此一段游踪；明天再玩一天，再宿一宵，就须附车南下，去做剪刀浆糊，油墨朱笔的消费人。欢娱苦短，来日方长，"三宿槟城恋有余"——这一句自作的歪诗，我将在车厢里念着，报馆办事房里念着，甚至于每日清早的便所里念着，直到我末日的来时为止。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星槟日报》"地方新闻"版

覆车小记

槟城三宿之后，五日夜渡北海，刚巧是旧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凉风绝似水晶帘底吹来，挥手与送别诸君分袂的时候，心里只觉得快活，何曾有一点恻恻吞声之感？当然依旧是“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故态。

但是别离终竟是别离，或悲或喜的混合剧，当船离码头的一刹那，帘幕便揭开了；一位十五六岁的窈窕淑女，同一位很清秀的青年君子，欢天喜地上了船；船栏外来送的，多是些穿纱衫，围锦绣萨郎——马来装也，但不知是否这两字，亦不知是否如此的发音——套裙的女娇娘。开船的号令响了，机房里起了转动的声音，船上船下，一阵莺声燕语的唧唧喳喳，我原不晓得是在说些什么，推想起来，大约总是“前途珍重，后会有期”等套语吧？或则是“万里之行，从此始矣”也说不定，在我这老天涯客看来，自然只是极平常的一次离别；但反应到了这淑女的心头，波澜似乎是千重万重的起了，先是莺声发了颤，继是方诸泻了盆，再则终于忍耐不住，跑开了栏杆，到无人的一角，取出手帕来尽情啼

哭去了。这一幕，当然是离奇的悲喜剧。

还有回转舞台的第二幕，是表现在上下船的跳板旁边的；一群头上包着红白黑色的布，嘴周围长着黑黑丛丛的毛，脸上也有几位绣着皇天为加上圈儿的花的朋友，向一位身躯硕大的老长者，举起了手，齐声唱出了一曲也是听不明白的离别之歌；这或许是喀里达萨的《萨功塔拉》里的一小节，这也许是太戈尔的《迷鸟》里的一整首，总之是印度的一般人所熟诵的歌曲无疑。这一幕又似是纯粹的喜剧了。

旁观者的我们，自然要做一点剧评。同行的关先生指那一位淑女说："她既和丈夫在一道，当然是快活的旅行，为什么要这样啼啼哭哭呢？"

"大约是新婚后，来回门（回娘家）的罢！"我的解释。

"那一位印度老长者，颈项里套在那里的花圈是什么意思？"我问关先生。

"他大约是在警界服务的，一定是升了官去赴任的无疑。来送的那些，当然是他的亲戚故旧，或旧日的同僚。"是关先生的回答。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平稳地渡过了海峡，按号数走进了联邦铁路的卧车房；火车也准时间开，我们也很有规则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门紧闭，车里有点儿觉得闷热，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词佣君赠我的《椰阴散忆》来消夜。读到了榴莲的最后一张，正想重起来拿王绍清的《亚细亚的怒潮》的时候，倦意频催，张口连打了几个呵欠，是睡乡带信来了，迷迷糊糊地不知怎么一来，终便失去了知觉。

这一睡醒来，可真不是诸葛武侯的隆中大梦之相仿！火车跳

了三五下，玻璃窗变成了乐器；车箱里的马来小孩子，印度贵妇人，齐声哭了起来。我的身上，忽而滚来了许多行李和衣裳。一二分钟后，喀单当的一声大震。事情却定了局，车子已经横卧在轨道外的桥头草地里了。我们原是买了卧车票来的，而车子似乎也去买了一张，我们睡在它的怀里，它也循环相报地睡入了草地。以后便是旅客们的混乱。关先生赤了脚，拂了一件雨衣，七横八竖，先出去打开了车门。我则一点儿经验毫无，只在卧铺底下收拾衣箱，更换衣服；穿上衣服之后，还在打领带的结。关先生是有过经验的，仓皇在门口叫着说："这时候还带什么领带！快出来！快出来！"我却先把行李递了给他。行李取齐，一脚高来一脚低的爬出了车箱后，关先生才告诉我说："你真不晓事，万一电线走电，车箱里出了烟，我们就无生望了；火车出轨，最怕的是这一着！"

爬出车箱来一看，外面的情形，果然是一个大修罗场！五辆车子，东倒一辆，西睡一辆地横冲在轨道两旁的草地里；铁轨断了，飞了，腐朽的枕木，被截作了火柴干那么的细枝；碎石上，草地上，尽是些四散的行李与衣裳，和一群一群的人，还有几声叫痛的声音。天也有点白茫茫地曙了，拿出表来用香烟火一照，正是午前四点四十分钟的样子；以时间来计路程，则去丹绒马林只有一二十分钟，去吉隆坡只有两个钟头不足了；千里之驹，不能一蹶，这史替文生与华脱的创作品，到今天也曳了白。我们除了在荒地的碎石子上坐以待旦而外，另外也一点儿法子都没有。

痛定之后，坐在碎石上候救护车来的中间，我们所怨的，却是那些槟城的鲍叔们。无端送了我们许多食品用品，增加了许多件很重的行李，这时候抛弃了又不是，携带着更不能，进退维

谷，只落得一个“白眼看行李，高情怨友生”的局面。因为火车出轨之处，正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中间地带，四旁没有村落，没有人夫，连打一个长途电话的便利都得不到。并且我们又不会讲马来话，不识东西南北的方向，万一有老虎出来，或雷雨直下的时候，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长揖见阎君”而已。

在这情形下，直坐了四个多钟头，眼看得东方的全白，红日的出来，同车者的一群一群搬往火车龙头前面未损坏的轨道旁边。最后，我们也急起来了。用尽了阴（英）文阳（洋）文的力量，向几个马来路工交涉了许多次，想请他们发发慈悲，为我们搬一搬行李，但不知他们是真的不晓得呢，还是假的不知，连睬也不来睬一下，只如顽石铁头的样子，走过来，又走过去了。还是智多星的关老，猜透了这些人的心理，于一位年老的马来工人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先显示了他以一个两毫银币，然后指指行李，他伸出手来，接过银币，果然把行李肩上肩头，向前搬了过去。于是转悲为喜的我们，也便高声地议论了起来：“银币真能说话，马来话不晓得，倒也无妨！”说着、笑着、行着，走到了未损坏的路轨的边上，恰巧自丹绒马林来接的救护车也就到了。

上车后，越山入野，走了几站，于到万挠之先，我们又在车窗里发现了一辆房新民君自吉隆坡赶来救我们而寻我们不着的后追车。又到下一站的时候，我们便下了火车，与房君一道地坐汽车而回了吉隆坡。十二点十分，到吉隆坡后，我们又是天下太平的旅行人了，有郑振文博士旅店的款待，有陈济谋先生压惊洗饯的华筵。上车之前，并且还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在吉隆坡市内市外，公园、公共机关、马来庙、中华会馆等处飞视了一巡。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便是星加坡市上的小市民了。谢天谢地，这一

次的火车出轨，总算是很合着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代价而得到了最大的经验，更还要谢谢在槟城在吉隆坡的每一个朋友，因为不是他们的相招，不想去看他们，则这一便宜事情，也是得不着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

宇宙间最大的两个疑问，一是时间，一是空间，从争夺殖民地的热烈，战争的频发，及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认真的各点看来，似乎是空间的疑问，已经被人类解决了一半了；可是南极北极的探险队，还在继续地努力，地球与火星的交通，还没有办到，而太阳系的各行星中，究竟有没有一处，同地球一样的这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空间依旧是无限，而且是不可知的。使人最感到不可捉摸，而无论那一个在它面前，都不得不低头的，尤其是时间。有史以前，已经有了多少年月，到现在谁也不敢断言；在我们以后，更有多少时间的继续，也只有天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恐怕结果，连天也管不了这个。况且人的一代，无论那一个，究竟会到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死，更其是没有人能够预定，除了决心犯自杀罪者之外，倘若有一个假定能真的实现的话，我们就假定有一天，人类在地球上完全绝灭了；试想在这一瞬间，时间是不是仍旧会和人类毫无关系地继续下去的？——写到了这里，我就想起了俄国伊凡·蒲宁所做的那一篇《新金山的绅士》

——我们常常以“天长地久”这四个字来形容继续的长远；但是天地的久长，还是相对的，时间的久长，才是绝对的事实。

可是人类终竟是好胜的，亦是能自欺自慰的，对于这绝对不能征服的时间，也想出了一个法子来制服它，用以自相慰藉；这征服的方法，就是历数家羲和氏的日月岁时的制定。

割时间的一片，定以为年，分年成月，分月成日成时，这实在是古今来的一个最大的发明。

所以，《星洲日报》自创刊以来，到如今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这十年，比起时间这概念的悠久来，原只短短的一瞬间，但由不知晦朔的朝菌，与不知春秋的蟪蛄来说，真是一段很长很久的历程无疑。至少至少，《星洲日报》在这十年里，已经征服了时间这一个怪物，使过去的十年，不同于以前的十年一样地无声而无臭。仅在这一点上，也很值得我们的纪念。更何况，南洋是文化水准很低的殖民地，而新闻事业却是文化事业中最有力的开路队；我们先不要从它的销路与报质这一方面来讲，只从在这一个环境之下，在这一个社会之中，居然能巍然独立，持续到十年以上的岁月，试问这一件事件，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纪念的。

维持到十年之久的这《星洲日报》，以后当然更要想法子使它长成发育起来，担负起抗敌建国的重大责任；罗马古城，不是一日之功能建得成，既然有了这磐石般的基础之后，上面自然要再加上以更坚固的建筑。这近乎理想的大建筑物的完成，当然还有待于木工石工雕匠的共同的努力。区区下走，不过是新近来参加的一名卑而又小的雕刻小工而已。

廿八年一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友人们的消息

前几天在报上，看见的鲁迅未亡人许广平女士携小儿海婴到延安之记事，正在惊异之际，却接到许女士自上海来信，知伊仍住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海婴因天气寒冷之故，在患气喘病。许女士大有偕孤儿海婴，南迁赴一暖地暂住之意，但不知能否成行耳。

茅盾已赴迪化，报上早有记载，此次系由香港坐船至海防而转昆明。复由昆明直飞兰州，再转迪化的。担任的职务，是新疆大学的文学院长。其在香港主编之《文艺阵地》，现由适夷接编。（按：适夷于编文阵之外，还编画报一种，将于二月一日出第一期，适夷现新由上海返香港。）

成仿吾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已有三年半了，现在仍在那里。

郭沫若寓重庆陆家花园亦园一号，仍在主持政治部一厅宣传事务。三厅最近改组，前任第七处处长的田汉，已辞职留长沙，在任长沙善后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一次省府改组，薛伯陵去长沙后，田君谅亦将另任新职。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一二八的当时

一二八沪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那前后，刚为了已故诗人徐志摩的未亡人小曼的生活问题，日日在和徐新六，宋春舫，邵洵美诸先生商谈，小曼还住在福煦路的那一间后门临马路的住宅里。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小曼那里，坐到了十二点过才回我的静安寺路的寓所，同路者，还有邵洵美和李青崖的两位先生。

在前几天，上一位十九路军的干部家里去吃饭，我们还谈起这一个问题，敌人的无理要求的问题；知道是中央一定只有屈服的一条路，大家还垂头丧气，狂饮了一回闷酒而散场。

所以以各方面的情形来推测，总以为这一次，又该是十九路军倒楣，除退出上海外，别无法子的。中央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中央，而敌人又是如此贪酷凶暴的一个敌人。

所以在一二八当天的晚上，一直到夜半，我们这些沪西的住民，还没有晓得是在天通庵近边，已发生了战事。

二十九的早晨，情形就大不同了，上海三百万的住民，都被

拂晓的飞机大炮声惊醒，个个磨拳擦掌，想和敌人拼命。当时谣言蜂起，有说是租界当局，在偏袒敌人的；有说是中央投降日本，派兵来夹击十九路军的，所以租界上的住民，尤其是一般智识阶级，都是悲愤填膺，想和政府，和租界当局，也来一个严厉的武装谈判。

当时的大概情形，在一九三二年，记得曾经写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影像虽则还历历在目前，但与这一次的徐州战事，九江战事，武汉外围的战事来一比，却觉当时的沪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前奏。

一阵战乱初期的兴奋状态过去之后，是清醒的工作时期了；第一，我就开始去探听寄寓在北四川路的许多友人的下落。因为在这中间，有鲁迅的二弟建人，被敌人打伤的谣言，所以开始就去找寻鲁迅。

探问了三天，终于在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楼上，找着了鲁迅全家；我们以后，就打算做一点实际可以帮助这次抗战的工作。

征求物品、金钱，输送医药材料、军火、钢盔、手榴弹，以及救护伤兵难民等等，已经有人在分头去做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大力，所以先只写了些文字，在城内的报上；后又由全体的文化工作者联名发了许多向世界各国文化团体及作家，邀请共同打倒暴敌的宣言和书简。当时巴比塞还没有过世。罗曼罗兰，纪德，以及俄国的作者协会，都有了回电，寄来了主持公道正义的文章，于是出一小型定期刊物的计划，也就草草的定下。这时候在上海的中共执委，负宣传之职的人，有两个。一是余泽鸿，一是广东梅县的青年，由他们那里，更传来了许多东方大学的同志的消息，以及他们的论文，决议案等，所以，出刊物的兴致，更加

浓厚了；印刷，发行，以及征稿等事，是由姚蓬子在那里跑的。

我的寓居，也成了一个变相的难民收容所；在四川路寄寓的许多没有钱的文化人，都上我这里来做食客了。这时候，田汉住在打浦桥，丁玲住在法界尚贤堂后的一条横街上，我们日日见面的，就是这几个人。

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团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候也会放声大哭。每天总一早就起床了，晚上要闹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上床。有时候也有坐到天亮的日子。象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了停战约定签字的时候为止，接着，又是高丽志士击毙敌酋白川的一场风潮。

因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那一个人，非要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试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是敌人的惯技。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来提防。小儿病的发作，无关大计的局部小问题小意见的磨擦，以及为个人的名利打算的攻击与拥护等，都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引擎。我们先要把目光放远大来，充实我们的实力，然后再有计划地来试行反攻。近代战争是多方面的。兵火战之外，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也同样的重要。凡此种种使我们在平时原已经看到的弱点，经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证实，尤其觉得是铁样的事实了。而最可痛的，是同胞中间的那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的不容易拔除；只

想利用，或牺牲了他人来建筑自己的名誉财产的这一个倾向，在一二八当时也很浓厚，其后一直仍旧苟延下来，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斩草除根地去尽。

一二八的旧痛，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七年了；在这七年之内，我们虽则还没有得到能一口气吐尽郁愤的机会，但目下则倭寇死伤已经到了百万左右，倭国民穷财尽，崩溃就在目前，我们只教能坚持到底，再苦斗一年半载，甲午以来的耻辱，就可以一举雪尽。要紧的，不在开始，赛跑的决定是在终点，我们唯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心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

峇华机工回国服务团四十八人，于二月十六日到星洲，由廖团长率领，已于今日附轮回国，这真是要使我们感激涕零的一件壮举。这四十八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的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

四十八位义士，年富力强，热情潮涌，北上疆场，当然是已经立下了牺牲到底的志愿；唯或因气候不同，风俗习惯互异，或因言语一时不通，致与同上前线奋斗的其他同胞，不能互传意志，象这些地方，都希望能预先看清，勿至因一时的懊恼，而灰其心。

长期抗战，以后必须继续下去，非达到侵略者完全退出我们的国土，退出我们的兄弟之邦，高丽半岛等地，决不罢休，象这次回国服务的专门人才，以后我们更希望大量地送出。故国在盼望她海外的儿女回来服务，犹大旱之望云霓。尤其是航空的将

士，使用机械化兵器的部队，以及其他的机器技术人员。

四十八位义士，从此踏上回故国的船了。前途珍重，我们当于可能的最短时期内，来预备欢迎诸君奏凯回来的盛典！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

（一）

达夫先生：

今天在《自由谈》拜读了你的通信，高兴得很，曾经好几次想托朋友写信给你，现在决定自己动手来写了。

在好几年以前，曾经在一家电影公司有过认识先生的幸运（先生当然未必记得了），至今也还记着先生的丰采。现在想有求于你的，是关于更换文稿的事。

从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我即在此间编着《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先生说想替"孤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我想，我也许可以跟先生做个跑街的。因为这小刊物上也有着许多作者在帮忙，并且还有不少健笔的新的作家，只是不知道先生是否不耻下问而已。

平万的确在上海，至今留着的，还有西谛，剑三，望道，刘西渭，屈轶，阿英，唐弢，周黎庵等诸先生。陶亢德新近来沪，将办《宇宙风乙刊》，良友复业了，编辑方面也还由赵家璧主持。

朱雯罗洪夫妇，来了将近两月，大约预备即留在上海。以上诸位，如果先生有信，这里都可以转交。——别的作家也可以设法转递的。

至于我们这里，当然渴望着先生的扶植，希望能得大作以外，再介绍一些南洋的青年作家的作品。

渴待赐复

专此　即候

著安

后学柯灵谨上

（二）

柯灵先生：

来函拜读了，看邮戳是二月十五号发的信，到星洲只有九天，也不能说是很慢。上海孤岛的一般状况，我们因为在此地看到沪报，所以约略也知道一点。对于文化人的残留在上海者的那一种苦斗的精神，还有第三国的文化友人们的那一种援助的情形，我们都感觉到万分的欣慰。中国文化遭受了这一次野蛮人袭来的大劫，一时虽则会有重大的损失。——如文献的被劫夺偷盗，文化机关的被破坏等等——但根本上恐怕只有起加强创造文化者的奋起的决心，与肃清文化界中不纯分子的两种作用。因祸得福的事情，世上原也很多，我们的这一次抗战，恐怕就可以造成一个意外的实例。

我自抗战事起后，就到了武汉，以后便一直的向各战场上跑。直至中央决计放弃武汉之后，始和政治部的诸同事分手，他们由桂林而去了重庆，我则由长沙，经江西，而到了福建。从闽

西北又跑到闽南，走了一圈，住了两月，就上这里来了；在此地所负的是《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责任。此外，我更打算于三月中出一文艺半月刊，内容形式，大抵同从前的《创造周报》差不多，每期约可容两万字以上的样子。

这半月刊的目的，完全如我在致戴平万君那一张短信上之所说，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

当然，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点，是分散在西南，西北的各地了；譬如重庆，昆明，成都，延安，兰州，迪化，贵阳，西康等地，都有大批的文化工作者，及机关团体，在那里辟荒开路，预备将在十九个月中被外来刽子手所毁灭的诸种文化种子和果实，重新栽培发扬起来。但一则限于交通，再则限于物质的缺憾，一时终不能如我们所预计那么的容易。只单就印刷用的油墨纸张来说，内地的各报馆，各杂志社，就难免没有恐慌。所以，我们在海外，在孤岛，以及在敌人的炮火所不及的地方逗留着的文化人，就应该趁环境的便利，来加强补足他们所想做而未曾实现的种种工作，这又是我预备出一文艺半月刊的一个主旨。

但是，在海外的写作者，数目不多，而所写的内容，多少也有些“差不多”的倾向；为掉换读者的见闻和趣味起见，我在计划出这半月刊之先，就发了许多向国内各地征求稿件的信。如重庆，就托政治部的诸同事，延安，托了成仿吾及丁玲，迪化托了新疆学院的茅盾，香港托了戴望舒和适夷两位。但只有上海，我想不出所托的人，不过偶尔在报上看见了你们新年同乐会的一段记

事，其中有戴平万君，起来报告关于上海一年来文艺界近况的说话，所以就写了那一封信，托《申报·自由谈》发表，请戴君为代征上海方面的稿件，想不到马上就有了你这一次的反响，当然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与光荣。我们以后，当紧紧地携起手来，来从事于海内外的文化沟通这一个工作，以后我自己的稿子，当然不必说，若有可以推荐的南洋方面的稿子，自当按期地寄上。在上海方面，你信上所说的诸位先生处，也请你见到的时候，为我代达这一个意思。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与悲鸿的再遇

十几年前，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冬后罢，我正住在上海。那时候，党禁很严，我也受了嫌疑，除在上海的各新闻杂志上，写些牢骚文字外，一步也不敢向中国内地去走。

有一天冬天的午后，田汉忽而到我的寓居里来了，坐了一会，就同他一道出去，走上了法界霞飞路的一家老去的咖啡馆内。坐坐谈谈，天色已经向晚，田汉就约我上他家去吃晚饭。当时他住在法界一条新辟的大路旁边，租的是一所三楼三底的大厦。同时，他还在附近的一所艺术大学里当校长。

到了他的家里，一进门，他就给我介绍了刚自法国回国来不久，这一天也仍在孜孜作画的徐悲鸿先生，原来徐先生是和他同住的。看了壁上的几张已经画好，及画架上的一张未画好的画后，我马上就晓得悲鸿先生是真正在巴黎用过苦功，具有实在根底的一位画家。

我对于西洋画，本来也是门外汉，国际的大作，绝没有观摩的机会，至于自家来买来藏呢，更加谈不上了。一知半解的一点

对于洋画的知识，大半还是初学英文，读拉斯金的那几部巨著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些渣滓。只记得当时读到他《赞美》(Turner)的时候，也曾经滴下过同情的感泪。但当我那时候见到了悲鸿先生的几张画后，我就感到了他的笔触的沉着，色调的谐和，与夫轮廓的匀称，是我们的同时代的有许多画家所不及的。这时候，上海原也有许多以西洋画而成名的画家在那里。

其后，人事匆匆，我也因避嫌疑而东逃西躲，一直到了这一次抗战事起，而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政治部里，又与十余年前的许多老友遇见了，有许多是剧人，有许多是画家。从叶浅予，倪贻德的几位先生的口里，我才听到了悲鸿先生的也将由广西而来武汉的消息。

但是到武汉不久，就有了专往各区战线视察之命，我在武汉住下的日子，名义上虽则有九个月，但实际算起来，恐怕只有三四十天的样子，所以在去年，本是可以与悲鸿先生见一次面的，但结果，却终失之交臂，直到今年到了海外，才有了这重叙十年多久别的机会。

悲鸿先生，在这十多年中间的行动与成绩，已在略历里简单叙述过了；我只想说一说他这一回的来星洲，是系去印度应诗人泰戈儿之招的路过。老诗人泰戈儿的如何同情于我们中国的这一次抗战，就在他答日本一军阀走狗诗人的野口米次郎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招悲鸿先生的去印度开展览会，亦是他的这一点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义愤心的证明。

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

就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很有效用地，用上这些地方去。

十年不见，悲鸿先生的丰采，还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颜面上多了几条线纹；但精神焕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气概，还依旧和往年一样。

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大画师共垂宇宙，他的成绩也最具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必要的奖誉和夸张，我在这里想一概地略去；只提一提，他的国画，是如何地生动与逼真，画后的思想，又如何地深沉而有力，我想也就够了。

他的中西画的作品，将于本月内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展览，象《田横五百士图》，象《此去》，象《徯我后》等，都是气魄雄伟，没有人看了不会赞赏的逸品。我们于在这里介绍之余，更希望有巨眼的识者，于参观展览会后，再赐以鸿文，指出悲鸿先生的画品的伟大。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

对于回国服务的机工同志，我们已经屡次的表示过我们的钦敬，现在又有一批，要踏上回国的征途了，在这里除表示我们热烈的敬意外，更有二三句忠告，请热心爱国的诸位机工同志铭刻在心里。

第一、因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和气候的互异，回国去的诸君，应该时时刻刻放大襟怀，留心健康，我们已在前次说过了。

第二、诸君生性纯洁，自小所处的，又是南洋各地的单纯环境，一到中国，必有许多看不惯，不服气的复杂事情发生。老实说，我们中央，虽在拼命的肃清贪污，整饬官常；然而实际上，这样复杂的一个国家，历史很旧，民性很顽，一时又那里能够自上及下，一气肃清？所以诸君若到了中国，见到了这些不满意的现实政治之后，千万不要感到灰心。我们相信，人性总是向善的，败类终必归于淘汰，在现在的这一个混乱局势里，虽则有些小小的败类出现，但到了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后，这一批蠹贼，终会得被一鼓而荡尽，同敌国的万恶军阀一样。

第三、诸君虽则不一定个个是上最前线去的，但回国服务，也不一定是远在后方，所以，若有被派至火线上去的诸位同志，应该要镇定第一。这是到过火线的人，谁也会得到的经验，即初次听到排炮或炸弹的声音时，不免要惊惶，于是就不免有种种失宜的举止。须知在火线上的炮弹，也不一定是同雨点一样地密集，而在最前线的人士的死亡，也并不一定同我们想象那么的容易。飞机的炸弹，命中率更加不多，我们只教态度镇定，按法躲避，则出入前线，是危险性绝少绝少的。其次，在火线上进出几次之后，自然胆子也就练大了。可是在这时候，所最宜谨慎防戒的，是轻率与疏忽。我曾亲眼看见，南昌南站附近，敌机来炸的时候，因为一个士兵的轻率不躲避，而朝天发了一枪，致飞过的敌机全队，又飞回来丢下了许多重弹，终使一连士兵，损失了大半。所以，初上战场时，我们要用镇定来抑制慌张与惊恐；既熟练了火线进出之后，尤应该用镇定来防戒疏忽与轻率，切不可因夸示大胆而累及旁人。

凡此数点，是我对诸君的忠告；将来抗战成功之后，我们打算再来与诸君一杯痛饮，重述黄龙直捣时的景象。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杂 谈 近 事

（一）讨 论 问 题

这一次金鉴先生和张天白先生的讨论，终于因牵涉人事，触发感情，而致浪费了许多笔墨和精神。少年豪气未除，好胜心强，这当然是免不了的情形；我把这些，并不在当作恶德看，倒反而以为是年青血气方刚时的活泼的表现。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认清，讨论问题，并不是在决胜负。对于一个真理，或近似真理的探讨，并没有胜负或个人的成功失败之可言。一个问题，一个真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看错了的，自然因被人证明之后而会相信，看得对的人，对真理自然有绝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自己，却并不在希望得着荣誉。已故告尔斯华西，将诺贝尔奖金捐给了笔会，萧伯纳以人们赠以作品的优赏而发脾气，虽是英国人的气质使然，但也是对于真理的阐明，不私据为己功的一个好榜样。

所以，这一次对于金鉴先生和张天白先生的讨论，我也只想

劝以这几句话。现在还有第三者的两篇文字在我这里，打算于下一回的文艺栏里登载完后，敬劝两位不要因讨论而涉及友谊的乖离。

（二）捐助文协的事情

二十日在本栏发表的姚蓬子君的一篇通信，大约读者诸君，总也已经看到。老舍与蓬子他们的奋斗精神，真不得不使我们佩服，而他们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在于经济的不充裕。文协所能做的事情，自然不外乎笔墨的宣传，但宣传的推行，总须有待于印刷。而重庆的报纸，要四十元国币一令，且还常常感到纸荒，印刷工具，又不十分完备，我相信，卷筒机是一定很少，只脚踏架，手摇机，或用马达的平版机是最普遍。在这一个状态下，想发动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当然是很困难的。他们在重庆，既然是在那样的苦战恶斗，我想，我们在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至少也应该助以一臂推动之力。

要想在南洋来组织文协分会，一时恐怕很难，但竭尽我们棉力的自由捐助，我想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现在想请读者诸君，大家来想出几种有效的方法，发动一下募捐的事情。

款不在乎巨细，我们只教能尽我们的力，对我们的良心对得起，就可以了。假使马来亚有六百个从事文艺，热爱祖国的人，能够一人每月负担叻币五角的捐钱，那岂不是文协就有每月千元国币的收入了么？

有了一千元的国币一月，则他们又可以多印几千份书报杂志，送上前线去给苦战的兵士们以智识上的慰安了。这事情，我

想只教我们有心，有好一点的组织系统，做起来，一定是很容易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自从我在《晨星》栏里提出以后，果然响应的人，日渐增多，而所提的办法，也不在少数，但觉得有许多计划，事实上是不能做到，而有许多办法，现在一时又很难实现的。

第一，譬如组织文协分会的事情，我开始就觉得不可能，因为从环境的关系，以及历来马华文坛的历史关系上看，都觉得不能顺调进行的。所以，有事不如无事，这事情暂时还是不提的好。

第二，开座谈会，召集会议，讨论办法，原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开几次座谈会的结果，恐怕事情不一定就马上会发生实效。况且我个人在星洲绝少交际，不悉情形。召集会议，更加不易。若由住此稍久的人，如谛克先生等来发起召集讨论，或决定办法，确实去做，我却很愿意以一从事文艺运动的分子来参加，来负责。

我做事情，总只想从实在有效的方面做起，开始不妨小小的来做。以后再逐渐逐渐扩大，推行开去。所以，在这里，在我的能力

范围以内，所做得到的第一步，我只能提出这样一个提议。《晨星》三月份的稿费，将次结出了，凡曾在一月份的《晨星》上，发表过稿子的诸位同志，愿意将稿费的全部或一部份捐助文协者，请于今日起，即赐以一张信片，陈述志愿限度，当可由我来代向会计处取齐汇出。姓氏款数，待结清后，再行登入此栏公布。

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直接来信，说以后每月愿担任月捐五角，将寄来由我汇齐代寄。此事当然是最合理想的自由捐助方法。但一则因为小额款子，汇来不易，再则文协于三月廿七日改选以后，会务进行及负责人等的指名，现在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我更想附一个折衷的办法在这里。热心捐助的同志，请按两月一寄，寄来后，可由我代转交。各地的同志，若能自组小组，负责集捐汇送，则更简捷，凡个人或集团，捐集达叻币三十元以上者，不妨直接寄至"重庆临江门三十三号文协办事处交姚蓬子或舒舍予收。"

重庆现在正在疏散人口，将来文协会址若有迁徙，或其他关于文协有重要决议案时，当再在《晨星》栏内告知一切。

此后本栏的投稿诸君，若愿以稿费之一部或全部捐助文协者，请在稿尾附带声明。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在警报声里

从台儿庄回来的第三天，我们在徐州的花园饭店前面的一家叫作致美楼的饭馆子楼上吃午饭。

淮北的春夏之交，自然日日是朗晴的天气，天上蓝得连一点儿云翳也没有。敌机日日来炸，十字路口的那一个警报钟楼，忙的象似圣诞节前夜的教堂里的悬钟。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来一阵人跑车滚的声音，和店铺子上排门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推进机的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房屋地壳震动一下，嗡嗡嗡的机声再响一下，或则再轰隆隆地炸弹爆裂几下，一次的轰炸也就完了。静候上五分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总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所以，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声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

大家就只能停止不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在孙仿鲁连仲总指挥麾下的池师长峰城，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大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沙哑的，原因是从前在新疆边界打仗的时候，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

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祥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的他的态度，却很奇异地使我想起了扮演张飞的北平那位名伶郝寿臣。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长官指挥的坚决，军民合作的不懈，就是这一次打胜仗的最大凭藉。

台儿庄，本来是只有二三百人家的一个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南岸凭一条运河，东西北三面，是有矮矮的土城筑在那里的。火车站在庄的西面，路基离平地高约丈余，到了庄的北面，铁路支线也已到尽头了。村庄的土堡，是筑在铁路的东面的。

三四月的北方乡村，四面都是苍黄的小麦田，在麦浪头上，各处的小村子，或拥着一簇树林，或显着几垛黄里带白的墙头，只教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用不着望远镜而都了了可见。台儿庄的东北两方面及西北方的几个村子，全已在前日被敌人子重炮火之下占据了去。那一天，台儿庄亦被占据了一半的晚上（四月二日），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牺牲得太厉害，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说与其全部将血肉牺牲，还不如一时暂退，再图反攻的好。但池师长是

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的，总指挥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池师长当然也只能以这最后命令，同样地传给那几位团长。

团长回去了，重新配备了些补充的士兵和武器。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问军中有没有敢死的义勇兵士，能以手榴弹去向西绕道，而一冲敌人的右翼后方。

言下应募的志愿者，有四十七位之多。四十七位义士，于装置好手榴弹，轻机枪，迫击炮，大刀，手枪，换上草鞋轻装，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

她的衣服是被河水浸透了，手上脸上，只在蒸发出因天寒水湿之故的热气。脸上一层象被涂了油似的汗水，汗水下分明现出了因兴奋而涨得红紫的血潮。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她在黑暗里一步一跌被带到了有掩蔽物围着的师部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

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而我军的大炮，还在向早晨的敌人集中地点轰击，距离泰山行宫，约有大半里路的样子，炮的射程应该改近一点，就可以把敌人的弹药及集中部队打得他片甲不留。至于她自己呢？这几天日日的受了敌人的蹂躏，弄得两条腿都不便行走了，她自己想迟早总不免一死的，所以今晚才下了决心，偷渡过了运河，来报告一下敌人的虚实。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上了后方去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不出十几发的试射，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老圣女祥，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

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在飞机警报戒除的声里，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

我于喝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的想知道知道他们几位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镇定地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于向西北复转向南，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因为只注意着正面炮火的轰炸，所以，当我们四十七位义士接近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却是面向着东南的居多。等到一大半被解决以后，向前逃的有两个敌哨兵开放信号枪的时候，我们的熟悉地理的义士们已经分散成了两部。一部分赶向了南，接近了台儿庄西北面的土堡，一部分在向东向北的追赶，开放轻机枪和迫击炮；敌人们以为有大队的士兵，从西北抄到他们的右翼后面来了，一阵混乱，西北角竟起了绝大的动摇。同时在正面跟踪了我们大炮弹之后，补充来的生力军也已经冲到了台儿庄前运河的对面。

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我军就在第二天早晨冲到了东岳行宫。

掩护敌人退却的残留部队，和我军对峙到了日暮，才一一就了擒和正了法。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

他们问起了台儿庄的有没有被完全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没有经验的一位年轻的服务士兵，将实情一一

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先发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而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着了急，自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但是太迟了，伤口各出了多量的血，他们俩都已经昏睡了过去。

其中的一位，在列车就殉了义；还有一位，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于清醒转来的时候，只流了几点泪说："请你们快点把我杀死，我们出发的时候，就大家约好的是决定大家不再回来的。"他在延挨了三日痛楚之后，也就和其他的四十六位义士一道升天去了。

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起来了；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也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我们一定要为义士们复仇！"

"复仇！"

"复仇！"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二期

伦敦《默叩利》志的停刊

由约翰·司卡侯爵士于一九一九年所创刊的英国文艺界的权威月刊伦敦《默叩利》志，同爱里奥脱的《规范季刊》一样，自五月份起，将并入《现代人生与文艺》去合刊，归劳勃脱海林去编辑了。我们对这有悠久历史的文艺刊物，在市场上的消灭，原也同该志现在的编者司考脱詹母斯一样，有万分的惋惜。

这杂志曾经在英国造成了许多诗人和小说家，也给与了英国的文学青年以莫大的帮助和指导。它的立论的不偏不党，光明正大，介绍书籍，批评作品的富有意义，是为全世界一般爱好文艺的人所公认的。我自已从这杂志的创刊期起，一直到现在为止，其间因不得已的事故而买不到时之外，却是每一期都是从头至尾，细心阅读的一个。

这杂志经营者毛文出版部的出让此志给勃鎏庭公司（《现代人生与文艺》志的出版者），大约总也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默叩利》志，从前每册定价一先令，从一九三八年起，才增加到了二先令。据编者司考脱詹母斯之所说，则增加了定价之后，销路

与经济上的维持，也还可以过得去。

但世界的变动是太大了，纯文艺的刊物，终于是不能适应时代，适应大众了。这世界是兵荒马乱，急于备战的世界，大众已没有余裕来享乐纯文艺了。三个月前，我们刚为《规范季刊》的停刊而作过悼词，现在接着又是在三月之前，同样地为《规范季刊》的停刊而致惋惜的伦敦《默叩利》志寿终的时候了。

从这两个纯文艺权威杂志的停刊中，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有两个：其一，是在政治飞跃的时代（大战或大变动的时代），太高的纯文艺是会赶不上时代的；其二，是以后的文艺，与政治以及大众，更须发生密切的关系才行。

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这一个倾向，从我在前几天介绍过的许多诗人小说家，都一变而去作新闻报道的记者去了的一点上来看，也可以明白。

因伦敦《默叩利》志的停刊，我们希望此志的后身的伦敦《现代人生与文艺》志，能作一次适合时代的大飞跃。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空袭闲谈

一般安居乐业的和平的国民，所最怕的，当然是生命的骤然停止。在太平之世，平常一个人的最大伤感，就在生离死别的两件事上。所以，没有经过战争，或自己的故乡，没有做过战场的人，提起空袭的两字，自然会谈虎而色变；因为空袭，就是等于被袭的地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赌博；而在这赌博里，又是万无赢望的一个包输的局面。

英国人民的反对战争，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霍背林机伦敦夜袭的恐怖心理还没有除去，英伦三岛，当飞机大炮等近代科学战具完成之后，还没有做过战场。

并且，恐怖的心理，又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凡对一件事情的遭遇，怀抱恐怖的人，往往在这一件事情并未遭遇之前，就可以因恐怖而致死。浙江在这一次战争的开始时期，绍兴地方，就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五十几岁的老先生，因听到了空袭预报而死去；但实际上敌机却并没有飞到绍兴的上空，只在炸萧山（离绍兴有二百多里）的地面。卢骚在他的忏悔续录，那一部《孤独者的

漫步》里，曾有一段写过他自己的被追狂的恐怖心理，的确是那一种样子。

对空袭的恐怖，是谁人也免不了的；尤其当空袭预报发后，敌机将至而未到，或远远听空中推进机的响声的几分或几十分钟中间，这时候的紧张逼迫的那一种恐怖——就是死的恐怖，实在可以令多血的人而发狂，少血的人而毙命。但是到了飞机一到头上，或联珠似的炸弹声一爆发之后，便什么也不怕了。恐怖之心，会一变而成敌忾之心；大家想一下子就制止这一个恶魔的死命，大家想为惨死者雪耻复仇，是一定的过程。

至于到了日日来袭，夜夜来袭之后呢，大家的神经也会变得麻木起来，对空袭的恐怖心，只剩一层复仇报国的心理，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大约在沦陷之前的广州，或到战区前线去走过住过的人，都有这一个经验，胆量是越练越壮，敌忾心是越炸越激的。

所以，凭空看看新闻的报道，或看看被炸地面的照片，及被炸死者的惨酷情形，只会得加强我们的恐怖和仇恨的心理，可是到了受过几次空袭以后，却心理自然会得变过。象未放弃前的武汉，现在的潮汕重庆，何以当局日日在下疏散的命令，而居民会不愿意散去呢？原因就因为习惯了空袭，对这一种威胁是不生反应了。

空袭时的炸弹，也有会炸裂的，也有不会炸裂的，大约燃烧弹的炸裂，比平常的爆炸弹来得准确，因为前者的钢皮薄，药性足。炸弹的铁片，若打中头部及胸部的时候，自然危险性大。所以当空袭来时，最好是到旷地有树木茂草之处去伏下，头不可着地，身体全部，不可高出在地上二尺的样子。象这样，只教炸弹不准落在你的背上，就决无被炸之虞，最多是身上极了一身泥

土，或震动得厉害，身体跳一下而已。

在前线，我曾亲见过一个周围有四五十丈宽的树林；在这树林的中间，落了一个大约五百磅内外的炸弹，炸弹的土穴，有一丈来深，直径有两丈来长，在这洞穴四周的树木，二三十丈周围，都被弹片切断了；但树干的根，离地约有二三尺长的根干，都还留在那里不动。到我们去看那一个炸区（是在安徽的宁国）的时候，已经离被炸时有两个多月的样子，老树残干上，又在发长新芽，有树叶了。

国内各地，从前造防空壕时，多不得法。大抵掘一个很大的地洞，通几条路，上面用木板及木头支持住，当作屋盖，盖上再加以泥土，青草，外面看来，象一个土阜的样子。

象这一种不坚固的防空壕，只教在一千米远之内，有一个重炸弹下来，就马上会得震坍。结果，在防空壕内避难的人，就全部会被活埋。这惨事，我在徐州也看见过，在武昌的粤汉车站附近，也看见过。所以，空袭来时，最不好的是许多人的集中在一处。多人数聚集在一道躲避的时候，非但敌人炸弹会找到它的好目标，就是低飞的时候，用机关枪扫射一下，生命也就会伤失掉不少。

若要挖掘防空壕的话，只教在空地里，挖一条二尺宽三尺深的土壕就够了；顶好是一条锯齿形的长壕。壕上面盖点薄板也可以，若盖钢板不宜太厚，实际上，就是不盖都可以。

至于空袭来时，静居室内，当然也可以，但须顾虑到房屋若被震坍，已身有没有不被炸毙而被压毙的危险。实际上，居民密集之处，被炸毙的人数，恐怕每较被压毙的为少；这一层顾虑得到，则静心守住在如亚搭屋之类的家里，也毫无问题。

还有，假若是有山坡的地方，则最安全的避空袭处，就是山的斜坡上面，不过要有一点遮蔽物，如草木树类等，才行；否则就有被机枪扫射的危险。

总之，象这些，还多是消极的防空，对于制空权的控制，并不发生多大的问题。最要紧的，自然在积极的防空诸设施上。

第一，就是在防袭方面的战斗机的数目多而且敏，一有警报就老远的出去迎战，勿使敌机有接近或窜入所防区域的机会。

第二，高射炮和探照灯的多而且准，使敌机不敢低飞到三千尺以下。

第三，海上或四周防空哨的机警迅速，一有敌机远来，就四面发连贯的通知。

这几件积极防空的工作，若做得好好，则敌机的踪影，决不会在防空区域里出现，是自然趋势。况且，空袭轰炸，在战争中不过是一种助战的策略，光是带破坏性的轰炸，象敌人的炸重庆、潮汕等地，在战事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说到炸弹的成本，连飞机的价钱及养成一航空人才的费用等合算起来，起码也要五十元钱一磅的样子，所以，敌人用一五百磅的炸弹时，成本也要两万五千元。他以这一炸弹，去炸一不设防城市，只丧死些老弱妇孺，结果是不够本钱的。

所以，对于防止空袭，我只想要大家注意在积极方面，至于消极方面呢，当然是有胜于无，可是实际上，却是收效不大的工作。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谈　轰　炸

飞机的轰炸，要与海陆空配合起来助战的时候，才能发生意义与价值，我已在《晨星》上说过了：象最近敌机的滥炸福州，潮汕，重庆，龙岩等处，是在作战上，一点儿意思和价值也没有的。

并且，我们在抗战的后方住久了的人，从敌人的泄愤滥上来下判断，随时都可以看出：敌人在战线上的损失伤亡太重大的时候，往往接着就会有这一种滥炸的事情出来，以作报复。所以，鉴于他们的这些滥炸的频来，我们就可以断定，最近湘赣鄂晋陕豫和浙东，敌方伤亡损失，一定不少。

轰炸的次数多了，人民习以为常，敌机去后，倒很会有幽默的余情，造些笑话出来解闷。这种幽默，当然同俄国柴霍甫的小说一样，是带眼泪的笑声。

譬如：上海当大世界附近及先施面前落下大炸弹时，沪上的茶馆里，就流行着种种的传说。其一，说一小旅馆楼上的一位旅客，当炸弹落时，正在凭栏闲眺，忽而震天一声，房屋一动，一

只女人的玉手，连臂带骨，飞到他脸上来，打了他一记耳光，他的半面被打得有点乌青，但拾起这一只还热的玉手来一看，上面却带着一两五钱重的一只金镯，和一个宝石戒指。其二，炸弹来的时候，有一洋行小鬼，正走过那里，被震倒地，身上脸上，浸透了血。救护车来把他救起，抬到医院去，一经洗涤，却一点儿微伤也没有，原来他是睡卧在他人的血泊里的。在车上时，他还叫痛连声，可是洗涤完后，大笑一场，马上就跳出医院来。

此外则幸不幸的毫发之差的轶事最多。所以，有些人，又重申了八字和定命论的古义。南京轰炸之日，中央大学附近的防空壕内，挤满了七八十人；有一个寡妇抱了一个两岁幼儿后至，也进了这防空壕。小孩一见生人挤得多，且又暗如地狱，便放声大哭；壕内避难者大动公愤，要驱逐这母子出去。寡妇也恐因儿子的哭声，累及大家，只得仍复走出那一所防空壕，而避入了西面的一条小巷。但结果，一颗炸弹，正落在这防空壕上，在壕的七八十人尽被活埋，而这寡妇的母子独全。所以，有人说，这小孩将来必成大器，也有人说，这寡妇是心好食报。

冯焕章先生，当武汉日日被炸的时候，是住在蛇山东麓的福音堂里的。有卫队百余人，和他老在一起。当飞机来时，冯先生老爱说笑话，去壮旁人之胆。他有一次问兵士们说：飞机和飞鸟，是那一种数目多？当然是飞鸟多。又问鸟粪和炸弹，是那一种多？当然是鸟粪多。再问你们在走路或操练的时候，有鸟粪落到你们的头上身上过没有？当然是没有。“那么，”他说：“炸弹那里准会打到你的头上来呢？”这虽是一个笑话，但也可看出冯先生的善用譬喻，训育士兵。

所以，经过轰炸地的人，对飞机炸弹，是不十分怕的。前线

的士兵和红枪会的同志们一样，说枪弹是生眼睛的，对于好人，枪弹自然会得趋避转弯。理直气壮，行为勇敢机警的人，很不容易死亡。

总之，空袭来时，最不好的现象，是大家慌张，挤聚在一起。至于讲到疏散呢，自然有永久疏散，和临袭时疏散的两种。在人口密度不大的地方，则就是临时疏散，也就可以了。我们凡在放弃以前的粤汉路南段走过的人，大约总有过飞机袭火车的经验，那时候不也只跳下火车，跑开一二里路外的草地水田里伏着就行了么？

对于普通的空袭，我总以为是不十分可怕的，只有和海军舰上的大炮与陆军的排炮连合起来的炸弹才有点儿可怕。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记广洽法师

与广洽法师初次的见面，是在大前年的年底，我从台湾回来，在厦门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广洽法师在南普陀的学校（佛教会办的，学生都是年青的小和尚们）里教书。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全国上下正为了委员长的西安脱险而充满了欢庆。

我为想和在鼓浪屿日光岩下坐关的弘一法师去一见，曾把当时在《星光日报》当记者的赵家欣君去预探一探弘一法师的意见；第二天，赵家欣君就同广洽法师一道来看我了。

广洽法师俗家在泉州，是弘一法师入室的大弟子。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法师为第一。而广洽法师的守律，却是和弘一法师一样的，法师的身体不好，行动和言语，洵洵有儒者气；大劫之后，和他在星加坡的再遇，真是如何的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翁占秋先生画展专刊附言

翁占秋先生的画展，已经开始了三日了。往观者的口碑，以及评论家的文字，都在大家的耳边眼里，我可以不必再赘一辞，在这里想表明一下的，是本报的专刊，因稿件拥挤的关系，致迟出了两天的歉意。

至于翁先生的造诣，以及画的能感动大众，作宣传的最好工具；并且，这次翁先生的画展，是以筹赈为主要目标等，诸先生已先我而言，而实际上，大家也都已经明白了。

翁先生的画，是有根底的，从开幕之日，翁先生的演辞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功的苦心。但艺术无止境，翁先生于今后环游世界回来，他的精进境地，当然会比现在的更有精采，我们正在预祝他将来的更大的成功。

自从这一次神圣抗战发动以来，艺术家中间的向海外发展，作国际宣传的，以画家为最多。光从这点上来说，也可以见得我们因抗战的结果，而得到的艺术在国际间的地位。

敌人的国际间的声誉，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已经毁灭无余

了。敌国的画家，就是古代的浮世绘作者，现在尚且有人以提起为耻辱，现代的画家，自然更加没有国际人士来过问了；这征之于金门博览会中，敌馆被美国人士所轻视，就可以明了。足见我们的抗战建国，重造新文化这一句口号，并不是无根的虚语。

我们距离最后胜利的时期，日渐近了；愿同胞们之无论属于那一阶层的斗士，各能尽我们最后的一次努力。

六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翁占秋先生画展特刊》

欧洲人的生命力

最近，路透社曾有一通电，转述伦敦《每日邮报》记载的新闻一则，说：弗兰克·史威顿咸爵士，在伦敦卡斯顿汤与爱尔兰卫军军官未亡人尼尔古特里夫人结婚。史威顿咸爵士，本年八十余岁，作为新娘的那位军官未亡人，当然总也已有五十岁以上了无疑。以这一件喜事作标准，欧洲人的生命力的旺盛，实在足以令人羡慕。

我们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热带的东方人，象这种高年矍铄的人瑞，该是不见得多罢？当然，在欧洲，这也已经是并非寻常的事情了。

做一分事业，要一分精力。耆年硕德的老前辈，还有这一种精力，就是这种族，这国家的庆幸。

我们中国人的未老先衰，实在是一种很坏的现象。当此民族复兴，以抗战来奠建国始基的今日，这改良人种，增加种族生命力的问题，应该是大家来留心研究，锐意促进的。

至于令人想到这问题的重要的史威顿咸爵士本人，与马来亚

当然更有一段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四十余年前的马来亚护政司，后来也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

他对于马来人及马来文的了解，实在是深沉得无以复加，这从他的种种著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非但是一位政治家，并且也是一位文学家。

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他的《马来亚速写》，及一八九八年出版的《不书受信人名字》的书函集，实在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当时他所驻扎过的霹雳，是马来话最纯粹，马来气质最浓厚的地方；所以，他在《马来亚速写》的头上说："对于马来人的内心生活，恐怕是他人再没有比我更了解的，"这话当然并不是他的自夸自奖。

他的对马来人的尊敬，对马来人的了解，尤其在他的《不书受信人名字》的书函集的第三篇《东方和西方》一信里，写得更加彻底。

他于某一夜的席上，对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女太太说："西方白种人，没有到过马来亚的，老怀有这一种偏见，以为马来人是黑人，并且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是野蛮人。可是照马来人看来，我们白种文明国的女人穿的这一种美国化的装束，才是野蛮呢！"

他绝对否认马来民族是野蛮的，因此他就提到一位马来苏丹写给他的最富于友谊和诗意的信；接着，他又介绍了四首马来的情歌。现在我且把这四首情歌译出来，做一个结尾，用以证明这一位史威顿咸爵士的老兴的淋漓。

　　豆苗沿上屋檐前，

　　木槿红花色味偏。（无香也）

　　人人只见火烧屋，

不见侬心焚有烟。

请郎且看扑灯蛾，
飞向头家屋后过。
自从天地分时起，
命定鸳鸯可奈何。

此是月中廿一夜，
妇为生儿先物化。
我侬是汝手中禽，
却似黄莺依膝下。

倘汝远经河上头，
村村寻我莫夷犹。
倘汝竟先侬物化，
天门且为我迟留。（等我同死之意）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捐助文协的计划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去年四月在武汉成立以来，已经有一年三个月了。在这中间，文协曾出了《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诗歌专刊等刊物。最近，又组织了前线访问与宣传队，分派各作家上最前线去收集材料，送发精神食粮，与鼓励士气。同时更计划在香港出一英文刊物，作海外的宣传。其他如利用国际间的刊物，出版中国抗战特辑等，亦已经实现了。凡此种种工作，都已前后在本栏里公布过，读者诸君，想总不会忘记的。我以一理事的资格，在过去曾发起请各文艺爱好者，自由捐助文协，以便在这苦难期间，协助文协诸大计划的进行。一面在《晨星》栏里，也继续地在提倡着稿费的义捐。每月的捐款，虽则不多，但当重庆被炸，由我第一次将捐款汇寄文协之后，在渝的各理事们，都表示了无限的钦敬。

现在，胜利的到来，眼见得就在目前了；大约不出一月，我们反攻胜利的捷电，一定会同雪片似的飞来。因此，敌人的最后挣扎，也愈显得手忙脚乱。

对我们的坚决抗战，敌人实在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法应付的最后关头了，所以，只能狗急跳墙，凶噬我各相与友好的邻邦。象对反英运动的雷厉风行，对外蒙的无理进攻，就是敌计无所出的苦闷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也要加以周到的反击。所以，在这时候，文协的重要工作，如对国际的宣传，以及出前线增刊等事情，就不得不立即加重赶办起来。但做事第一要有钱才行，在我们为应付法币战而自行减低对外汇率的这时候，国内尤其需要我们在海外的同胞，能接济祖国以汇率很高的外币。因此，我们想连同《星中》，《总汇》的各副刊，来一个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日期定在下月（八月）七日起至八月十二日止的一周间。

投稿诸君，若赞同这计划的，请于来稿后注明。象这一种文稿义卖的运动，在上海，在香港，早已风行得很久了。我们这里，这还算是第一次。亲爱的诸文友，请大家来努一下力，尽一点推动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之责罢！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对新闻纸的饥渴感

——为《星中日报》四周年纪念作

大约象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在四十岁上下的人，总都有一种对新闻纸抱饥渴感的怪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若把读报这一件事情除去，那么，我想不管是生活如何过得美满，谁也总会感觉到一种大大的缺憾，如少吃一顿饭，或饭后少抽一枝烟一样。

这一种对报纸的饥渴感，我们在平时就抱得很深，在四海多事的目下，当然更可以不必说了。而当我们这一代，就是这短短四五十年中间，世界的变化，实在也的确比任何一代，来得更大，更复杂。

同饥渴者的想望好的可口的饮食品一样，我们也希望当世的报纸，能与时俱进地增加它的内容，味色，来配合我们的胃口，这当然又是人之常情。

《星中日报》出世已经有四年了；它的幼稚时代，我不曾见到，

可是自三周岁四周岁的这一段童年，我却亲自在旁边守视着，我觉得它正在一寸一寸伸展，如幼虫的长成为小动物一样，它的翅膀，坚强起来了，由会爬到了会飞，而祖国的抗战，和欧洲的战事，更在最短时期中，增强了它的飞行的能力。

它虽则不能说完全能够充实我对报纸饥渴感的全部，但觉得它也已经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独立饮食品的资格，唯其是尚未完全，所以还有将来；唯其是有将来，所以值得在这一定时期内，来一番检讨和庆祝的工作。

“《星中日报》是在长成中，它的将来是没有限量的！”

这两句话，就算作为我对它的祝词。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新加坡《星中日报》

在吉隆坡公演《原野》揭幕式上的致词

诸位来宾：

今（天）晚（上）武汉合唱团初次公演我国剧作家曹禺先生的新剧《原野》，来实践他们筹赈兼宣扬祖国文化的双重义务，特地命鄙人自星加坡来此地，替他们揭幕，代他们向各位致一辞，鄙人亦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分子，对于筹赈，对于宣扬祖国文化，自然是义不容辞。现在暂借这一个大剧本，未开演以前的几分钟，向各位讲几句简单的话。

第一，关于我们的抗战，关于我们的应该出最后一个钱和最后一分力的话，诸君原也已经听得很多了，这里可以不再说。但有一事，要向诸君报告的，是最近在扬子江以南，洞庭湖以东新展开的血战，我们绝对有胜利的把握的一点。诸君从报上，大约也都已经看到，敌人因在伪满与苏联的边境，最近取了事大主义，向苏联屈膝求和了，故而抽调了两三师团的兵力，来向我们华中下一个总攻。一面既可以助长汪逆精卫等傀儡登场的声势，一面也可以暂掩饰一下师劳无功的丑态，使敌国内反战的空气，

敌前线倒戈的局势，得缓和一下。可是出师不利，在湘鄂赣边，首次就受了大挫折，结果又增加了几万敌师的死亡，和许许多多军械的损失。敌人的计划，是在夺取长沙，直下衡阳，然后再分兵向西向南，最后目的，在宜昌、沙市，与广西桂林。可是敌人这一个迷梦，当然在不久的将来，就说一个月之后吧，马上会被我们打破。因为两湖的形势，就是目下正在展开血战的那一块地方，不是湖泽湿地，就是崇山峻岭。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大炮、飞机、舰队，是绝对不能发生效力的。

原来，湖南这一块地方在中国一向是兵家用以覆没敌军的好处所。军阀时代，北下的雄师，每次都在湖南全军覆没的事情，只教稍为留心一点祖国近二十年来内战局势的人，都应该记得清楚。普通我们老爱说敌人的泥足二字，可是两湖这地方，才真正是陷敌人于不拔之境的沼泽。洞庭湖水，秋来要减，湘、澧等江，弯曲迂回，敌人进得去，就永走不出。过了长沙以南，洞庭湖以西呢？一面是南岳衡山的脉网，一面是扬子峡下的岭区，就在平时行路之人要向西南前进，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人生路不熟的敌人的疲怠厌战之师！所以要求敌人付以相当代价以后，长沙一个空城，我们是可放弃的。但敌人要想征长沙再西进、南进呢？则诸君请瞧着吧，绝对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迷梦。并且我敢断言，敌人的葬身之地，就在湖南的湖沼与山区接壤之间。我们最后胜利的第一块路程碑，也就可以从那里建起。

可是，诸位来宾：天时、地利、人和，目下原是全于我有利的。但不久之后，寒天就要到了，前线勇士和新成战区的成千成万的难胞，正在急待我们去接济，去抚养。

吉隆坡诸位侨领对于赈济事务的出钱出力，本来就是马来亚

的表率，这就武汉合唱团来吉隆坡后筹赈的成绩上看来，就可以明白。可是好事不嫌多做，尽力务期到底。百尺竿头，若能再进一步，就是鄙人此来的本愿。

第二，要说到我们的文化了。

敌国的文化，本来就是从中国抄去的副本。他自从侵入中国以来，一味的想摧毁我文化机关，文化种子。原也如搨碑的人，既拓得了全碑之后，想把原碑打破毁去的意思一样。可是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种子，敌人哪里能全部摧毁得了，只教我们国家的灿烂的文化，是决不会全灭的。在沦陷区的同胞，敌人原可以用奴化、毒化的政策来消弭。但是在抗战后方的同胞呢？在海外广大的同胞呢？敌人有什么方法来毒化，来奴化？汪逆的恶宣传，绝对不会发生效力。我们的援助祖国抗战，和保持祖国文化的决心，也绝对不会有一点动摇。古人有抱祭器而入海，到海外来培养文化基础，做复国兴师的根底的。这一次合唱团要来宣传文化，在艰难困苦之中，排演曹禺先生的这一出名剧的用意，我知道他们，也就在这里。关于这剧本的话我已经在《马华日报》上写过一点了，并且该报也已经出了专刊。想诸位来宾，都已经见过，此地亦可以不说。至于剧情的全部，和合唱团诸君的演出艺术，诸君也可以马上明白。最后，不得不用力提一提的，是我们在海外的侨胞，不得不乘这一个大时代，来更加努力于保持，与发扬光大我们祖国的文化这一件事情。文化的种类，原是很多，也应该从各方而来着手提倡的。譬如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方面，艺术、宗教以及生活习惯方面。可是从戏剧来着手却是一个捷径，因为他的感动力大，教育范围广，而且很容易使一般和文化不接近的人发生出趣味和热爱来。

此次武汉合唱团的提倡，以及诸位来宾及当地筹赈会诸君的热心赞助，使这一个企图，得收到这样的成功，使筹赈和宣扬文化的两重目的都能达到，就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一个证明。最后，我们要叫出这两个口号：中华民国万岁！中国文化万万岁！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洲日报·马来亚新闻（一）》，题目为编者所加

再见王莹

前天在吉隆坡，就听见人说，王莹女士，也许会在这一两天内到星加坡来。昨晚自马六甲回来，在珍珠巴刹吃过晚饭后，又听一位同事说，王莹女士来了，就住在南天的二楼。

同家人等上南天去一看，王莹女士果然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同业者，也在她的那间房间里访问她。和她又有一年多时间的不见，王莹女士，却又老成了许多。女子的进步，的确比我们男子来得快，尤其是象在王莹女士的那一个年龄的时代。

我在上海。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以后听见她去日本念了书，回来后，也曾上过银幕，写过剧本，演过话剧。

去年夏天，大家流亡到了武汉，记得她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剧艺。思为祖国当这一个危难时期，尽她的一分力量。我在武汉过的五六个月光阴，正象是一场大梦，上战线去跑的时日，比安居在武昌寓里的时间还要多。可是每次从前方回来，渡江到汉口去的时候，总有机会，和王莹女士相见，尤其是在美的咖啡店的

冷气装置的客厅里，我们谈的那些，关于文艺，关于祖国前途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真象是隔世的事情。

其后王莹女士，上了前线，我亦转转如蓬，从东战场而出闽粤，再一帆远渡，来到了南洋。在南天旅舍，和她的这一次的忽漫相逢，虽则时间只隔了一年，但因为在这一年之内，国事家事的变化太多了，身世悠悠，真有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的感觉。

王莹女士是长成了，她的政治见解，她的文艺修养，以及她的阅世经验，在这抗战的两年零三个月里，真有了惊人的进步。我不敢再以从前对一位娇羞的小姑娘那样的态度对她了。她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已经找出了她自己所应走的路，而且也已经尽了她国民一分子所应尽的责。

她的此来，是为求艺术的深造，一面原为游历，一面也想对她所已得的经验学识，再加以锻炼的。这一种精进不已的精神，在一个青年女子的身上发见的时候，真是如何可以使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正如一位西洋的记者所说的一样，中国在抗战中，全民族都进了步，尤其是民族中间的一半的女子们。

王莹女士，在马来亚总还有相当时间的停留，她或者将上各处去观光，或者也将和此间的文化人研求现代的剧艺和文学，我正在这里刮目相待，和等着看她的第二次的跃进。

十月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新闻"版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的日子（十月十九），就快到了，同人等正在计划着如何的来纪念这个日子。鲁迅先生的遗教，已汇成了全集，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有人说，我们日日可以展诵先生的遗著，便日日可以纪念鲁迅，正不必限定这一日逝世之日，来一番热闹，流成事过即忘的，追逐时髦的现象。这话，虽然也有理由；但我们对一位值得崇拜的对象，总想越纪念越好，越是从各方面来怀念他的人格，思想，行动，越可以勉励我们自己，安慰我们自己。假使我们于日日纪念他，学习他之外，更在这一个特定的日子里，再来一次热烈的纪念，那不是更好么？

所以，在这个纪念日里，我们总想好好的，从多方面来纪念一下。现在拟定的节目是，第一，在本刊《晨星》栏里出一纪念专号；第二，和诚心纪念的人连结起来，开一个纪念会；第三，若有其他团体，举行演剧演讲或募捐赠送鲁迅艺术学院等运动时，我们想大家去参加。

前几日的报上，曾经有过一次记载。说本坡爱同学校的校友

会，将于这一日开一个纪念会，我们打算参加的，也就是这一个。

总之鲁迅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我们的要纪念鲁迅，和英国人的要纪念莎士比亚，法国人的要纪念服尔德、毛里哀有一样虔诚的心。虽则因目下时局和环境的关系，我们或不必铺张，不必叫嚣，但我们的要热烈纪念他，崇仰他的这一般热忱，想是谁也深深地感到的。

我们先在这里提出这一个建议，希望对鲁迅先生有研究，或生前有交谊的诸君，能多赐关于他的文字。

其次，纪念的具体办法，若经正式决定，我们当更作报告，务期对鲁迅先生抱有仰慕之情的，都得参加。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介绍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工作，在本栏已经介绍过许多次了，想读者总已对这集团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发动的捐助文协款项，前后已经汇去两次，国币千元，用以资助文协的种种费用，如对海外的宣传，派前线慰问队与慰劳宣传队等的活动。现在这文协的昆明分会，又有漫画展览团到星洲来展览了。我们为沟通国内外的文化，获知祖国前线后方抗敌的诸种情形起见，当然是欢迎之至。

该展览团主任喻世海君，以及同来的宁涵章女士，都是云南大学的学生，他们这一次自备资斧，间关万里，携带了许多画幅，木刻与照相，由云南而之缅甸，由缅甸而之星洲，巡回展览，为的不外乎想暴露敌人的凶狠，与祖国难民的流离。

喻君等在缅甸已获得很大的成功，所筹得的款项，是全部托交该地筹赈会寄回祖国的难民的，这一次在星洲展览的目的，自然也不外乎此。

亲爱的侨胞们，楚虽三户，足以亡秦，众志一成，卒能兴

夏，我们只教万众一心，坚持到底，最后胜利，自然是指日可待。最紧要的，是在这为山九仞的时候，务必大家更多出一点钱，多出一点力，来促成我们建国的大业。

喻君等已经出了力了，我们自应该多出一点钱与时间，以助成他们的盛举。

该展览团决于十月二十八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公开在本坡总商会展览四天，门票两角，所得悉数助赈，希望同侨，能踊跃前去参观。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杂　谈

前星期日（十一月廿六日）的晚上，在新世界日光园看到了话剧《活地狱》的演出；对于这一剧本的上演，各报都曾有过详细的批评和介绍，我在此地本可以不再谈论些什么。可是评剧者，对地下室里的灯光装置，似乎都一致的表示了不满，对这我原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第一，我们应该想到日光园的舞台，并不是专为演话剧而设。而第二，排演的剧团又是没有大资本，没有长历史的团体。

我平时不喜欢对人作过分的苛求，所以，这一次，对这小剧团的演出这一个剧本，已经觉得有了十二分的满足。如女主角的金姑娘，及破落户的洪二爷，原是演得很好，此外就是各个配角，也只觉得瑜多于瑕。

在马来亚来推行话剧，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原因就在观众的不易争取；这回《活地狱》能够有此成绩，有此反响，由卑之无甚高的立脚点来讲，可算是已经有了六七分的成功了，今后该团若能再自精进，努力继续下去，则十分的成就，也决不难于短时期内收获得到。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华剧运的进展

最近在报纸上，时常看见，有某某乐团或社团，在某日某地演话剧筹赈的记事；这些爱美剧团的剧艺，不管它是美好或是幼稚，总之，单从演出的频繁一点来说，也是进步的现象。第一，可以知道，观众已进步到了能了解或想努力了解话剧的程度；第二，主演者方面，也已大家觉得话剧是教育大众，或用作宣传手段的好方法。

现在，继这些爱美剧团之后，居然同时又有好几个职业剧团成立了，这现象当然是比从前更进一步的飞跃。我们对此，自然只有欣幸，希望他们都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不过在这一个剧运隆兴的高潮点，我觉得还有几点要点，必须请从事剧运的诸君留意的。

第一，我们还得注意于适应马华观众的剧本的创造，这是使剧运能普遍化，永久化的一个关键；因为国内各作家的创作，搬到南洋来上演，恐怕观众（尤其是不曾回过祖国的诸侨胞）的欣赏量，要大大的减低。我们假使能以南洋的社会为背景，或以南

洋社会的现实，来作成剧本的内容，则观众对话剧的兴趣和理解，必定比看中国的名剧本的上演，要丰富得多。譬如，对南洋侨界的封建守旧习俗等的讽刺，或侨生的不谙祖国情势等的再现；以及惹娘们对世界，对国家的知识的浅陋等，岂不都是很好的喜剧材料？

第二，假使以方言来演出话剧时，对于方言的洗炼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难关。我们知道，无论那一种方言，若能加以洗炼，付以抑扬，运用得很好的时候，则即使是不懂方言的观众，也能得到几分领悟。我们原不在希望方言的普通话化，或普通话的夹入方言，使成一种新文明戏的变态。但试以方言来演出话剧时，则对这方言，至少至少，要加以几分音韵上或修辞上的改进。文绉绉的成语，原不应加得太多，而完全俗陋得不堪，只有小范围之内的人能懂得的缉口之类，也不好插入得太繁。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于方言，欲加以洗炼的难处。

第三，是利用现有诸舞台时的简便舞台艺术的改进问题，也是目下从事剧运诸同志所应留意的一点。我们知道，在马来亚各埠的剧场，大抵都是为映电影或演旧剧而设的。为配置布景之故的回转舞台，或天上，地上能升降自如的立体舞台，都还没有灯光照明的装置，也仍旧是只适合于旧剧的演出的，而演话剧的剧团，要想自己来建造一个剧场的能力，恐怕还不够。在这一种情形下，挖肉补疮，要想舞台效力能增加，自然只有靠临时随地的种种新方法的案出了。从事剧运的诸同志，对此当然也都在绞脑汁，费苦心，可是若能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既经济，而又简便的布景、照明、扩音等的配合，当更能使话剧的演出，容易成功。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战时的忧郁症

战争时代，有形无形的忧郁症中间，最大的一个现象，是人的意志集中力的分散。平常的活动，事业等等，都会因此而呈动摇之象，三五成群，空谈空想，做事情决没有和平时那么的有效力。

还有一般意志薄弱的人，在战时因紧张过度的缘故，变成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的事情也很多。

据英国医生麦克克莱兰特之所说，则忧郁状态，也并不一定是坏的。有时候，在寻常过程之中，这忧郁反会变成刺激，使人增加活动的能力。

譬如家里有了病人，自然周围的人，要忧郁了；但忧郁的结果，就会去请医生，或将病人送入医院。这种种活动，在平时是不会有的，到了那时，就自然而然，很有条理地会去做了。同时譬如一家一国的经济财政上，遇到危难的时候，则负责的人，自然也会因忧郁而显出种种活动能力来，如整理规划，盘算弥补之类。象这一种忧郁状态，心理学家，叫作“自然的状态”。战时的忧郁，若止于此限，则一点儿也对人类没有损害，反而会增加一

般的工作效力。

所可虑的，是这忧郁状态过了度，变成了病态，那就不对了。这一种病态的忧郁症，物理的在人身上发现的时候，会增加心脏的动悸，食欲的衰退，消化的不良，夜眠的不安，终而至于使人成大病，而影响及事业。心理的在人的生活中显现的时候，会因绝望或恐怖的结果，而去找寻过度的刺激，以作忘忧之用，如狂嫖，烂赌，痛饮，失常诸状态。

我们在这国难未已，欧战又起的时候，大家会感染到一点忧郁，自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要紧的，是要把这忧郁善用，使它成为刺激，而去增加我们的活动力。切不可因无故的忧郁过度，而习成病的状态，终而至于消极，绝望的境地。

为救治这战时忧郁症的病的状态，最好是先去究明这忧郁症的来源，然后再直向可以扑灭这招到忧郁的本原的工作去努力。

麦克克莱兰特医生所举的救治方法中，有集中意志，去做须切实负责之事，读好书，从事运动，不使身心闲空的几项，但在我们现下的状态中呢，我想是无过于努力去做救国工作的这一件事情了。

当然，救国工作，千头万绪，一个人在一个时候，决计干不了，也干不好；但极普通的一句话，就是确守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他或她的最善做去，自然是遣散战时忧郁症的对症良药。这极平常的药方虽系传自古人，药草也系采自平时的，但只教用之得法，则不问战时平时，我们就可以算是不虚做了一世人了。因读了一篇最近在心理杂志上发表的麦克克莱兰特医生的文字之故，我就发生了上面的这一点感想。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利用年假

古人说，读书用三余。冬者岁之余，自然可以用来读书。但由一年到头，在读书的学子们说来，则这一个假期，又当好好儿的利用一番，才是道理。

譬如救国工作，访问亲友，旅游，恋爱，或补足学业等，都是读书以外的事情，都是要有很多的时间才办得到的。各人若自认为这些是目前必须做的事情，那当然是可以利用年假来做成这些平时无暇做的工作。

但我的所谓利用年假的意思，却又是这些以外的一种反省工作。一年又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缺点？这些缺点，应该怎样去纠正？

追思，检讨了过去，我们还应该顾计到将来。自己一身的事情顾计到后，更应该考虑一下己身以外的社团，亲友，或国家与民族的种种。

以自己为中心，以社会为背景，以民族国家为奉仕的对象，我们在这时此地，应该立下一个怎样的计划，遵循做去。

热带的天气，只有在年尾年头，清凉一点。而时间的分割，虽系人为的区划，但为结束和开创事业起见，也是很觉便利的一种制度。所以到了这一年将尽，而另一年又将开始的时候，来下一番反省的工夫，我以为终于是利用年假的一个好方法。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诗人的穷困

最近，在香港十二月九日的《国民日报》上，得读简又文先生一篇介绍葡国民族诗人贾梅士的文章。贾梅士的《葡国魂》，英译本，有坎泰白利诗人全集中之版本，系最价廉而易于购求的。我所读的，就是这丛书中的一本，计时已在二十年前了。这一位诗人，非但在生前，一生坎坷不遇，即在死后，除在欧洲享有盛名外，在东方亦竟默默无闻，无人提过。简先生的这一篇介绍文，实足为生前不遇的这位葡萄牙大诗人吐气不少。

现在先把简先生那篇介绍文的要点缀录一点在下面：

鲁易士·贾梅士为一个“具有天才”而亦不幸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诗人，于一五二四年生于葡里斯本富贵之家。其祖先亦诗人，屡荷王室恩宠，为“不封爵的贵族”。至诗人幼年，家产荡然，乃往依其叔。叔为有名学者，任告奄巴大学监督。诗人即在大学读书，其时，意大利之文艺复兴运动已到成功时期，影响透入葡国，而大学教授多当代著名学者。故诗人饱受希腊拉丁古典文学教育，后来其诗中充满古典神话，兼影响及葡国文字使

其增加丰厚，益臻完善之境，皆源于此时大学之训练也。

一五四二年，诗人十八岁，毕业大学，真渊博的学问，所谓“百科辞典的知识”者是。叔欲其研究神学，献身教会，而彼则大异其趣，另有主见，于是离而他去，自谋独立。于一五四三年抵葡京，为私人教师，渐与高贵人士结交。未久，钟情于一女子名嘉多莲者，女入宫为王后侍从，诗人因亦得出入宫禁。葡王约翰三世，以其身出圣族，且博学能诗有祖父风，及优遇之。惟其赋性“刚直无畏，好高谈雄辩”，且倜傥风流，言行失检，遂为致祸之根矣。

彼与宫女亲昵逾恒，热恋至甚，宫中人忌焉，造谣中伤。王后素性拘谨深滋不悦，令诗人所撰《施寥古王外传》剧本，词伤及国王，因被禁入宫，寻而爱人亦与断绝关系。诗人向在情感热烈奔放中成诗甚多，文名籍甚，为其一生之光荣时期，至是忽遭失宠与失恋双重苦痛，羞愧，悲哀，嫉妒，失望，悔恨，愤怒，并集于心，遂令其不得不离京而隐居于乡间。诗人于失意之余，愤而赴斐洲从军，时一五四七年事也。尝与摩洛哥人战，伤右目，其铜像眇一目者盖本此。越二年，回葡京，前情未忘，欲再续温柔之梦，结果又失意。同时欲求王念其劳绩及受伤而施以特恩，亦失望。行检益放不羁，与京中恶少年游，一时妇女称之曰：“魔鬼”，“无眼的面孔”，卒因当衝以剑伤及王宫近臣，被判下狱。释出后，乃再投军赴印度。

诗人之赴印也，乘军舰浮于海上者六阅月，因得习知航行知识，与海洋实景。此皆绝好之诗材，诗人尽量采入其《葡国魂》中，盖昔在葡京时，此杰作已开始写作矣。到印京高亚后，因其勇敢与诗才可得当地达官贵人之欢迎，愿垂青眼，所成佳作愈

多。复屡次躬预海陆军战争，人谓其"一手仗剑，一手握管"，亦可谓旷代奇才哉！后来立功希腊之英诗人拜伦殆不得专美于史册也。然而诗人以笔得名，不旋踵而又以笔召祸矣。盖葡人当时得领土于印度，所派官吏贪劣腐化，上下交征，一以侵渔享乐为事。总督三年一任，诗人讽语云："一年就职，二年抢劫，三年席卷离任"。贾梅士赋性刚直无畏，具崇高理想，睹此恶象，不能隐忍，遂暴之于诗。写成《竞斗笑谈》及《印度懵话》诸作，对总督多所讥刺，大中其忌，乃于一五五六年被放逐至澳门。

诗人随军至东方，参预占领澳门之役。迨兵役期满，乃居留澳门，膺任失名产业管理员。相传其寓于三灶岛之浪白滘，其地盖当时洋船所停船之处也。诗人流浪多年，至是乃薄有积蓄，身心安谧，且稍得享"幸福与惬意的生活"矣。于是益事吟咏不辍，暇日辄隐身于彼清幽雅胜的岩洞内作诗，卒完成《葡国魂》。讵料横祸飞来，于一五五九年十月忽被澳官控以侵吞公款罪，押赴印京。舟至缅甸海岸，遇险覆没，资财衣物尽丧，诗人一手高举诗稿而以他手泅水登岸，生命与名著两者均幸得全，是亦文学史中之千秋佳话也。

诗人复乘船至马来半岛之马六甲。一五六一年夏，始得回至高亚，即被囚囹圄。至是乃闻其爱人嘉多莲之死耗。适新任总督为其故人，乃得被判无罪而出狱。寻又因债务而再被囚，复得友人助力营救之。其后数年间，屡欲归国，而蹉跎流浪，生活无安静快意之时。卒至一五六九年十一月得友人资助乘船归葡，于翌年四月安抵里斯本。

游子浪迹天涯者十七年于兹矣。归来时，父早去世（在一五五五年），惟母氏犹存，贫苦老弱。适是时葡京大饥，所带回十

余年心血所萃之《葡国魂》诗稿至一五七一年九月，始得出版问世，享有十年版权。新诗一出，传诵一时，朝野上下，交口称颂，遂得盛名。葡新王嘉之，给予年金赏其战功及文学成绩以三年为限。金额虽不巨，足资糊口，由是生活稍得安定。三年期满后，诗人又陷困境。葡王谕令续付赏金，然因司度支者之误会，奖金迁延多时始得领出。时诗人穷愁已至绝境，于友朋资助外，甚且籍赖其忠仆行乞以供养之。二次期满后，王又再给年金。可谓特殊之知遇也。逭王远征斐洲，诗人以体弱不能随征，留居京内。及至王兵败身死之噩耗传至，贾梅士供养之源遂绝，以后又在穷愁潦倒中生活矣。

一五八〇年，葡京瘟疫流行，死人无数。贾梅士染疫被送至医院中。于是年六月十日去世，年五十六岁，无妻，无嗣，无产，死后并殓葬之衣饰亦有赖于慈善家之施舍。遗骸葬于同时染疫死者之乱坟中，一无碑志，多年之后，始有人在一教堂中立石为其纪念，不幸一七五五年大地震，教堂与石碑同时被毁灭。延至三百年后，一八八〇年六月十日，国人始于公坟中检拾其儿茎遗骨，公葬于国葬坟场。穷愁蹇滞毕生坎坷的大诗人，终得名传不朽。

简先生全文太长，只能割爱，抄录至此，已可见得诗人不遇的一生了。

但诗人虽遭遇了这样的困苦，而他的气骨仍是不凡，绝无悲哀，绝望，怨尤之声，在他的诗里吐露，这才是他之所以得成为葡国民族诗人的最大强点。现在我们也正在深盼中华民族大诗人，和国民诗史的产出。祖国许多直接间接受侵略者蹂躏的诗人的身世，也许有比贾梅士更颠沛万倍者，要紧的，是在这生死关

头，忍苦耐劳，杀出一条血路来。天降大任，种种困苦，不过是一个试探而已。诗人未必固穷，穷了也未必一定工诗，不过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要坚强伟大，却是自然的结果。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艺》及副刊的一年

自我接编《文艺》及《晨星》以来，匆匆已经满了一周年；而今天却是一九三九，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的最后的一天。

文艺，尤其是中国文艺，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所负的使命如何，应努力实践的方向如何，渐次走上理想化路去的步骤如何等，在这一年中，或由各位投稿诸君之惠稿，或于忙碌之中，络续抽空写过一点了，想已蒙读者诸君所鉴及；这里当然可以不必再说。在这里，所想和大家谈谈的，是在这一年中的编稿的经验。

不消说得，日报的副刊，篇幅有限，而且又是读者层复杂，每日须出的读物，所以，副刊投稿者和编辑者，都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两种限制。时间的限制，是文字须紧跟着现实，空间的限制是稿件的不宜过长，而写的又须是为某一地方的各层读者，多所乐于阅读的东西。

投来的稿件，若能都合乎上列的条件的，当然是副刊的最上材料，降而求其次，则两种限制之中，能适合其一的，也就可以

充数了。

经一年间编稿的经验，觉得马华的投稿诸君，稿子都写得过长，是一个通病，其次，是对于现实的取舍手段不高明，紧要的地方，握住得不多，而不紧要的地方也同样地不晓得割去，又是一个通病。

一年以来，读稿子长短约有一万余篇，能用的，或加以一点删改，或照原文一字不易（这种稿件，自然较少）地一经发表，都已摆在诸君的面前。但是，剩余下来，现在积存在我手头的总还有八千件以上的原稿。由投稿者诸君说来，不用的稿子，为什么不立时一一退回，主观地自觉写得很好的，又不见诸刊登；大约不满的人，总是很多，但在我，却已经尽了最善，就是连在编余的闲暇，也多费在读稿子上了。

在这辛苦的一年工作之中，有一件事情，觉得欣幸的，是来稿之中，意识不正确的稿子，却极少极少；文字欠通顺或辞不能达意的稿，有一小部分，其余的稿都是还能用的，不过所犯的，是上面说过的两个通病，未能免除而已。

祖国抗战已历两年又六个月，以后正是我们加紧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文艺的斗争力之急须开展，对内外宣传的必需加紧，向汉奸失败主义思想之急切进攻的尤其重要，自不待言。我们在后方的笔部队，当然也得重整一番阵容，以求配合着抗战的进展。地方现实原属重要，小意见，小感情，原应该尊重，但是举国一致的大团结，更应该顾到。时至今日，文艺与政治军事的不分性，就在这些地方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以后，我们写副刊稿件，不问是评论，或是创作，都应该向这一个方向前进。

在这一年的副刊文字之中，剧本的不能采登，原是一个遗憾；但一则限于篇幅，再则精悍的剧作，也不曾见到，却是主因。戏剧，富于战斗性，能教育大众，鼓励大众这一事实，是大家所公认的；但要创作一个好的剧本，实在也真不容易。在明年的副刊里，我们就想对于戏剧这一部门，多加以些注意。

小说的创作，自然比其他各种更觉容易，但在这一个时期，我们总希望有比《华威先生》及《差半车麦秸》更进一步的作品出现。

轻松而富于刺激性的小品散文，按理是副刊最适合的文字；但照我一年编辑的经验看来，则马华的作家，对这一种作品，似乎是不甚擅长。原因，我想还是在于气候的没有变化，与一般生活的没有余裕。

一年的岁月又过去了，我们检点一下过去，才发见我们的进步，决赶不上日轮的回转。但如哥德之所说，只教"不要急""不要歇"（奥内·哈斯脱，奥内·拉斯脱）地向前进取，人生终于是会得到相当的成功的。谨以此语，献给读者及惠稿者诸君，作为我年底的一个精神礼物。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

到星洲以后，恰恰满了一周年。虽然对于南洋一般的文化状态，还不能十分的明白，对于星洲的社会，也还不十分认识，但就我所经历的一角来下判断，则马华的文化，正在向前迈进的一句断语，是可以说的。

一年来的具体的总账，我没有能力来结算；譬如某人对某事，或某人在某一个文化创造品上，有了若干的进步之类。关于这一类的评论，我想总有比我更适当的人已在做了。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几个抽象的趋向。

第一，文化界团结起来了。中华民族一向是被人视作为没有团结，缺少合作精神的民族，原因是在私心重于公义，民族中间的有智识的文化人，尤其是善于相轻，善于挑拨离间，因而造成他自己的地位。这倾向，在抗战以前的祖国，当然是十分显著，而一向以帮派作文化界后盾的南洋，照理是应该比抗战以前的祖国，更要显得奇形怪状，百鬼昼行的。可是，这一年来，照我本身所亲见到的情形来说，则马华的文化界，却相反地，各走上了团结的大道。

举个例来说明，譬如教育界的团结，新闻记者们的团结，书业服务人员的团结，以及为救国筹赈之故，于每一卖花节日或纪念日的各社团、各学校团体、各乡土团体的大团结等，也许从前是已经有过，但在我所亲见的这一年中，觉得气势格外的浓厚，团结也格外的巩固；这当然是要感谢敌人的残杀侵凌之所赐。但团结者本身，若无自觉，若没有捐除小我成见之心，是决不容易办到的。

团结就是力量，文化人是推动社会国家进步的主力；一般民众，是在等候着文化界领导而向前进的。所以，这一个文化界团结的倾向，也就是保证中华民族不会沦亡的倾向。

第二，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坚强起来了。南洋本来是工业商业角逐的市场，什么文化不文化，本来都可以不管的。谁弄钱弄得多，谁就是王者；问什么教育？问什么文化？可是这一年来，倾向却改变了。各地的学校，孜孜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在求改进；各种新闻、杂志、壁报、宣传用的文化作品，都无形地进了步。极简单的一个证明，就可以从各位国内的艺术家，到南洋来开画展而各得到了成功的一点来指出。而国内的出版界，因各地都遭受了敌寇的侵凌，现在在上海香港的出版业者，又各以南洋为唯一推销文化出品的巨埠。这从正面来讲，原可以说是南洋的华侨在文化上进了步，而从侧面来说，则就是侨胞坚定了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

至若国语的普遍提倡，教育程度的一般提高，中国语文的特别为侨胞们所重视等，都是这一倾向的流露。中华民族的国民，有此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

第三，从狭义的艺术界来说，马华的艺术家们，已从纸上谈兵的空言状态，进步到了脚踏实地的实践阶段。文艺作者们自己编印的杂志也有了（《文艺长城》），南马北马中马的剧运，气势蓬蓬勃勃，现在正进展到了从来未有的盛境，歌咏团体，音乐集团，也增加了不少的数目。各报的副刊，内容都进了步。意识不正确，或文字欠通顺的稿子是绝迹了。同时，象文艺通信，报告文学，指摘奸细的论文之类，都与时并进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国内的作家，向南洋各报投来的稿件，也日多一日，祖国与侨胞中间的隔阂，渐渐地除去，声气渐渐地相通了。

第四，也是文化部门之一的工商业的进步。我虽是外行，但有一点，我觉得总可以说，就是劳资的互助，与经营的合理化的一点。最近发生的各劳资纠纷，大部分都未及恶化，而得到了相当的解决。如永安堂药厂的接受工人全部的要求，自是难得的好例。即其他各业的劳资谈判，也大抵都达到了由两方互让，而获得圆满解决的结果。这进步原是产业界振兴的预兆，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对付敌人，内部的分裂，能够减少一分，抗战力量就增加一分；劳资两方，都能明白到这一点，则我们的统一，决计不会破坏，持久抗战的基础，也就如磐石般的奠定得下来。

第五，是妇女界的文化的进步。要知道妇女界的文化程度，是应从女子教育，消费品输入统计，婚姻事件，儿童保育状态，家庭状况，女工生活，和妇女救国工作诸方面来研究的。仔细的情形，我并不能够详述，但只就女子教育的比往年进了步，女子就学的人数增加了大半的一点，以及在救国工作，宣传工作上，女子也和男子平等地，分担了她们的职责，这两点上来下判断，

则马华的妇女界，现在正在从旧的封建文化圈里，蜕变成新时代的文化斗士这一倾向，是不可否认的。

妇女是家庭的主宰，是次一代国民的产源，要想得到人种改良，国族前进的结果，妇女界的文化，是先决的条件。旧道德的好处，原应该摄取，而新文化的缺点，也应该严厉地矫正。在这一年来，我所见到的马华妇女界的进展，似乎是正在向这一个方向推动，这当然是极正确，极合理的动向。

文化两字，包括的范围实在太广泛；盲人摸象，我所触着的，也许只是马华文化的极表面的一层皮相，但自我以为以上所说的，却是不过于苛求，也不居心自媚的由衷之言。高明的读者，或有和我见解不同的，若能开诚赐教，那就感激不尽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文人的待遇

在一篇从重庆寄来的通信上，曾读到重庆生活费的高涨，一般中下级公务人员和文士，还不及工人与车夫的报酬来得丰厚；文士写千字，只卖得元半二元的稿费，而排字工人排千字，倒也有国币二元以上的工钱等消息。

这虽是战时的畸形景象，但是从供求的关系上说来，可也是必然的结果。排字工人，需要熟练的技巧，相当的学识，与坚苦的斗志，同文人并没有两样。他的重要和文人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而在战时的后方，我们由友人的通信，及刊物的编辑余谈中看来，知道熟练的排字工人，印刷工人，以及印刷业经营者，都非常的稀少。

并且，因交通运输的不便，印刷材料，在后方简直是珍贵之至。铅字是少得很，印刷机也并不多；其他如油墨纸张之类，无一不在感到供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友们自然只集中在几个大都市里，不肯千里长征的到后方去了。而宣传印刷用品，一般新闻杂志，以及初级的教育工具，在后方的需要，却比几个通

都大邑，紧急得多。物以稀为贵，印刷工友的工资在战时后方的抬高，自是必然的情势。

其次，如舆夫、车夫、船夫之类的工友，因为有机可乘，临时抬高一点价钱，也是自然的现象。不过要合乎理性，不可过事要挟，形成类乎抢劫的行为，那就无可非议了。

至于说到文士呢？则平常我们就在说，中国社会，对文士的待遇，是最坏的。远之，如欧洲作家的一字几镑等，类于神话似的传说，我们暂且不提；就以英国在六十年前的情形来说，譬如乔治·葛辛，于伦敦市场上，出卖小说稿最低的价格，一部十万字的小说，还可以得到五十镑的市价。这是在当时的文人市场上，算最低的价格了。合到现在的法币，也有两千元上下的数目。而当时伦敦的生活，是四十个先令（约二十元法币），尽可以优裕地过一个月的。中国的作家，在平时就向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乔治·葛辛的生活，可以从他著的《文士街》一小说，及穆来·洛勃兹以他的一生为模特儿的《亨利·迈脱兰特的私生活》一书中看出来。所以在此地举他作代表者，因为他是当时著作家中最不幸的一个之故。）

象我们从前在上海写稿子，每千字写得二十元的报酬时，是稀有的例外，平常总只在千字十元至十五元之间。而出书时候的版税，靠得住的书店，最高率也只抽到了百分之二十，通常是百分之十五。每一册书出来，平均每年有五千册好销，而能继续至十年的，就算好的了。即依这一个平时在中国是最好的待遇，和欧洲各国的最不遇的作家的待遇来比一比，还是觉得减色得很多的；在现今的战时后方，文士的待遇，低落得赶不上工人，那当然是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对于这战时文士的苦境，我们原抱着万分的同情。但一方面，从我国历来喜以读书人自负，看其他的人都是“万般皆下品”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个对战时的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训。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有，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出在他们之上不可的。文人和一般工人，究竟有点什么区别呢？工友及一般民众，可以吃苦耐劳，难道文士就吃不得苦？耐不得劳了么？

我们的要做文人，是想以自己和众人不同之处，能使它发挥出来；如有力者的去拉车，喜欢冒险者的去探险一样。若是为了易于得物质报酬，或易于成名得利而去做文士，则这一个人，不是呆子，便是奸人，决不是真正的文士。

因这一次的抗战，我国历来的种种封建意识，得能一扫，这是事实。这一次文士的受难，而若能也把一般文人自视过高的习惯改去，则抗战的功德，施及于文士的，也真可以说是“并非浅鲜”了。

并且，正因文人待遇的普遍低薄，赶不上工人舆卒之后，在文士之中，才会产生出意志坚强，不畏艰苦的伟人杰士来；而一些以文学为工具，想藉此以投机取巧的文学商人，才会得视作文士为畏途，而不敢轻易的再去尝试。如鲁迅在遗嘱里戒子万勿作空头文学家之类的箴言，是远不及事实的教训的。

所以，一般社会，对于文人的待遇过薄，我们原要为文人抱不平；但在另一方面，则我们也正在想将许多青年之愿为文人的这一种野望，可能使转向到愿为工业创造者，机器发明者，荒地开辟者，和国家建设者等实务上而去。要而言之，一个空头文学

家，终不如一个裁缝或泥水匠，木匠等实际有一技之长的人来得更可尊敬，是我们的意见。自然，对于真正的文人，我们也想促进社会付以对他所应受的待遇。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

因为世界各地战事的蔓延，到处有火药气味的窒塞，所以去年诺贝尔的和平奖金停给，而文学奖金的受奖者，也因为他本人是一位北欧的作家，不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东方所熟悉的，故而很少有人知道。

去年（一九三九）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弗兰斯·欧米尔·雪尔兰拜（Frans Eemil Sillanpaeae）本来是现代芬兰的一位最大的文学家，于一八八八年，生在芬兰的湖沼区搭伐斯脱兰特的农民的家里。

原来，芬兰的文学，历史并不久远，他们的作家，被欧美各国所介绍传诵的，也并不多；这位今年五十二岁的雪尔兰拜，当然也只是在北欧司干狄那维亚半岛上知名的一个。他的作品，法译的只有两种，一名《清苦》，系叙述一不遇的农民之子，遭受了种种困苦，加入俄国的革命运动，终被枪毙了的一篇阴暗的故事。此外则为一册在海尔辛斯基印行的法译芬兰短篇集里的一篇短篇。英文的译本，从未见过，德译本在希脱勒执政以前，曾有

一二种译本，现在也买不到了。

可是在瑞典，则他的著作，差不多是全部都被译出了的。而诺贝尔奖金受奖的决定者，系瑞典的学士院，所以这一位已经有好几次曾被列名作受奖候补者的雪尔兰拜，去年才终于受到了奖金。

雪尔兰拜，在芬兰文里，是桥头的意思，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家农家，是在一条小河之旁，河上有桥，因以为字。他从小就习熟了农民的生活，小学时代，成绩超群，因而得升入中学；但读不上四年，学资就不继了，于是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就只能权当小学教师，以便积贮些将来入大学的用费。他在大学里所修的课程，先是化学与生物学，后来才稍稍被文学所吸引；而蓄意创作，努力向各杂志新闻的投稿文学作品，却在他因贫辍学，回到了乡下去住下以后。

他的夫人，本来也是农民出身的一个女人，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曾受过海尔辛斯基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目下且是芬兰笔会的会长。

他的作风的特色，是在坚实细致的现实主义，与高迈的理想的交织调和的一点。最有名的小说，还有一部叫作《年少者永逝》。

因为他本身，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以描写农民生活的内容为最普遍，芬兰湖沼海滨区的自然的描写，尤其是他的得意的地方。

芬兰，现在正在受着炮火的洗礼。他的存在，已为世界各国所注意了；逆料不久之后，这一位坚实秀美的作家的作品，将为欧美各国（不久之后，也许为东方各国）所竞译、所传诵的无疑，特先在这里作一个短短的介绍。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艺上的损失

上期《文艺》里，老舍的来信中，曾说到了在重庆以及内地的文协会员和作家们，都穷得不得了；大规模的文章就无法写。即使写了以后，也没有市场，没有发表的地方，没有养活作者的资粮，可以使作者继续地写他的大规模的作品；这是文艺的一大损失。

因此，重庆的文协总部，以及各地的文协分会，都在发起增加稿费运动，要求政府机关，公共团体，有良心的出版业者，新闻杂志事业经营者，都将眼光放远大一点，对写作者予以帮助；使正在走上光明大道去的中国文艺，不致因敌人的摧残，而致中落或中断。

内地的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一般经商或从事筋肉劳动者，自然可以将高生活费，转嫁给他人，而勉强维持过去；独有握笔杆写文章的人，因为著作和思想，不是战时直接需要的固形物质与实际动力，所以他们就没有方法增加他们的价格。而同时，写文章的人的生活，却是和一般人一样地要维持的。

我们在前些时，也曾经说过，文化人应该同一般的穷苦大众一样地吃苦，并没有要求比一般过更优裕生活的权利；可是反过来说，文化人也并不是应该比一般劳苦大众更吃苦的。所以，这一次在新都，在桂林、昆明，以及各战地后方的文化人，所发起的增加稿费运动，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可以解一时的倒悬，而增加我抗日文化的主力。同时，我们更希望在海外的各侨胞所主办的文化事业机关，也能够尽其全力，向国内的文化人致一臂之助。伤兵、难民，原应该救助，落难的文化人，也同样地要救助一下才对。

至于具体的办法呢，则一时很难说，单是消极地送几个捐款去，是无济于事的；当然要想出有持久性的办法来才可以。

譬如，非战地区，或后方的后方的文章市场的开放，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经营等，是一个办法。文学奖金的设定，是一个办法。国内外文化人才调查介绍处的设立，是一个办法。

对于文化人的救助，虽是目前抗战局势紧张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对于将来的建国事业，对于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却是富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悼胞兄曼陀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涨，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

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罢。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象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

入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他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个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看王女士等的演剧

三月五日的晚上，在华侨中学的大礼堂，看了王女士等演出的三出独幕剧，一、是《贼》，二、是《反纳粹》，三、是《放下你的鞭子》。剧情很简单，想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地不再说了。在这里特别想提一提的，就是王女士等演出的高度的成功。

本来演戏的目的，是在感动人；使观众各受到感动，各受到演者所想收到的效果，那这演出就可以说是成了功。不过受感动程度有深浅，观众于接受感动之后，若再能发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一样的一出戏，看了还想去再看，那这剧技的成功，就可以说是到了高度。

现在，若以此准则，来衡量王女士等的这一次的演出，则她们的成功，确已到了话剧所能达到的最高度。

譬如第一出戏的鼓励助赈，描摹敌寇的残暴，这是无论谁演起来，或者都可以成功的。但是对于后方的小资产阶级的那一种不问国事，冷血的思想行动的讽刺，则不是剧艺高超的演员，就很难收到效果了。王女士等的神技，就在这些地方，有他们独特

的色彩，演得恰到好处，一丝一毫，无懈可击，各个演员，都一样的能在同一时间同对一个动作取得调和，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一点。

男主角，在演阔少爷的时候，有阔少爷的好好先生的风度，在演江湖卖艺的老头儿的时候，更一举一动，完全象一老人，这真是此君的天才卓越的地方。我看《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出街头剧，在徐州前线，在国内各地，以及到了马来亚以后，看武汉合唱团及其他剧团所演的，总共总也有了十几次的光景，但仔细比较起来，却觉得以这一次为最出色。

我不在说临时的那些穿插，也不在说王女士的歌声。总之，全剧的一种和洽妥贴的气氛，是王女士他们一剧团最有声色的地方。

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马来亚的固有剧团，无论在化装方面，布景方面，效果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可以使我们满足的程度；这一次王女士他们的出演，我相信一定可以给我们许多刺激，和足资观摩的地方。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因谋保障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

由重庆的文协总会，发起了提高稿费运动，由老舍在《大公报》的一篇提议公布以后，保障作家生活这问题就成为实际运动，而由各方面的当局，出来筹划具体的办法了。

报载日前在重庆，曾由中央社会部的负责者，邀请作家及出版业者，作一次座谈会。结果，是决定了些请政府颁布保障作家的法令，命出版业者忠实支付版税或稿费，集款作贷以救济作家之用等办法。这虽仍是缓不济急的一种官样文章，但比起过去二十几年中，作家生活的简直完全没有被人注意，总要好得多了。以后的作家，我想多少总能得到一点国家或社团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引为遗憾的，就是中央执掌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大权的诸公，何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对这事情，终于不加以一点注意。不切实际的大学、学院，以及作为政治势力背景的文化机关，尽在一个一个的设立起来。开办费、常年经费、基金之类，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在向国库中支取；可是对于一般文化，及普通教育那样有大影响的作家集团，则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

扶助领导的机关存在。教育若只是为几个私人的位置，以及扩张自己私人政治势力之故而兴办的一种事业，那倒也还可说；教育若系为大众，为民族国家的前途着想的事业，那么它的范围决不应该限得这么狭，事业也决不应该做得那么不彻底。

假如以办一个国立什么大学的经费，来经营一所国营出版局的话，那至少至少，就可以培植出几百个著作者，印刷出几万几十万的健全书本来扶助教育；有了这一出版局后，则学校课本，优良作品，高深的科学及学术的著作，就有一统筹统销的机关了。对于宣扬文化，广播文化种子，岂不比空办几个大学，更有力量么？

与作家处在同样的状态之下受苦的，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科学家和学术理论家在那里，这些纯粹从事学理研究的人，我们觉得国家还注意得不够周到。中央研究院、中山文化事业部等，虽也是为此辈而设立的机关，但是如今十余年来，它们的成绩，究在那里？

虽则说是百年树人，文化事业的效果，或不容易立刻显现。但是一事业的当局者，究竟适任与否，却总可以从短期中，分别出来的。我们总觉得官僚万能的现象，在现时的中国还不能够打破。

所以，我们希望中央，以后切不要因敷衍个人之故，而去设立不必要的机关，总须为事业之故而去物色适当的人才对。

因保障作家生活这问题而想起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以过去我国教育的不振，办教育的方针和人物的不对，却是这些感想中的一个中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

自从德国印刷业者约翰内斯·古登白耳希于一四四零年（一说一四五四年）发明了廿六活字的印刷术以来，到今年整整的有了五百年的历史。所以，今年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五世纪纪念的年代，欧洲各国当然都有文字纪念这一位文化传播者的丰功伟德。但在我们东方人的眼里，却以为古登白耳希的发明，并不稀奇。因为欧洲也有考古学家在证说中国人的发明活字，远在古登白耳希之前。这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传自朝鲜，然后由朝鲜再传至欧洲，因而古登白耳希心机一动，就模仿着发明了那可以移动排列的二十六个活字。

总之，不管活字的发明，是否以中国为第一（这事当然是与火药的发明一样地，对世界文化会有绝大贡献），可是自经古登白耳希的廿六活字的印刷发明以后，欧洲的文化，的确起了一个大革命。

第一，因活字排版的《圣经》流通以后，宗教革命的起因，就伏线于此了。

第二，因宗教改革之后，而附带起来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由中世纪的大黑暗时代，一变而为近世的开明时代，其起因也不得不归功于这活字印刷术的应用。

再进一步，由这木刻活字的发明，而到了现代的铅字联排或自动排字机的改进，世界的文化就由启蒙而及于大成了。再说我们的一生，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及至由大学而入社会，差不多无一时期离得了印刷品的应用。近代文化人的每日食粮中最重要的报纸，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营养的血液。至于宣传战的纸张，且一致被认为比子弹炮弹更为有效，更必须的东西了。

所以，印刷术的有助于文化，有益于人类，是如此如此。而一个最滑稽的现象，却是到了这一个时代，与古登白耳希同样地在德国，还有一个人名希脱勒者，在开倒车，烧书报，逐学者，打算以炮火来代替书册。

这一个活生生的讽刺，英法两国的写作人都在当作了好材料，而赶写滑稽有趣的文章。实实在在，古登白耳希若在他的故乡的曼恩兹地方，要立一纪念铜像的话，则那位蓄有卓别林小胡髭的油漆匠，应该被铸成一个铁像，跪在他的像前，如汪逆铁像在总理像前的一样。

最后，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古登白耳希氏的简短历史于此。约翰内斯·古登白耳希，于一三九八年生于德国的曼恩兹，卒于一四六八年。曾与约翰·富世脱合股，经营印刷事业。后因亏折，两人间曾发生过讼事。古登白耳希其他的事迹不详，由其所发明之活字印行的书籍，著名者有三十六行之《圣经》，与四十二行之《圣经》（即世所称之《麦查兰圣经》）。这两种《圣经》的犊皮纸本，在一八七三年代，每册的价钱，曾有过三千四百镑的纪

录。还有一种拉丁字典，名《加沙力贡》者，初版本在一九二〇年竞卖，一册曾售至九百六十镑云。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印人张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已也说："每当工作时，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讲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次，或者会负张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购印助赈者不如荷属各地那样的踊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这一点一艺报国的热心，却可不问助赈的成绩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战争中，领导我们作战的首领，与卫国捐躯的大小无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几角几分，来捐输国家的一无名苦力，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所占的是同样的地位。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传与不传，就可以从此地来下断语。

在这里过事夸扬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只想把张先生的艺，和他的那一颗赤诚的心，介绍给星洲爱好篆刻的同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

本月廿一晚，晨光社为协助“回教徒募药救济中国难民”之故，试演独幕剧《重逢》，剧中演员秦璧（《新国民日报》记者），与徐绵（南洋女中生）为忠于原作剧意起见，实行接吻，本系应有之动作。但听说外间颇有卫道之徒对此在提出抗议，似乎在说演员不应该有此等举动等话。这一种陈腐的见解，还能在开明的现代听到，我却以为是一奇事。

当然，在历史上，象这一种守旧的时代，不能说是没有。譬如英国当克林威尔执政的时候，一般热情的清教徒，就根本以戏剧为罪恶，不准看戏，当然是清教徒的戒律之一，甚至当时国内政府，还颁发命令不准演戏。若在这一时代，有人出来主张反对男女同席，或主张男女不准在同一屋顶下住宿，当然也不会被社会所嗤笑，因为固执不通，就是那一时代的特征。

至于现代呢？大家都晓得，是注重于现实的时代了，一切迷信，和没有事实根据的精神信条，都应该被淘汰了；尤其是在经过了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洗礼以后的艺术界。

当反映现实的近代剧，初次自欧洲翻译过来，在上海北平等

大都市里上演的时候（五四时代），关于这一个问题，也曾有人提出过。记得有一次，在北平中央公园开会，席上也曾有人提出了这一个问题，有一位卫道的老先生，曾说起中国是礼义之邦，在舞台上不该有此夷狄之行。所以，他主张，以打躬作揖，即男女两演员相对作一个长揖，来代替接吻。他这主张，终于只成了一个笑料，一直传下来活跃在当时出席的人的脑里。

我们试想想，以穿西装，说近代话的一对男女，到了热情激发，势不可遏的时候，要想表现出他们两人热爱之情时，若忽而各自站开，相对而作一恭恭敬敬的长揖，这场面还成为剧的场面么？若系故意开玩笑的滑稽剧，那倒还可以说；若系写实的社会剧，则这一场面，当然是无从说起了。

又有人，从医学的见解立言，说男女演员的实行接吻，恐有碍卫生。这说，似乎比卫道之言，较近理些；但我们以常识来下判断，既然是立在舞台上演剧的同人，则其中决不会有肺病三期，或梅毒麻疯上脸的演员，是必然的事实。所以从病的传染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认为可能性非常之少。若说接吻是可以传染疾病，则握手也何尝不可以传染。苟从医生的种种预防条规来说话，则我们恐怕要弄到头戴防毒面具，身穿潜水衣服，才能到公共场所去露脸的地步。

总之，我们的意见，是“对艺术，须忠实到底”；若要卫道，应该从新的道德观点来说话。譬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信条，一切的评语，都应从这一立场出发才对。艺术与道德，根本是不冲突的；不过时间与空间有不同，道德的观点，亦应随时随地作演进而已。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塞上风光》之演出

阳翰笙君的剧本《塞上风光》，我还不曾读过，所以原剧与舞台台本的出入，我不能说。但从这一次王莹女士的演出看来，则这剧本确也是适合时代的剧本之一。关于剧情等事，读者想已是熟悉的，在这里，可以不谈。现在先从布景说起。

第一幕的沙漠地，第二幕的蒙古包内的样子，第三幕的丁世雄流亡之家，第四幕的倭人特务机关的地下室，都是伟大完善，在新加坡各话剧团的布景装置（舞台装饰）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的记录。

其次，说到饰金花的王莹女士，及饰丁世雄的赵洵先生，是剧坛已有定评的前进艺术家：有思想，有学问，有魄力，有天才，更有那一副清爽干脆的说词口音；当然是演无论那一个角色，都是有精采的，此地也无庸赘说。

柯刚小姐的金花之母，也演得恰到好处，此君之演老太太，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专技。上次叶平玉先生，曾盛赞过她在华中演《贼》时的媳娘老旦之唯妙唯肖，现在改演蒙古老婆婆，当然也超

凡绝俗，令观众发生好感。饰迪鲁瓦的演员，台词的粗悍雄壮，大合身份。但体格似嫌瘦削一点，这是天定事实，非此公之罪也。

观众一般的意见，大家对济克扬的台词缓慢，都觉得是美中不足。当他饰喇嘛僧时的那种缓慢口词，或者可以说是在故示庄严，但到了第四幕显了特务工作首领的原形以后，还是那一种说法，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大自然。

其次如饰郎桑的，演柳德三的，以及其他的配角，都还不弱。总之，王莹女士及其一伙的演员，各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话剧坛上，是可以树起一帜的了。并非捧场，谨贡浅见而已。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新闻”版

说国产影片中的插入歌曲

从前在国内，很少去看国产影片，但这回到了南洋，不知是否为怀乡病所驱使，就时时去看国产国语的影片。我们的国产影片，在近几年来，尤其是抗战以来，的确是有了绝大的进步。当然那些麻醉民众，广播毒素的神怪，色情国产片，也同时在南洋阔步；但一般比较有名的大公司的出品，到底是渐渐地走向了前进的一方；这无论从文化上，或从国家民族的前提上着想，当然都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不过，美中不足，在事事进步的中间，我总觉得还有一点很幼稚可笑的病根，没有除去；那就是在每一个国产影片里总要插入一处或多处的歌唱场面的一点，仿佛是影片里没有一曲歌，就不成其为影片；女明星不唱一支曲，就不成其为女明星似的。所以，近来的国产影片中，几乎是随时随地，都有几曲歌在唱着，不问情节，不管前后的气脉，女明星总要在故事进行中唱一曲歌；譬如，吃饭之歌，洗面之曲，或洗澡有感之类的歌就是。

本来在有声影片里，插入一点歌曲，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要插

入得自然，不致引起观众对那故事情节的幻灭才行。譬如霸王别姬，酒酣泣下，而虞姬引吭一声，自然能激起观众的哀感。但若在一般的忧伤场面里，忽然来弹一曲琴，唱一只歌，如孤哀子哭父之歌之类，岂不反会使人失笑？我曾见过以美国诗人郎弗罗的那首长诗《希亚华绥》所演成的影片，中有女主人公坐在独木舟上，悲啼婉唱，一路去寻觅她的情人的一幕，这中间的歌曲，真插入得恰到好处。

中国近时所出的影片中，所插入的歌曲，我以为《七重天》里的那一段，却很自然；但如《文素臣》第一集里，当那位乡宦之女，在病中对文素臣所唱的那一段，就有点觉得不对了。

总之，有声影片中，插入歌曲，第一，要使有助于剧情；第二，也要使观众不至于感到"这是做作"，"事实上是不会在这一个时候唱起曲来"的感想才对。有声影片，并不是张张都要有一个唱曲的场面的，譬如最近的《魂归离恨天》里，它并没有魂归之歌，或离恨之曲。但这影片，我却以为摄制得很好。对国产影片的各大导演，谨贡这一点愚见，希望他们能够采择改良。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左拉诞生百年纪念

本年四月二日，是自然主义开山始祖，法国大写实作家左拉，在巴黎诞生的百年纪念日；法国各地，虽则在烽烟满目之际，也都大大地举行了纪念会，及出版了纪念刊等等。

左拉的出生地的恰巧，同他逝世地的奇特一样，是为一般人所预想不到的。他的父母，本是马赛北部，泊鲁瓦斯的"哀"地方人，但正当他们在巴黎旅行之中，便生下了他。而他的死去，却因德雷非斯事件，他不得不亡命到英国，在旅居中，因为房间中装置的煤气管不闭，被煤气窒息而致死（一九〇二年）。

左拉的大小说，大家都知道，是描写法国第二帝制时代的社会各方面动态的那部《罗贡——玛咯尔家》的世系叙传小说集，但他在欧洲各国的妇孺口上所传说的，却并不是他的三十余册的著作，而是他为正义而斗争，替一犹太军官德雷非斯辩诬的那一件事情。

诚然，他的作为一文学家的伟大，作为一世界文豪的伟大，还不及嚣俄、拉马尔丁，或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因为他并不为我们造成一个典型的人物。但是他的摘发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热

爱正义人道的诚挚与坚忍，改良社会的志望的迫切，除表现在他的三部以都会命名的小说，及未完成的《四福音》小说（只成了《果实》、《劳作》、《真理》的三部，还有一部《正义》未成）中的全部思想之外，还有那最切实的替德雷非斯辩诬的一件具体事实，在那里作证明。

他实在是一位具有绝大毅力的理想家，虽则他所提倡的，是反对想象，注重实验的学说。到了晚年，他自己也在承认，他仍是没有脱除浪漫主义的一个写作家。到了他实验主义成熟，浪漫主义几几脱尽时的那三部《四福音》小说写成之日，他的精神力已经交瘁，那三部大作，却成为干燥无味的作品了。

左拉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和一般文学家的伟大却有点不同。伟大的，是他的理想，是他的一生的毅力。光凭这一种对未来光明的努力追求，和正义人道的拼死的主张上看来，我们就可以证实拉丁民族，是决不会灭亡的民族。

现在的欧战，虽则一时似乎对英法有点不大顺利；但我相信最后胜利，必在主张正义人道的一方面。纳粹疯犬决不能征服全欧，同倭寇的决不能征服我中国一样。

当这一位大作家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我们虽则为时已迟了一月，但仍想遥遥呈献我们对那正在奋斗中的民族，以最大的敬意。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 我 之 间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

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息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久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真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

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

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

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覆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一、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嘉陵江上传书

语堂兄：前几天接你五月廿一日飞渝前所发函。吾兄此行，当可得许多材料，重出新书；唯招弟去同住一层，心虽向往，但事实上恐不易做到。因第一，重庆友人极多，在这一个家破人亡的时候，再去和许多旧交相见，心中必至倍觉难过。第二，则因弟平日之友人，主张行动，似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旧同事如雪艇、骝先等，“白首相知犹按剑”，至如立夫先生辈，更不必说矣。我们现在正如生长在后母手中之子，当外患频来之日，势不得不立于不便后母生疑地位，协力合作，以抵御外侮，共救危亡耳。

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闻沪上滥译者群，早已动员多人，分头赶译完了。但最近因纸价高涨，能出此巨书之书店很少，是以滥译虽成，而出书则仍无办法也。（此系由沪来星之友人所告者。）

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

误，至流为社会害虫，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吾兄亦将笑我为宋襄之仁否？

最近在星洲看到《随风而逝》之影片，当然颜色也好，女主角费味安·莱的演出也好，但我以为此片失败之处，在不经济，与历史气氛的嗅觉不到，与一般大众趣味，恐不能吻合。因此影片而想到《瞬息京华》，若中国有一资本充裕之制片公司，来将它搬上银幕，成绩恐会比这片更加好些。

此书到达重庆，想将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可排就矣。百忙中草此作覆，敬祝你全家康健，亦祝我抗战前途，再进一步。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六甲记游

为想把满身的战时尘滓暂时洗刷一下，同时，又可以把个人的神经，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公的私的积累清算一下之故，毫无踌躇，飘飘然驶入了南海的热带圈内，如醉如痴，如在一个连续的梦游病里，浑浑然过去的日子，好象是很久很久了，又好象是只有一日一夜的样子。实在是，在长年如盛夏，四季不分明的南洋过活，记忆力只会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尤其是关于时日年岁的记忆，尤其是当踏上了一定的程序工作之后的精神劳动者的记忆。

某年月日，为替一爱国团体上演《原野》而揭幕之故，坐了一夜的火车，从新加坡到了吉隆坡。在卧车里鼾睡了一夜，醒转来的时候，填塞在左右的，依旧是不断的树胶园，满目的青草地，与在强烈的日光里反射着殷红色的墙瓦的小洋房。

揭幕礼行后，看戏看到了午夜，在李旺记酒家吃了一次朱植生先生特为筹设的宵夜筵席之后，南方的白夜，也冷悄悄的酿成了一味秋意；原因是由于一阵豪雨，把路上的闲人，尽催归了梦

里，把街灯的玻璃罩，也洗涤成了水样的澄清。倦游人的深夜的悲哀，忽而从驶回逆旅的汽车窗里，露了露面，仿佛是在很远很远的异国，偶尔见到了一个不甚熟悉的同坐过一次飞机或火车的偕行伙伴。这一种感觉，已经有好久好久不曾尝到了，这是一种在深夜当游倦后的哀思啊！

第二天一早起来，因有友人去马六甲之便，就一道坐上汽车，向南偏西，上山下岭，尽在树胶园椰子林的中间打圈圈，一直到过了丹平的关卡以后，样子却有点不同了。同模形似地精巧玲珑的马来人亚答屋的住宅，配合上各种不同的椰子树的阴影，有独木的小桥，有颈项上长着双峰的牛车，还有负载着重荷，在小山坳密林下来去的原始马来人的远景，这些点缀，分明在告诉我，是在南洋的山野里旅行。但偶一转向，车驶入了平原，则又天空开展，水田里的稻秆青葱，田塍树影下，还有一二皮肤黝黑的农夫在默默地休息，这又象是在故国江南的旷野，正当五六月耕耘方起劲的时候。

到了马六甲，去海滨"彭大希利"的莱斯脱·好坞斯（Rest House）去休息了一下，以后，就是参观古迹的行程了。导我们的先路的，是由何葆仁先生替我们去邀来的陈应桢、李君侠、胡健人等几位先生。

我们的路线，是从马六甲河西岸海滨的华侨银行出发，打从圣弗兰雪斯教堂的门前经过，先向市政厅所在的圣保罗山，亦叫作升旗山的古圣保罗教堂的废墟去致敬的。

这一块周围仅有七百二十英里方的马六甲市，在历史上，传说上，却是马来半岛，或者也许是南洋群岛中最古的地方，是在好久以前，就听人家说过的。第一，马六甲的这一个马来名字的

由来，据说就是在十四世纪中叶，当新加坡的马来人，被爪哇西来的外人所侵略，酋长斯干达夏率领群众避至此地，息树荫下，偶问旁人以此树何名，人以“马六甲”对，于是这地方的名字，就从此定下了。而这一株有五六百年高寿的马六甲树，到现在也还婆娑独立在圣保罗的山下那一个旧式栈桥接岸的海滨。枝叶纷披，这树所覆的荫处，倒确有一连以上的士兵可以割营。

此外，则关于马六甲这名字的由来，还有酋长见犬鹿相斗，犬反被鹿伤的传说；另一说，则谓马六甲系爪哇语“亡命”之意，或谓系爪哇人称巨港之音，巫来由即马六甲之变音。

这些倒还并不相干，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想去瞻仰瞻仰那些古时遗下来的建筑物，和现时所看得到的风景之类；所以一过马六甲河，看见了那座古色苍然的荷兰式的市政厅的大门，就有点觉得在和数世纪前的彭祖老人说话了。

这一座门，尽以很坚强的砖瓦垒成，象低低的一个城门洞的样子；洞上一层，是施有雕刻的长方石壁，再上面，却是一个小小的钟楼似的塔顶。

在这里，又不得不简叙一叙马六甲的史实了，第一，这里当然是从新加坡西来的马来人所开辟的世界，这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的事情。在这先头，从宋代的中国册籍（《诸藩志》）里，虽可以见到巨港王国的繁荣，但马六甲这一名，却未被发见。到了明朝，郑和下南洋的前后，马六甲就在中国书籍上渐渐知名了，这是十四世纪末叶的事情。在十六世纪初年，葡萄牙人第奥义·洛泊斯特·色开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领五艘海船到此通商，当为马六甲和西欧交通的开始时期。一千五百十一年，马六甲被亚儿封所·达儿勃开儿克(Alfonso d' Albuquerque)所征

服以后，南洋群岛就成了葡萄牙人独占的市场。其后荷兰继起，一千六百四十一年，马六甲便归入了荷人的掌握；现在所遗留的马六甲的史迹，以荷兰人的建筑物及墓碑为最多的原因，实在因为荷兰人在这里曾有过一百多年繁荣的历史的缘故。一七九五年，当拿破仑战争未息之前，马六甲管辖权移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八一五年，因维也纳条约的结果，旧地复归还了荷属，等一八二四年的伦敦会议以后，英国终以苏门答腊和荷兰换回了这马六甲的治权。

关于马六甲的这一段短短的历史，简叙起来，也不过数百字的光景，可是这中间的杀伐流血，以及无名英雄的为国捐躯，为公殉义的伟烈丰功，又有谁能够仔细说得尽哩！

所以，圣保罗山下的市政厅大门，现在还有人在叫作“斯泰脱呼斯”的大门的，“斯泰脱呼斯”者，就是荷兰文 Stadt-Huys 的遗音，也就是英文 Town-House 或 City-House 的意思。

我们从市政厅的前门绕过，穿过图书馆的二楼，上阅兵台，到了旧圣保罗教堂的废墟门外的时候，前面那望楼上的旗帜已经在收下来了，正是太阳平西，将近午后四点钟的样子。伟大的圣保罗教堂，就单单只看了它的颓垣残垒，也可以想见得到当日的壮丽堂皇。迄今四五百年，雨打风吹，有几处早已没有了屋顶，但是周围的墙壁，以及正殿中上一层的石屋顶，仍旧是屹然不动，有泰山磐石般的外貌。我想起了三宝公到此地时的这周围的景象，我又想起了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到现在被强邻压境，弄得半壁江山，尽染上腥污，大半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国民太无冒险心，国家太无深谋远虑的弱点之上。

市政厅的建筑全部，以及这圣保罗山的废墟，听说都由马六甲的史迹保存会的建议，请政府用意保护着的；所以直到了数百年后的今日，我们还见得到当时的荷兰式的房屋，以及圣保罗教堂里的一个上面盖有小方格铁板的石穴。这石穴的由来，就因十六世纪中叶的圣芳济（St. Famcis Xavier）去中国传教，中途病故，遗体于运往卧亚（Goa）之前，曾在此穴内埋葬过五个月（一五五三年三月至同年八月）的因缘。废墟的前后，尽是坟茔，而且在这废墟的堂上，圣芳济遗体虚穴的周围，也陈列着许多四五百年以前的墓碑。墓碑之中，以荷兰文的碑铭为最多，其间也还有一两块葡萄牙文的墓碑在哩！

参观了这圣保罗山以后，我们的车就遵行着"彭大希利"的大道，驰向了东面圣约翰山的故垒。这山头的故垒，还是葡萄牙人的建筑，炮口向内，用意分明是防止本地土人的袭击的。炮垒中的堑壕坚强如故；听说还有一条地道，可以从这山顶通行到海边福脱路的旧垒门边。这时候夕阳的残照，把海水染得浓蓝，把这一座故垒，晒得赭黑，我独立在雉堞的缺处，向东面远眺了一回马来亚南部最高的一支远山，就也默默地想起了萨雁门的那一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金陵怀古》之词。

从圣约翰山下来，向南洋最有名的那一个飞机型的新式病院前的武极巴拉（Bukit Palah）山下经过，赶上青云亭的坟山，去向三宝殿致敬的时候，平地上已经见不到阳光了。

三宝殿在青云亭坟山三宝山的西北麓，门朝东北，门前有几棵红豆大树作旗樟。殿后有三宝井，听说井水甘冽，可以愈疾病，市民不远千里，都来灌取。坟山中的古墓，有皇明碑纪的，据说现尚存有两穴。但我所见到的却是坟山北麓，离三宝殿约有数百步

远的一穴黄氏的古茔。碑文记有“显考维弘黄公，妣寿姐谢氏墓，皇明壬戌仲冬谷旦，孝男黄子、黄辰同立”字样，自然是三百年以前，我们同胞的开荒远祖了。

晚上，在何葆仁先生的招待席散以后，我们又上中国在南洋最古的一间佛庙青云亭去参拜了一回。青云亭是明末遗民，逃来南洋，以帮会势力而扶植侨民利益的最古的一所公共建筑物。这庙的后进，有一神殿，供着两位明代衣冠，发须楚楚的塑像，长生禄位牌上，记有开基甲国的甲必丹芳杨郑公及继理宏业的甲必丹君常李公的名字；在这庙的旁边一间碑亭里，听说还有两块石碑树立在那里，是记这两公的英伟事迹的，但因为暗夜无灯，终于没有拜读的机会。

走马看花，马六甲的五百年的古迹，总算匆匆地在半天之内看完了。于走回旅舍之前，又从歪斜得如中国街巷一样的一条娘惹街头经过，在昏黄的电灯底下谈着走着，简直使人感觉到不象是在异邦飘泊的样子。马六甲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一座古城，尤其是从我们中国人看来。

回旅舍冲过了凉，含着纸烟，躺在回廊的藤椅上举头在望海角天空处的时候，从星光里，忽而得着了一个奇想。譬如说吧，正当这一个时候，旅舍的侍者，可以拿一个名刺，带领一个人进来访我。我们中间可以展开一次上下古今的长谈。长谈里，可以有未经人道的史实，可以有悲壮的英雄抗敌的故事，还可以有缠绵哀艳的情史。于送这一位不识之客去后，看看手表，当在午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倘再回忆一下这一位怪客的谈吐、装饰，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现代的人。再寻他的名片，也许会寻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若问侍者以昨晚你带来见我的那位客人（可以是我们的

同胞，也可以是穿着传教师西装的外国人），究竟是谁？侍者们都可以一致否认，说并没有这一回事。这岂不是一篇绝好的小说么？这小说的题目，并且也是现成的，就叫作《古城夜话》或《马六甲夜话》，岂不是就可以了么？

我想着想着，抽尽了好几枝烟卷，终于被海风所诱拂，沉入到忘我的梦里去了。第二天的下午，同样的在柏油大道上飞驰了半天，在麻坡与峇株巴辖过了两渡，当黄昏的阴影盖上柔佛长堤桥面的时候，我又重回到了新加坡的市内。《马六甲夜话》、《古城夜话》，这一篇 Imaginary Conversations——幻想中的对话录，我想总有一天会把它纪叙出来。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七、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英法的文坛近事

一，法国的诗人们，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大战期内，也不停止他们的努力，可由本年三月出的那一册《二月诗刊》中看出来。这诗刊系由坡埃儿·西哀编印，每两月出一册，所载的，都是披甲胄的诗人的诗，西哀本人，就是一个现役军人。该诗刊每期的第一篇诗，系为对上次欧战的从军诗人示敬起见，必载上次欧战中的诗人之诗一篇；其后则载录现在正在从事作保卫祖国的诗人之诗。三月出版的那册诗刊的第一首诗，是美国诗人之在上次从军的亚兰·西该的译诗，他是在一九一六年殉职的。这次的诗刊，未到，第一首诗闻将译载上次大战中殉难的英国诗人之作云。

二，自然主义盛行时之法国大小说家都德，本年为其诞生百年纪念期；但他的未亡人都德夫人，却于本年四月中逝世了。她本名由利·亚拉，亦为一散文名家，所写的文艺批评论文极多。笔名为卡儿·司汀，生于一八四七年，于一八七六年嫁都德，生子三人，莱翁·都德即系其子，现亦已成法保皇党首领，文名亦已满全欧，他所作文艺批评集，及小说之类，都已有英译本了。

三，汤麦斯·哈代之诞生百年纪念，近亦在其故里陶猎斯泰盛大举行，哈代博物馆曾于是日开放一日，使大众得自由参观。此博物馆之一室，系完全照哈代生前从事工作之一室，而模制成的。该馆系于去年夏季成立，由桂冠诗人美斯菲儿行揭幕礼的。

四，英国诗人之祖乔叟，今年为其诞生六百年纪念之期。英法两国，各举行盛大的纪念，因为他系承受法国诗歌熏育，而开始创造英国诗歌之第一人，是沟通英法两国文化之第一条桥梁。他的大著《坎泰培利异谈录》，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部，于今年出了一部八大册的最完美的详订本，系由约翰·曼利教授，与爱迭司·立该脱女士编订者，但可惜立该脱女士为编订此书，心力交瘁，已不及见此书的出版而逝世了。

同时墨斯哥之中央国立图书馆外国文学部，也曾开了一次乔叟著作版本展览会。而《坎泰培利异谈录》之俄文全译本，亦将由苏联国立文艺出版局印行以问世。担任俄文翻译者，为嘉须金及罗美两人；盖在俄国，一向是只有节译本在流行，向无全译本之故。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

新中国剧团，最近在星洲成立了。赵洵先生，王莹女士，以及其他各位演员，大抵都是艺坛素负盛誉的干才，在此地可以不必再事介绍；而他们的目的，是在敦睦中英邦交，援助祖国抗战中的伤兵难民，更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

这一次他们组织剧团以后的成绩，也将公开表演在大家的面前，我更可以不必事先为他们吹捧。在这里所不能已于一言的，就是希望我们各地的侨胞，能多多予以援助，如从前的对武汉合唱团一样，务使他们能够收到预期以上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抗战建国成功的先声。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图书馆与学者

图书馆在大众教育上的重要意义，是一般人都明白的，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说；图书馆对于专门学者的贡献，尤其是不少的一点，却往往为人所忽视。

先让我来举一个例。英国十九世纪的大作家乔其·葛辛，他始终对伦敦有着热切的眷恋；但一按他所以要眷恋伦敦的原因哩，却完全是为了那图书馆。

他晚年因为婚姻之故，去法国南部作暂时的寓公，但当时他正在着手写一部罗马时代的小说。他在法国常常写信给住在伦敦的朋友，要求他上图书馆去调查这些，调查那些，好做他那一部大著的材料。后来这部大著还没有终结，而他已经去世了；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这部大著，还是他的未完之作。这是从事文学的专家，不得不求助于图书馆的一个好例。

此外，则史学家、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各种专门学者，出身大抵是贫寒者居多，他们对于图书馆所给与他们的益处，往往在晚年的自传回忆录里述说得很详细，在这里，当然是抄不胜抄。

以这些史实为根据，而来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则星加坡一地，华侨之亟宜筹设一公共图书馆的事情，实在是刻不容缓的要图。现在，这事情，已经由六六社发起进行筹设了，在这里特将他们征求发起人公函的缘起重抄一遍，希望这一件侨界的文化巨业，能够有很好很快的成功。

夫公共图书馆，大众精神食粮之供给所也。其影响所及，大如人类社会文化之提高，小如个人学问等之修养，价值之大，识者类能言之。时至今日，世界现状，瞬倏万变，科学智识日新月异，大众之所需公共图书馆者，尤为迫切。欧美文明国家之稍具繁荣小城镇，苟无一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则鲜有不被视为落后者，其故在此。

星洲为南洋文化、经济之总枢纽，住有华侨五十余万，人数为南洋各属之冠。公共图书馆之亟宜设立，除上述理由外，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下列四点：

（一）居廿世纪之今日，商场斗争，可谓登峰造极，当夫运筹决策之时，其所需乎经济、科学智识之程度，与昔大相悬殊。星洲为南洋侨胞经济活动之中心，苟无大规模公共图书馆之设立，以网罗中外各种详确之情报与专门著作，供侨胞之参考，又焉足以维持已往经济上优越之地位者哉！

（二）星洲地方虽大，人口虽多，惟可供青年高尚娱乐之场所者，竟如凤毛麟角。一般青年子弟，不知如何利用其空闲时间，以作有益身心之修养，而误入歧途者比比皆是，危险殊甚。

（三）迩来星期休业至为普遍，店员一週假日，无所事事，难免浪费光阴，或作不正当之娱乐，不无可惜。

（四）自我民族复兴以后，星洲文化水准，因之渐次提高，

有志作高深研究者颇不乏人，惟苦无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进修极觉困难，是诚国族文化上之一大损失。总此数因，星洲华人公共图书馆之宜早日促其实现，已彰彰明甚。同人有鉴及此，不揣冒昧，爰敢出而提倡。愿与赞助诸公，共策进行焉。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文 人 的 团 结

老舍先生自重庆来书，曾说起了国内文人已经如何地坚强团结起来。他并告我们在海外的文化工作者，也应该认清敌人，把力量集中起来，齐向着这一个共同的目标拚去。

同时，我驻马来亚的高总领事，也发表了通告，揭穿汉奸辈正在煽惑侨胞，附和汪伪等反英，意图破坏我们的团结，破坏我们的筹赈等阴谋。

到了现在，我们还要来说团结，还要来对民族中的败类的阴谋，不得不谆谆告诫，说起来实在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不过事实俱在，这一批蓄意破坏我们的团结，甘心将我们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卖的无耻之徒，正在日夜进行他们的工作，教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为之隐讳。

而在这一批歹徒的中间，竟也有号称文化人者参杂其间，以前进为煽惑的招牌，以攻击个人，为自己成名的手段，那就更加不得不令人伤心气馁了。

事到如今，我们别的话，实在也可以不必再讲，根本的认

识，就只有两个，就是我们要做自由独立的中国人呢？还是要做卑鄙无耻的汉奸走狗？我们假如要做自由独立的中国人的话，那现在我们的敌人，就只有一个，就是侵略我们的日本法西斯蒂。先明乎此，则我们的行动路线，也只有一条：就是来用如何的方法，尽如何的力量，去打倒这一个唯一的敌人。

文人的本分，当然是在宣传，宣传的主旨，自然也很简单，就是要教人能够分出谁是敌，谁是友，以及用什么方法去打倒敌人。某人的声望或比我大一点，某人的地位比我高一点，或某人的收入及资产比我丰裕一点，所以我的目的，我的全力，就非要先全用在打倒这某人的一点上不可，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问，这就是汉奸的论调，也就是汉奸的行动。

说到文人的团结，实在比一般人的团结并没有两样，只教能把我们的私心，把我们个人的名利观念，完全撇开，那团结便自然不成问题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看《永定河畔》的演出

田汉的这剧本，我虽则还没有读过，但听说几次上演的成绩都很好。这一次，又经过赵洵先生的改编，和诸位热心赞助者的客串参加，他们不但出了力，并且还出了钱，以此热忱来演这戏，自然成绩是决不会坏的。

这剧的内容，演出的成功，以及观众的受感动，前昨两天，各报都已有了很详细的介绍和批评，我今天看了，觉得此外也不必更说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我在此地看国语话剧时，常常感到的，就是当地的侨胞，可惜对国语还不十分普遍地能懂能欣赏。

有一位女同志，曾教我为她们姊妹三人写一剧本。她说，她们三姊妹想来演一次筹赈的话剧，这剧本要写得简单，三人就可以演出，对话要短些，浅近些，使人听了大家都能够懂得。这一位女同志，虽则不是演剧的专家，但她的这一个定做剧本的尺寸，却实实在在地道破了这里的一般观众的国语程度。

其次，是这里的舞台设备的不周全，这一出《永定河畔》，幸亏赵先生能设法，使永定河上的桥立体化了，使剧中群众都有了

插足之地，否则恐怕全星加坡没有第二个剧场，能适合于这剧本的上演。虽然是经过了赵先生的这一番苦心，仍能得到这样好的成绩，但有几处在桥脚下的演员，当他们作对话时，四面的观众，还是听不出来，这当然是舞台扩音机装置得不周之所致。

对这剧本的话，别的不想再说了，使我感慨无量的，却是"芦沟晓月"这一旧日游过的胜地的回想，还有当日同游的胞兄，已经也为了国家民族而殉了难了。

再回想到当年同在一处玩，一处闹的原剧的作者田汉，近来头发也白了，看小字剧本的时候，还要一双老花眼镜的帮助，因为有两女友在旁一道看戏，所以感伤老病勉强抑制了下去，否则恐怕伤时之泪，要和伤逝之泪，夹流在一道，滔滔而成一大泛滥局面，也说不定。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星洲日报·本坡新闻（一）》

推荐八百壮士影片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抵死奋斗的一段史迹，是我大中华民国民族魂的不朽的纪念碑。在世界史上，要求一个差不多可与此事比比的史实，只有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据守提莫壁垒由“来奥尼达斯”所率领的三百斯巴达的勇士，和卡赛奇在汉尼罢儿将军领导下的对罗马人的抵抗，才可以说说。

而我国抗战初期的这一段悲壮的史迹，现在却由军委会摄成了影片，在应云卫的导演之下，由袁牧之、陈波儿两位演员活生生地表现在银幕上了。

这影片的价值，是不可以和好莱坞或英德诸制片厂，在和平空气里所创制出来的诸种幻想的战事影片来相提并论的，因为一方面的作品，是技巧的搬弄，和科学的运用，而另一方面的作品，却是事实的再现，和血泪的结晶。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谢晋元团长的如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八百壮士们的拼死的决心；我们在这里更可以看到女童子军杨惠敏女士冒水火去献旗的英姿，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

到欧美各国的新闻记者和守军们对我们诸壮士的关心与同情。

凡看到了这一幕壮史，而不想奋身杀敌，和寇兵拼一个你死我活的，决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若看到了此片，而仍在过醉生梦死的生活的，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现在我们的抗战已将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了；侵略国家在无可奈何的窘状下，虽已结成了三国联盟的阵线，来摧残世界上凡拥护和平正义的国家，但日落虞渊，它们的覆没之期，已在目前。在这抗战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为激励我们的志气，坚定我们的信念，尤其不得不以八百壮士的孤军苦斗，来作我们的模范。我所以敢推荐这一个影片，希望我黄帝的子孙，都能一看此片，而来尽他们或她们对国家民族所应尽的责任。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版

悼诗人冯蕉衣

诗人冯蕉衣，和我本来是不认得的，到了星洲之后，他时常在《晨星》栏投稿，我也觉得他的诗富于热情，不过修辞似乎太过于堆砌。所以他投来的稿，我有时候也为他略改，有时候，就一字不易地为他发表。

经过了几月，他就时时来看我，我曾当面向他指出许多他的缺点。他听了之后，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来，他的诗和散文，我觉得已经进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诉我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说是待遇虽薄，但生活却安定了一点。过了半年，他又来看我，说是失业了。我也曾为他留过意，介绍过一个地方，但终因环境不佳，那个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后他就一直的过着失业的生活，受尽了社会的虐待，这可从他最近的诗和散文中看出来。

我前月因脚痛不能行走的时候，曾托他为我上报馆来代过几天发稿看大版之劳。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来谈过许多闲天。但当双十节的晚上，王修慧君忽于深夜跑到报馆

来告我以冯君的死耗的时候，我真疑他是在说谎。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亲自送他入殓，亦曾亲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抛了最后饯别的一块土。

冯君当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他系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

他还是一个纯真的人，没有染上社会腐化的恶习。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忠实的抒情诗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许他活，恶社会不许他活，致使这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诗人，不得不饮泣吞声，长怀冤恨于地下。我们若想为冯君出气，若想为和冯君一样的诗人们谋出路，则第一当然要从打倒侵略者，与改良社会的两件工作来下手。

至于冯君的生平行事，和状貌言行，则有其他的许多知道他得更详细的人，在各自的文字里略说了，我可以不赘。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紫罗兰女士，就在广州登台唱粤曲了；那时候的她，总还不过是八九岁的一个孩子，圆圆的面孔，灵活的眼睛，清脆的喉咙。在当时，她正是革命源地中一般爱听歌曲者的小偶像，她每每于革命纪念日，或盛大庆祝会开会的时候，登台助兴，唱些有革命性或文艺性的粤曲。在台下听的人，也大抵总是文化机关党政机关，或服役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人物，如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各军军长，黄埔军校的初数期的教官与学生，以及各级党部的青年革命家等，都是她的爱护者。

那时候，我们的几位朋友，也同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里任教职，于白天教课或开会——当时的会，也实在真多——之余，自然也时时去倾听她的歌唱。虽然，粤语是我们这些外江佬所不懂，而粤曲的咿呀奥唉，也不是我们这些音乐门外汉所了解的。总之，紫罗兰小姐的名字，在当时已经喧传在五羊城里了。

其后的沧桑变革，真象是一部《廿五史》，不知道要从那里谈

起，乱丝一团，愈理只会得愈岐，倒还是不说的好。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这一次抗日军兴，与这一九四一胜利年的到来，按之时日，这只有仅仅十五六个年头。然而这中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激变，真可以说是从来历史上所罕有。

试想想在这样的一段的年月，与一重变易之后，远在长年如夏的这热带岛上，又忽漫相逢，而重见到了紫罗兰女士。这一位纯粹的艺人，在我们的脑里心里，当起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紫罗兰女士的思想是前进了，艺术也精练了；无论在声乐方面，舞艺方面，量虽则增加得并不多，然而质却变进了不少。阔度高度，或许比前会减一点，但是深度却深到了不可以测摸。

所以在今年元旦的那一天，我们见到了之后，谈了一阵，使我顿生出了一种难言的恧惭，十五六年来，我则仍然是一故我，而她却已变成了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这一次她在马来亚各地，为筹赈而卖艺的所得，成绩也已经不少。但她又告诉了我以今后的决心；她说她将牺牲一切，而奉仕艺术。无论银幕也好，歌舞也好，文艺也好，她总想以全身心来体会，来学习；务必使艺术和社会，艺术和国家民族，能发生一同时并进的交关关系。

我也告诉了她以在这一时候，艺人报国的最简捷的径路。

她所寓的客舍，却巧也就是南侨筹赈总会所请来开画展的艺术大师刘海粟教授的住处，于是乎我就想起了殊途同归的爱国艺术家的总集合，拉了她去拜见海粟。这张速写，就是我请海粟教授随便拿起铅笔（并非画笔），在布纹信纸（也并非画纸）上画下来的几笔黑白的线条。虽则海粟教授因系游戏笔墨，不肯交我发表，但我则以为紫罗兰女士的神情已具。可以不必苛求了，绝代

传神的画像，自然只能待诸异日，于抗战胜利，画具全备的时候。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木坡"版

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
画展目录序

关于艺术大师刘海粟氏的国画，西画，以及书法上的伟大成就，不但在我们祖国已经早有了定评，就是在国际间，如艺术中心地的巴黎，学术研究空气极浓厚的柏林，以及伦敦、罗马等地，也各有许多艺术大批评家、美术史家、诗人和东方艺术专家等，在热烈地介绍，批评，并且加以无上的颂赞。所以，对于大师的艺术的高超绝俗，独往独来的气概，我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在此地值得提出来一说的，倒是艺术家当处到象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

譬如大家都到了前线去打仗，后方，自然连烧饭的伙夫，制军服的裁缝，以及制造军火的工人，也要感到缺少；但是完全在后方工作的人，假使一个也不留，而都赶上了前线去的话，则这仗将如何的打下去？兵士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用子弹军械的么？

从这一个极简单的譬喻来说话，则当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的报国途径，原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的这一条狭路的。我们只教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教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的报国的义务。

清道夫在战时后方扫一条街，原是在报国，敌报侦察员，在异国的首都，仿佛是在寻欢作乐，而实际却在为国家搜罗情报时，也是在报国。

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但是，我们的抗战，还未达到最后胜利的阶段，我们的报国责任，自然也不能说只尽了一次两次，就可以算终了完满的。我们既是中华民国的臣民，则自生至死，自然都要负为中华民国努力的责。不但在战时是如此，就是在平时，也是一样。刘大师于荷属各地的筹赈画展开完之后，这一次又肯应星华南侨总会之请，惠临到马来亚来，再作筹赈工作的本意，自然也出乎此。

现在，关于画展的一切筹划，已经妥帖了；而画展目录，也将次印行；因刘大师是我数十年来的畏友，所以当他这目录付印之前，我特为写出这一点艺人报国的意见，以附骥尾，本来并不足以称作序言，不过一时想到，便即写出，聊表我对大师的倾倒之意云尔。

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星洲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刘海粟教授

刘海粟教授，这次自荷印应南侨筹赈总会之聘，来马来亚作筹赈的画展，一切经过情形，以及关于海粟教授过去在国际，在祖国的声誉和功绩等，已在各报副刊及新闻栏登载过多次，想早为读者诸君所洞悉。此地可以不必赘说。但因我和刘教授订交二十余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简述数言，以志景慕。

刘教授于一八九六（光绪丙申）年二月初三，生于江苏武进；父刘家凤，系著名乡绅，母洪氏，实亮吉洪稚存先生之女孙。教授幼年，就喜欢书画，读书绳正书院，天才卓绝，与平常人不同。年十三，母洪氏去世，教授于悲痛之余，就只身走上海，誓与同志等献身艺术，好从艺术方面，来改革社会。

辛亥革命那年，教授才十六岁，于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之后，便与同志等创设上海美术学校。国人之对西洋艺术，渐加以认识，对于我国固有艺术，有力地加以光大与发扬，实皆不得不归功于教授之此举。

教授二十岁时，开个展于上海，陈列人体速写多幅，当时我

国风气未开，许多卫道之士，就斥为异端者，而比之于洪水猛兽。“艺术叛徒”之名，自此时起，而郭沫若氏之题此四字相赠，半亦在笑社会之无稽。

当时日本帝国美术院刚始创立，教授被邀，以所作画陈列，日本画家如藤岛武二，桥本关雪辈，交口称誉。

民国十年，教授年二十六岁，应蔡元培氏约，去北京大学讲近代艺术，为一般青年学子所热烈拥护。嗣后再度游北京（民十二），亡命去日本（民十五），更于民国十八年衔国民政府之命赴欧洲考察美术，数度被选入法国秋季沙龙，在欧洲各国首都或讲演，或举行画展，以及数次奉命去德荷英法等国，主办中国画展；教授之名，遂喧传于欧美妇孺之口，而艺术大师之尊称，亦由法国美术批评家中的权威者奉赠过来了。

这是关于刘教授半生生活的极粗略的介绍，虽则挂一漏万，决不能写出教授的伟大于毫末，然即此而断，也就可以看出教授为我国家民族所争得的光荣，尤其是国际的荣誉。

法国诗人有一句豪语，叫作“人生是要死去的，诗王才可以不朽”；艺术家的每一幅艺术作品，其价值自然是可以和不朽的诗歌并传；诗王若是不朽的话，艺术界之王，当然也是不会死的，我在这里谨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赠给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诗人杨骚的南来

与杨骚在福州别后，已经有三年不见了。虽在报章杂志上，时时看到他的消息，但是从武汉而湘西，从湘西而桂粤，我却终于没有机会和他在旅途中一见。现在他从抗战的陪都，经过香港，而到了这长年是夏的南国，我们很庆幸旧友的无恙，同时又欣幸着南荒的热带上，重增了一位执笔的战士。

诗人是曾经到过各战区去慰劳将士，视察过抗战的实况的，我们希望他能于征尘暂洗后，将他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报告给我们。

文化人在这一战乱时代里所能做的事情并不少，尤其是在文化和我国不同的这南岛，我们希望诗人杨骚能给予我们以簇新的制作，而增加些我们的兴奋。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郭外长经星小叙记

当郭复初大使荣任外交部长的消息在报上发表的时候，我就同总领事说过，假使郭大使回来，倘若是路经星洲的话，我们得好好的叙一下子。因为有十几年不见了，旧雨重逢，久别之情，能在客中倾叙一下，倒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一回，郭大使果然是途经星洲了。在星期六（六月十四）的晚上，我们得在总领事馆，长谈了两小时的闲天。

大使此次之来，是经过华盛顿、檀香山、马尼剌的。读报的人，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不过在大使已经卸任，而部长尚未到任之间，复初先生似乎特别的慎重，行踪不大喜欢教外边人知道。因此，他不但是迎送饯接之类的应酬，能回避的都一概回避，就连有许多因公私事务，想去会见他的人，也大抵是托辞婉谢的居多。总领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也只说是上总领事馆去吃吃便饭，另外并不提什么。但暗暗我却知道，大约总是因为郭大使来了，总领事是想藉此而得使旧友一叙的意思。（因为郭大使的行踪，是曾有一次在《海峡时报》的合众社电报上见过的。）

我到总领事馆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坐了一下，刁公使，黄伯权先生，郑连德先生等也就联翩的到了。我对于应酬是不十分习惯的，所以同大家谈的，总还是不离本行的新闻时事，后来李光前先生参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圈里，说到了敌寇南侵的事情，我们的议论，才开始发了火花。可是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楼下汽车声响，郭大使就和夏晋麟立法委员，高总领事等，一道地走上了楼。

十几年不见，郭大使还是那一种样子。记得曾有一位喜欢说反面话的诗人，有过"天道不公唯白发，贵人头上也逡巡"的翻案诗句，在这里倒真可以引用一下。

大家叙过寒暄，坐定之后，郭大使开口就问我：

"前年年底，你写信到伦敦来，要我写文章，我的回信，你收到的么？"

到这里，我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因为去年新年《星洲日报》特刊号的一篇郭大使的文章，却是由我写信去要来的。大使在文章之后，还特别附了一封亲笔写的信在那里。而我呢，于接到了文稿与来信之后，因为人事倥偬，竟忘记了作覆。

这懒于写信的习惯，实在是我的一个大弱点，但是身居热带，头脑糊涂，又兼以一天到晚，事情也实在是真忙，所以经大使一提之后，我倒是感到了万二分的惶恐。

在吃饭之间，我们谈的，都是些不相干的闲话。郭大使向林汉河先生道了这次荣受英皇文官勋章的喜之后，就说起了林姓实在是一大族，敌国的姓林的，当然也是中国人的子孙，我也就打着诨说："岂止敌国的姓林的人，就是美国的林肯大总统，恐怕也是一族吧？"

大家在欢笑的中间，就说起了我们的林主席，或者和林大总统是弟兄之辈。高总领事并且还提起了二位林大总统的生日的相同，也是一件偶合的奇事。

随后大使又说到了中国菜，说：

“吃中国菜，今晚倒还是从檀香山以来的第一次。”

吃完饭后，在剥葡萄，切芒果的中间，大使才开始说到了这一次的战事。他说，英国的民气，真是旺盛。世界上能在这样艰苦中度日，而不稍存灰颓之心的民族，据大使说，是除了中国人之外，恐怕要算盎格罗·萨克逊人了。英国的男女老幼，是没有一个不信任政府，没有一个不相信英国是必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而在危苦之中，仍不忘对我国的同情的那一种义侠之风，尤其是令人佩服。

说到了国际的同情，大使便又谈及了刚在那里住过一些时候的美国，大使说：“中英美，实际在精神上，早已就结成了同盟了，唯其是先从精神上的结合，所以比马上就可以因利害冲突而变成一张废纸的什么轴心同盟的签字条约之类，更加巩固，更可宝贵，自今以后，A，B，C的三国同盟，虽则不签什么正式的条约，但在战后的世界改造，保障民主，拱卫自由平等，和扶持正义人道与和平诸大业上，必将永久地携着手而前进。强横霸道的侵略国家，决不能在世界上立得住足的。”

谈锋一转，说到了世界各国对敌国兵力的估计时，郭大使就很幽默的说：

“英美各国，就连轴心的德意以及苏联也在内，对敌人军事力量的估计，决不会过高，也决不会过低，真正是估计得一目了然。因为小小的岛国，实在是只有这么点劲儿。”

大使的说此话，当然并不是看不起敌国，实在是小人国的虾兵蟹将，即使吃饱了泥土，膨胀堆叠起来，恐怕也高不过一只象腿。这一只象，或者说一只睡狮吧，现在是已经被毒蚊疟蚊辈吃血吃得有点在感觉着痛痒了。

我于是又问起了最近在这里流行的一种谣言，说是英美可能出卖中国，或者会在远东再演一次慕尼克悲喜剧的第二幕，大使笑着说：

"这谣言不可信的最确实的证人，就是敌国的少壮派军阀，以及跟这些少壮派军阀走的小胡子官僚。他们中间的老成持重，有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家们，原也有不少是想恳求英美出来对中国请和的，但英美到了现在，那里还会去理他们呢？"

我们谈到了美国对远东的态度的坚决，我们又谈到了美国的实力的实在是雄厚。有人问起了美国是否将完全禁止煤油对敌国的输出，大使说：

"在美国也有大多数主持正义的人士，在督促政府即刻施行这一种政策，这或许马上是会得实现的。敌机的滥炸美国在我国的教堂医院和船只，以及无理而危害剥夺美国在华的权益，将逼使美国不得不向这一条路上走。这与纳粹的不顾人道法理，而击沉美国的商船罗宾摩尔号，将使美国不得不实行以军舰护航，是一个道理。"

在总领事馆的露台上坐着谈着，我们几乎忘记了是身在热带。我忽而记起了报馆找我问大使的几个问题，譬如"你对星加坡的感想如何？印象如何？"或者什么什么等访问记的材料之类，自己倒反而觉得呵呵笑了起来。可是，我虽不这么问，大使后来也说及了这回看了星洲的各处防务之后的印象。大使说：

“星加坡真可不愧被称作东方的直布罗陀。我说这话，是指着‘星洲是安如磐石’这一点而说的。中国所说的‘泰山磐石’这一个空洞的形容词，我于这次亲自看到了这里的海陆空的防务之后，才得着了具体的说明。这里的军港，实在是伟大，实在是坚固；而各种现代军器的配备装置，也实在是真周到。我虽则不是军事专家，但我可相信，星加坡是最最不容易被攻陷的。”

最后由各人谈各人想对大使谈的话了，伯权先生就说起了侨汇的问题。大使对侨汇的一项，也是和我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最好是请当局能将手续弄得更简单，限制放得更宽一点。

大使对林文庆博士，谈起了林可胜先生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对黄兆珪先生问起了他的太太和小姐的近状，黄先生已经做了外祖父了。我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和黄先生干了几杯“常纳华克”，所以也放了胆，托大使去传一句话，给在重庆的我们共通的朋友。我说：“王雪艇先生对我有点误解了，所以要请大使去为我解释解释。”大使于踏进汽车之际，笑着回答我说：

“这当然不成问题，可是同时你也得循规蹈矩的做人！”

这句话说得在车边送他的人大家都高笑了起来；大使是负起了国家民族的重任，在夜阴里轻轻地和我们别去了。他现在已经安稳地抵达了重庆。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要闻”栏

有三点可取

最近看到中国制片厂的新片《火的洗礼》，觉得比《孤岛天堂》等初期的作品进步了。

第一，是在这片中，外景配合得很好。第二，是收音也比较得进步了一点。但还有许多顾彼失此的地方，当然是可以渐渐的改进。第三，是将我们抗战中国的坚强之处，全部宣传了出来，可以打击那些专以攻击政府为职业的失败主义者的奸党，而证明出在我们后方，还是严肃的工作者比荒淫者多。

凡此三点，我认为是这一个片子的可取之处。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每周影评"栏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岁了；他过去在新诗上，小说上，戏剧上的伟大成就，想是喜欢读读文艺作品的人所共见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而尤其是难得的，便是抗战事起，他抛弃了日本的妻儿，潜逃回国，参加入抗战阵营的那一回事。

我与沫若兄的交谊，本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是和学生时代同学时一样的。但因为中间有几次为旁人所挑拨中伤，竟有一位为郭氏作传记者，胆敢说出我仿佛有出卖郭氏的行为，这当是指我和创造社脱离关系以后，和鲁迅去另出一杂志的那一段时间中的事情。

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

我对于旁人的攻击，一向是不理会的，因为我想，假若我有错处，应该被攻击的话，那么强辩一番，也没有用处。否则，攻击我的人，迟早总会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倘使他自己不承

认，则旁人也会看得出来。所以，说我出卖朋友，出卖郭氏等中伤诡计，后来终于被我们的交谊不变所揭穿。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员长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间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住宅里见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两三人而已。

这些废话，现在说了也属无益，还是按下不提。总之，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发起替他祝寿；我们在南洋的许多他的友人，如刘海粟大师，胡愈之先生，胡迈先生等，也想同样的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为我国文化界的这一位巨人吐一口气。现在此事将如何进行，以及将从那些方面着手等问题，都还待发起人来开会商量，但我却希望无论和郭氏有没有交情的我们文化工作者，都能够来参加。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卡尔·杜迪希，是维也纳的雕刻家，因为血统的关系，前两年被希脱勒驱逐了出国，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后不久，就到报馆来看我，第一，说是要我为他介绍介绍；第二，他想为委员长塑一个像以致敬，问我有没有委员长的照片。从此之后，我们就渐渐的来往起来了。大约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样子，自英德宣战以后，他终于因为国籍的关系，便和其他许多德意籍的犹太人，一道被迁到了英国的另一个自治领，我于是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是在他将离开星洲的时候，广洽法师有一天来说，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这一位薄命的艺术家。我们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儿亚娃看见了广洽法师的僧衣，都很喜欢，广洽法师因而就想起了请他为印光法师塑一个像。他对我们东方的宗教艺术，实在是太感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经我们一说，他在百忙中也为印光法师塑成了一个泥身。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因这塑像的泥还没有干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国的朋友，教他去瓦窑里为我烧好，

然后再送来给我。这事经过了一年，直到最近，这座印光法师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里。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给广洽法师。广洽法师就和我谈到了印光法师的圆寂，以及世界战局在最近的变化。我们谈到了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世无常，艺术永在”的结论。正因为是如此，故而广洽法师，一定要我为他写一点关于这塑像的经过。我也义不容辞，因特为他写下了这一篇小记。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洲日报·晨星》

为郭沫若氏五十诞辰事

写好了这一个题目，自己一看，却不觉笑了起来，因为“为……事”的语调，是旧日上禀或作诉状时用的老调子。我在这里用这一个题目，分明也在声诉，但这一个声诉，却是对文化界的大众的。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郭氏的诞辰？这在前些日子里，已经写过一点短文了；在这里，我将先报告如何来庆祝的办法。

第一，为纪念郭氏过去在文化界的功绩，我们打算于十一月十五日的晚上六点，大家来一次聚餐。餐券是每人一元，地点本定在爱华园地，因系雨季，恐有危险，故改在南天四楼。餐券可以向各报馆，各书店及各文化团体去领取。

第二，既然是祝寿的盛筵，当然要一点快乐的余兴，所以，我们想请漳州十属会馆的平剧部诸君及演话剧的几位同志，来替我们表现几出戏剧。

第三，是在十五的那天，各报都出一个专刊。

第四，我们想征集一点寿礼，汇送到香港去，托香港祝郭五

十诞辰大会再为转汇，由他们去决定，如何的利用我们的贺仪。譬如作郭沫若文艺奖金的基金也好，或作奖学基金也好。但是文化界的同人，都是清贫的，因而我们想请大家去推动各产业家的对文化有兴趣者，能够多多的送一点厚礼。（这事正在商议计划中。）

上举的四件事情，也许并不是最好的祝寿办法，但从我们的能力来说，则竭尽全力，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个样子了。

其次，是利用这些机会，来使文化界人渐趋团结的一种副作用。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一句成语，所以弄得相轻而至相斗，在中国文化史上，其例着实不少。譬如元祐党人的反对新法，就是最显著的一个证明。王安石的新法，在原则上未始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大革命，不过因为继王安石而后的那些执政者，为当时的正人君子如司马温公以下的诸人所不满，结果弄得置国家政治于不顾，反以争党派意气为第一义；卒至授人以柄，使异族的金辽入寇中原，国运因而中落。记得苏东坡曾说过一句由衷之言，他说“王安石新法，实我辈激成之。”所以文人的相轻终于不是国家民族的福利。我们要利用这一个敌寇侵凌的时机，来造成一种文人相亲相爱，大家能虚怀团结的空气。

从前有一个诗人，曾有过一句诗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他的意思，总算是已经很谦虚的了。但是我们还以为仅仅不薄，仍是不够，我们不但要不薄今人，并且也要爱敬今人，如同爱敬古人一样。

十五日的日期，已经迫近了；我们的餐券，也已经印好，打算马上就去分发，希望各属侨贤，各文化界的同志，能够多多的参加，能使这一次郭诞，成一个盛大的胜会。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敬悼许地山先生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天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

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作《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

的意思。象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〇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已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份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罢？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